

2/033

学术研究



5
1983

XUE SHU YAN JIU

学术研究

(双月刊) 一九八三年第五期

目 录

实事求是, 坚持真理, 发展真理

——学习《邓小平文选》……………孔庆榕(5)

正确认识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学习《邓小平文选》中关于教育的论述……………王屏山(11)

努力办好我省高教事业

——学习《邓小平文选》……………李修宏(18)

陶行知的人才学思想……………孙传华(24)

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李秀潭(29)

精神生产在社会生产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胡吉良(84)

论“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论意义……………章沛 王经伦(89)

一本普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好读物

——简评《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程宇(45)

论提高经济效益的理论根据和主要途径……………刘光第(48)

试论当前农村放宽政策的若干问题……………梁钊(54)

试论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韩志国(60)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蔡馥生(66)

梁启超论孟子遗稿

——《孟子略传》《孟子之教育主义》.....梁启超(77)

关于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李建(99)

中国历史上对石油天然气的认识利用及其与

西方的关系(下).....戴裔煊(108)

“温柔敦厚”辨.....邱世友(108)

从《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续).....牟世金(116)

《九云梦》的卷数和刻书年代.....官桂铨(58)

“闻鸬”新解.....程芳银(70)

“豫章郡出石可燃”的出处.....于盛庭(10)

“哭庙”辨.....易名(59)

“不曾辛苦学妃稀”.....叶正猛(102)

·学术动态·

纪念党的“三大”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98) 广东省陶行知教育思

想研究会举行学术座谈会(17)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在广州举行(98)

广州举行“关于发挥广州中心城市作用问题讨论会”(38) 省小学教育研究会

举行德育专题讨论会(88) 广东劳动学会举行第二届年会(115)

封面设计容璞

Journal of ACADEMIC RESEARCH (a bimonthly)

No. 5, 1988

CONTENTS

Seek Truth from Facts, Adhere to Truth, and Develop Truth—Notes on 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Deng Xiaoping”	Kong Qingrong (5)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Building of Modernization	Wang Pingshan (11)
Strive to Better Our Caus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Guangdong	Li Xiuhong (18)
Tao Xingzhi's Concept of Talent-training	Sun Chuanhua (24)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Theory on Dialectic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Li Xiutan (29)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in the System of Social Production	Hu Jiliang (34)
On the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Formula “Concrete—Abstract —Concrete”	Zhang Pei and Wang Jinglun (39)
“Scientific Socialism Primer”: A Good Book for Popularizing Scientific Socialism	Cheng Yu (45)
On the Rationale and Chief Ways to Increase Economic Benefit	Liu Guangdi (48)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Our Current Lenient Policies	Liang Zhao (54)

On the Function of Economic Contracts in Planned Management	Han Zhiguo (60)
The Marxist Theory on Currency and China's Practice of Socialist Economy.....	Cai Fusheng (66)
How to Expand Patriotic Education in Guangdong as Closely Related with Its Historical Facts—Reports by the Editorial Staff of Our History Section.....	(71)
Liang Qichao's Posthumous Papers on Mencius	Liang Qichao (77)
Concerning Liang Qichao's Posthumous Papers on Mencius.....	Li Jian (99)
A Historical View of China's Knowledge and Utilization of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Western Countries (II)	Dai Yixuan (108)
An Apology for "Gentle, Soft, Sincere and Honest" Being a Critical Principle of Poetry Writing	Qiu Shiyu (108)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as Reflected in "Wenxin Diaolong" (Continued)	Mu Shijin (116)
Random Notes in Reading	
Recent Academic Trends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发展真理

——学习《邓小平文选》

孔 庆 榕

《邓小平文选》是我们党和国家在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成果。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与它相适应的理论著作。《邓小平文选》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的产物，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首创精神，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的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的统一。它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路线的由来和发展，从而使全党的思想进一步实现统一，而且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文选》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贯穿于文选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也就是《邓小平文选》的思想核心和精髓。本文着重谈谈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发展真理方面的一些体会。

（一）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客观真理。它和其他科学一样，是实事求是的产物；同时也要求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实事求是地理解它、运用它、发展它，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果离开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生命力了。长期来，我们党内如何在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战线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在坚持实事求是，还是抛弃、否定实事求是这个原则问题上。远的暂且不说，就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极力反对实事求是原则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完全割裂开来，把毛泽东思想的完整科学体系割裂开来，认为毛泽东思想就只是所谓“老三篇”或“老五篇”。华国锋同志也同样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他竭力坚持“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思想奉为宗教信条，从而也就割裂了毛泽东思想与实际斗争、实际生活的联系。在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以后，又曾出现一股错误思潮，有人打着所谓“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

的幌子来否定毛泽东思想。凡此种种，都是从“左”的方面或右的方面，抛弃、反对实事求是原则，企图最终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

是否实事求是地看待毛泽东思想，不能不涉及到对真理的认识和态度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任何真理，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物质世界，与客观物质世界的本来面目相符合，都是客观的、无条件的、绝对的；然而，真理又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对客观物质世界一定程度的认识，所以它又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决不能因为真理具有相对的性质就对它的客观正确性无根据地怀疑。列宁明确指出，辩证法“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6页）我们也不能因为真理具有绝对的性质就把它作为永远不变的教条，认识的“顶峰”。列宁还说：“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列宁选集》第3卷第26页）真理都不是抽象的，总是具体的，一切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如果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去套，削足适履，真理立即就会转变成谬误。因此，对待真理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小平同志正是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客观真理本来面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首先，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40页，以下引书名略）他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第39页）他坚决反对林彪、“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早在林彪的反革命阴谋未暴露前，小平同志就和罗荣桓同志一起反对林彪割裂毛泽东思想的做法。他在一九七五年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又说，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只抓住毛泽东同志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片面地进行宣传呢？这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毛泽东思想，不能听到风就是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又强调说：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承认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实际上就是承认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是真理，这是关系到我们党是否应当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

他在肯定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是科学真理的同时，教导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它的片言只语。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体系，“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第39页）

第二，小平同志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是不行的，何况任何人都不会是绝对正确，我们也不能这样去要求毛泽东同志。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对毛泽东同志既要尊重和拥护，又不要盲从迷信。我们要坚持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他的片言只语，更不是他的一些错误论断。小平同志强调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第85页）他还大力支持和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第三，他指导全党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从而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也由于毛泽东思想一再受到来自“左”的方面和右的方面的割裂、歪曲，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关系到党的盛衰兴亡，自然也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小平同志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杰出地运用了唯物史观，首先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第159页）领袖人物免不了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毛泽东同志也不例外，但是，这些都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小平同志这些科学的结论，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保证了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旗帜永远在中国的土地上迎风飘扬。在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上，小平同志既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又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要求出发恰如其分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且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严格区别开来。在分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时，既指出毛泽东同志应该负的主要责任，又不是把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并着重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上，从制度上存在的缺陷去分析、寻找错误的根源。这种科学的分析，既严肃地批判了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又揭露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就是企图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小平同志正是这样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捍卫真理。

（二）

承认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并且在行动上实行它，这是实事求是，然而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实事求是地对待真理，不仅要坚持它，还应当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正是因为它是发展的，它始终和斗争的实际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因此可以说，不发展真理，就根本谈不上坚持真理。

然而，教条主义者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僵死的教条，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当作万能的钥匙、能治百病的灵丹圣药，到处乱套。他们不懂得，即使是已为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仍然要在实践中继续接受检验，并且在实践中获得新的发展。他们把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倒转过来。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最典型的教条主义。华国锋同志鼓吹的“两个凡是”，更是把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说过，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那些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某些“公式”，而不会随着实践使这些“公式”获得发展的人。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

小平同志多次批判教条主义，反对思想僵化，号召我们要解放思想。他把这个问题提到关系着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第183页）他认为，不仅是中央、省委这样的领导机关，就是基层也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

小平同志正是这样对待毛泽东思想的。一方面，他坚持从实际出发，敢于修正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某些本来就是错误的，或者在当时是正确然而由于实际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已经不再符合实际的意见和决定。例如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及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指导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推翻了在教育问题上的“两个估计”；改变了对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申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调整对外政策等等。另一方面，他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在理论与实际上提出解决新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例如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让农民休养生息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改革国家领导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坚持同时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等等。

小平同志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思想，不可避免地遭到某些人的非难和反对。有人借口在某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曾经画过圈圈，不得改变，有的甚至叫嚷这是“倒退”、“复辟”、“砍旗”，这些责难和反对，有来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也有来自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第122至123页）小平同志这些话，教育了广大党员和人民，也给那

些坚持错误思想的人以最有力的批驳。

小平同志从实际出发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集中地表现在他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十分重要的基本思想。小平同志深刻地研究了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是从来得不到成功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第872页）这个科学的结论，正在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逐步进行各个方面改革所必须遵循的总的指导思想。

（三）

要坚持真理、发展真理，必须把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就是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定是群众路线的忠实的实行者。要实事求是地坚持真理、发展真理，如果离开群众的实践、群众的创造，是不可能的。列宁在论及这个问题时写道：“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有哪些阶级的力量；至于具体情况，实际情况，那只有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才能表明。”（《列宁全集》第25卷第278页）

小平同志是把坚持实事求是和坚持群众路线结合起来的模范。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他坚持走群众路线，善于听取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并通过研究分析，把一切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他才能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在小平同志的言论中，固然有他独特的、高明的远见卓识，也集中吸收了群众（包括各级领导干部）的许多好观点、好意见。因此，他的意见和主张总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例如关于同时抓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就是一位同志向他提出的建议，也是全国各地许多单位人民群众的创造。他的许多重要见解，如应当推翻教育问题上的“两个估计”，改变过去对知识分子的不恰当的估计，取消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和恢复高考制度，以及一系列农村政策的调整等等，他都是在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正确决策。同时，小平同志又很善于根据客观的实际情况，修改自己某些还不够成熟的想法，使之更臻完善；或者调整自己的某些提法，使之与当前实际更加一致起来。例如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改变和取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是地方上许多同志不赞成这样改变。尽管这种改变迟早要实行，这是客观需要，但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有了长久的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他就把自己这个意见删掉了。

这里特别要讲一讲的是，小平同志非常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例如一九七八年夏天，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在这个讨论前，一九七七年

五月，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小平同志批判“两个凡是”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先导，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批判“两个凡是”的必然发展。然而，小平同志却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这一群众的创造，认为这场讨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第138页），抵制了攻击这场讨论的各种流言蜚语，表现了小平同志革命家的胸怀和风格，给我们很大教育。

怎样把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小平同志强调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第134页）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要鼓励、支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他一再提出要有一个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了开创这样的政治局面，他提出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创造民主的条件，他重申实行“三不主义”，贯彻“双百方针”。与此同时，他又强调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要分析，对错误的意见也要适当解释，不能压服。这些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正确结合。

回顾近十多年来的历史进程，毛泽东思想从被割裂、被歪曲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不少人从过去对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到今天的坚定信仰，这中间经历了多么复杂的斗争！在党和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力挽狂澜，坚持实事求是，捍卫了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从而使党和国家不致因为失去毛泽东思想这根支柱而陷于分裂，从危机四伏的困境走上光明的康庄大道。小平同志不愧是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楷模、典范，我们一定要努力学好《邓小平文选》，学习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发展真理的精神，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努力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豫章郡出石可燃”的出处

于盛庭

邢润川、杨文衡《我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利用史略》一文说：“到了汉代，《汉书·地理志》则说：‘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见《学术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六期99页）但查遍《汉书·地理志》也找不到这句话。

作者可能是误信了前人旧说而未加考辨。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余观前汉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清汪价《中州杂俎》卷二十物类十四沿袭朱弁之误说：“按《前汉书·地理志》：豫章郡生石可燃，为薪”。张萱《疑耀》卷二则全同《中州杂俎》。

其实，豫章郡出石炭之事，见于《续汉书·郡国志》四，其中“建城”之注引《豫章记》曰：“县有葛乡，有石炭二顷，可燃以爨。”朱弁误记为《汉书·地理志》，而此后不断有人以讹传讹。

正确认识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学习《邓小平文选》中关于教育的论述

王屏山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对教育工作作了许多讲话和指示。《邓小平文选》中选入的关于教育的论述，内容极其丰富而深刻，对当前教育领域里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例如，推倒了“两个估计”，肯定解放后十七年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邓小平文选》第46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语只注明页码），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而开始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阐明四化建设与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关系，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科学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的著名论断，批评和纠正鄙薄知识，忽视人才，轻视教育的错误倾向，倡导在党内和全社会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和重视教育的观念；阐述了智力开发的极端重要性和智力投资、增加教育经费的问题；论述了适应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教育必须实行改革的若干问题；强调教育战线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等等。小平同志在教育方面的这些理论与实践，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阐明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重大作用，这是《邓小平文选》中关于教育的论著的主题思想。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点学习的粗浅体会，以祈在学习中共同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千头万绪，从何着手？这是摆在我们党和人民面前的新课题。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作出了正确的回答：“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第45页）他还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

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第37页）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第92页）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被摆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决定着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

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是从国内外的大量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坚持和发展。现代化经济建设，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指导、组织下进行的社会化的大生产。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其巨大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处于以电子、核子和航天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技术革命时期。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它引起了物质生产领域中突飞猛进的变革，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使社会物质生产领域面貌一新。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小平同志说的：“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第84页）

现代生产与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的特点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不断变革的本性，向生产者提出了必须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要求。这也就在客观上要求把智力投资和发展教育摆在突出地位。教育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基础。现代化经济建设，要求大量的具有科学技术素养的人才。我们只有造就一批这样的人才，才可能有科学的发明和技术的创新，从而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才能使科学这一知识形态上的生产力变为直接的生产力，从而发挥科学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

现代化的大生产，还需要有一批善于指挥、组织和经营管理的人才。没有这样的人才，就会造成生产过程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就不能发挥先进装备和生产技术的作用。培养这样的人才同样有赖于教育。而我国的现状是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严重缺乏，因此，对教育的要求就愈加迫切。

现代生产对现代劳动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是要使劳动者成为掌握一定生产部门的技能和技巧的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以便熟练地掌握操作技术和方法；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在智力和体力方面得到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以便适应现代生产不断变革的需要。这就对教育提出了培训熟练工人的要求。所谓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说的也就是教育会培养、训练和提高劳动能力，改变劳动力的形态。使受教育者成为一定生产部门的熟练劳动力，同时又熟悉整个生产系统，能够随着生产的不断变革，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根据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和我国人民文化水平低、劳动力平均熟练程度低的状况，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普及教育和扫盲工作，要求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强调普通教育除了向高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外，还要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此外，他还要求办好职工教育和农民教育，提高现职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

和劳动熟练程度。

教育还是新的科研成果的重要基地。小平同志说：教育“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第68页）小平同志要求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应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学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尤其是重点高等学校集中各方面的专家，又拥有先进的科学实验手段。它们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方面不时有新的突破，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教育事业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社会主义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又担负着特别重要的责任。小平同志根据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求学校在进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生产劳动教育和体育的同时，“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第328页）提出“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第102页）很明显，小平同志是把教育作为文化建设的重点和思想建设的重要条件，看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

小平同志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分析经济与科学和教育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指出“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第104页），一方面提出经济要振兴、社会要发展，就“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第45页）这就既唯物、又辩证地处理经济和教育的关系。小平同志的这一新见解，不但反对把教育事业排斥于国民经济建设之外，主张“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105页）而且在工作战略部署上，主张把教育作为发展经济必须要首先抓紧抓好的一件大事。这就突破了传统观念和形而上学的旧框框。正是根据小平同志这种科学的、深刻的思想，党的十二大正式将教育列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

二

为了确立教育的战略重点地位，邓小平同志首先同“四人帮”及其影响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指出：“‘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第89页）他又说：“‘四人帮’反对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科学文化，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四人帮’这些谬论的流毒，现在仍然需要大力肃清。”（第100—101页）他还指出：“‘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破坏，不仅造成科学文化的教育质量惊人下降，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败坏了学校纪律，腐蚀了社会主义的革命风气。……彻底清除‘四人帮’所造成的这种恶果，是关系到巩固无产

阶级专政的一项极其严重的政治任务。”（第102页）

小平同志还针对我们一些同志受“左”倾思想和小生产观念影响，不重视教育的情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同时也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着现代化建设巨大任务的形势和现有大批干部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坚决克服那种不从长远看问题的短视观点。”（第286页）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小平同志认为，有些人不动脑筋，没有认识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思想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第181页）解放前的我国，基本上是小生产者的国度。至今，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第132页）鄙薄知识，忽视人才和轻视教育的观念，正是以往遗留下来的小生产者的一种习惯势力的反映。由于小生产者使用的工具简单而且固定不变，因此人们单凭经验和拼体力便可以从事生产，而这种简单劳动的经验和技能可以在生产劳动中通过父传子，子传孙和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获得，因此，他们不需要经过学校教育便能够胜任其工作。然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社会化大生产，不仅要求人们具有实际生产经验，而且要求掌握科学技术，人们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单纯拼体力了，而必须更注重发展和发挥其智力，过去那种在直接劳动过程中通过父传子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再生产劳动力的方式，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再也不能适应现代生产的需要了，而必须代之以学校的教育和训练。现代教育已经成为现代生产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轻视教育的观念已经成为极大地妨碍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保守落后观念。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工人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在那时，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单行本第211页）教育也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广大工农劳动群众被排除于学校的大门之外。因此，在一部分工农群众中，产生一种盲目排斥科学和教育的情绪。如果说，这种情绪在当时多少还带有对旧制度的痛恨和反抗的性质，那么，在人民当家作主已经三十多年，科学和教育已经成为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强大武器的今天，倘若还以不识字的“大老粗”自夸，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那就未免如斯大林所说的“野蛮和不文明”了。（《斯大林全集》十一卷第64页）斯大林说得好：“我认为不消除这种野蛮和不文明的现象，不消除这种对待科学和有文化的人的野蛮态度，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同上）

过去，我们搞的是民主革命、国内战争和阶级斗争。在那种条件下，我们特别强调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培养对革命的忠诚和勇敢、大胆等品质，要求人们掌握战争和阶级斗争的知识和经验。今天，我们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无疑必须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但同时必须特别强调学习和掌握一般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小平同志说：“过去的连长，驳壳枪一举，就是‘冲啊’！现在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

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第21页）小平同志还说：“没有专业知识，又不认真学习，尽管你抱了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还起相反的作用。现在的事情与过去不同了。”（第228页）“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第226页）因此，他强调：“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第92页）小平同志对“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对小生产观念的剖析，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深思。

三

把教育作为战略重点来抓，一定要有必要的物质保证。要舍得花钱办教育，增加教育经费。小平同志要求我们改变“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的状况。（第214页）他强调“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第214页）由于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的倡导，许多干部和群众开始重视教育，许多部门和企业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尽力拿出钱来增加教育经费。这几年来，尽管国家财政仍有困难，然而，教育经费还是逐年有所增加。中共广东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也作出了《关于努力开创我省教育事业新局面的决定》。市、县各级政府和有些部门也开始把教育摆在议事日程上，并表示愿意拿出钱来兴办教育事业。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省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已经普遍地重视教育了，更不是说都已经舍得花钱办教育了。有的同志仍然认为教育是软任务，教育投资是软指标。有些地方在具体安排财力、人力、物力时，往往还按着“一工交，二财贸，剩下多少搞文教”的老公式办事，把文教列入另册，甚至能挪就挪，能挤就挤，能拖就拖。这些想法和做法，显然与形势的要求相差太远。党中央批准我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期望我省在经济发展中先走一步。而轻视教育，舍不得花钱兴办教育事业的状况如不改变，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现，不仅不能促进我省经济建设先走一步，而且还会拖住后腿。这是应该引起严重注意的。

要解决不舍得花钱办教育的思想，除了充分认识教育的作用和地位之外，还应该对智力开发，教育投资的特殊规律有个正确的认识。大体上说，教育投资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教育投资不象物质生产部门的投资那样，投资以后很快就直接体现于物质产品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而是首先体现于劳动者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一特点容易使人忽视教育投资的经济效果，把教育投资视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一种额外负担。其实，劳动力的质量提高了，不仅在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意义上，能够充分发挥新设备的效能，而且在内含扩大再生产的意义上能够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挖掘原有设备的潜力。这一方面，在目前国力有限的情况下，是应该更为重视的，这也是目前我国发展生产的的最节约办法。国内外的实践均已证明，智力投资的经济效果，比单纯增加生产

设备和劳动力数量更佳。

第二，一般说来，教育投资获得经济效果的周期比较长，从一般的情况看，培养一代具有中等文化科学技术程度的劳动者，需要十二年左右，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生产指挥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则需要十六年左右或更长一些时间，这特点容易使急功近利者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远水救不了近火”。然而，因为教育投资具有周期长的特点，因此，在安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更需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更要教育先行一步。任何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一定意义上说，都可以看成是以往教育投资的积累性的成果，今天对教育的投资，决定着明天和后天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日本人认为，日本战后经济上之所以能够得到意料之外的恢复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教育所造成的储备，是过去几十年教育成果的积累。同样道理，我们要在“后十年”顺利地进入经济振兴时期，在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现在就必须把教育作为投资的战略重点之一，以便在人才上为今后经济发展作好准备。如果到那时感到“渴”了才掘井，火烧眉毛才找“水源”那就来不及了。况且，光就目前来说，我们现在的人才也够“渴”了，这不正是由于我们过去长期忽视教育这个“远水”的结果吗？我们难道不应该由此吸取点教训吗？

第三，教育投资的经济效果比较高，后劲力大，收获期长。在现代生产的条件下，相同的费用，用于提高劳动者的质量，比之单纯增加物质设备和劳动力数量，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不仅表现在可以成倍地增加产品的数量，而且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降低成本、消耗，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培养一代适应现代生产需要的各级各类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熟练劳动者，需要较长时间，需要一代一代地培养出来，社会便可以获得巨大的源源不断的智力“能源”，这种智力“能源”从它的效果来说，比之“生产”它所需要的费用大得多，它不仅能补偿过去消耗掉的教育费用，而且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可见教育投资的后劲能量很大，它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度发展的重要条件。教育投资的收获期长，如果我们把各级学校毕业生的平均工作年限看作是教育投资的收获期，那么，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各级学校投资的收获期是：小学毕业生为41—46年；初中毕业生为38—43年；高中、中专和中技毕业生为35—40年；大学毕业生为31—36年。这么长的时间中，他们将为社会创造多少物质和精神财富！

要把教育投资真正作为投资的重点之一，保证不断地增加教育经费的来源，还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一般地说，教育经费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维持，否则，我国教育经费比例过低以及由此所造成的许多实际困难就无法改变，所谓“投资重点”也就无法落实。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很多钱来办教育。正如小平同志说的：“我个人认为，科研、教育经费应该增加。但不能希望马上增加很多。”（第54页）因此，除国家财政拨款以外，还要发动各地方、部门、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和广大群众集资办学。况且，我们向来有发动地方和群众办学的传统，我国人民素有热心资助办教育的美德。今天，就更有这一传统和美德发扬光大的现实条件。近

年来，国家下放了许多财权，又开始实行利改税政策，因此，一般地说，企业事业单位留用的资金增多了，各级地方财政的收入也有所增加。这样，就有可能动员从中央到地方的所属企业，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县尽可能多拿出一些钱来办教育。同时，由于落实了农村经济政策，农民的收入普遍提高。农民手中有了钱，也肯花一部分钱来办教育。这样，在许多有条件的地方，农村小学可以由农民来办。应当说明的是，农民为了发展生产，劳动致富，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拿钱出来办教育，不能说是增加农民负担。再说，广东是著名侨乡，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历来有热心支持家乡办教育的传统，我们也欢迎他们在自愿原则下献资兴学。此外，还应当组织师生开展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活动。教育战线本身也应当合理地分配和使用教育经费，实行节约开支，勤俭办学的原则。总之，一方面开源，一方面节流，在统一的教育方针之下，兴办各级各类、各种形式的学校，教育在开发智力的过程中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教育投资也能收到最佳的效益。

我们深信，通过学习《邓小平文选》，大家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教益，真正象抓能源、交通和经济工作那样来抓教育。教育战线的干部和教职员工也必将以更大的积极性来从事本职工作，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和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九八三年八月



广东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举行学术座谈会

为纪念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九十二周年诞辰，省陶研会举行学术座谈会。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陶研会名誉会长杨应彬同志，省政协副主席、暨南大学顾问、省陶研会理事长王越教授等出席并作了发言。发言者缅怀和赞扬了陶行知为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毕生奋斗的业绩和崇高品质，高度评价了陶行知勇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道路，勇于改革的革命精神。与会同志着重讨论了陶行知重视科学技术，努力向劳动人民和儿童宣传、普及科学知识的思想和实践。会上，还就如何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科学地、公正地评价陶行知教育思想交换了意见。省教育学会负责人、省内有关学者、省陶研会会员以及在穗的部分陶先生当年的学生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商定，将于明年举行我省首次陶行知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

（省社）

努力办好我省高教事业

——学习《邓小平文选》

李 修 宏

《邓小平文选》的公开发行，是全党、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学习《文选》，给我们教育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和鞭策。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和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在《文选》中对教育工作作了大量的理论阐述和具体指示。这些论述，给新时期的教育工作确定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和方向，对我们教育工作者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紧密联系实际，反复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有关教育的一系列论述，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列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最近，党中央又一再强调要重视教育，加快智力开发，中央的许多负责同志也对此作了重要的指示。为什么要把教育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上？为什么要反复地强调教育对四化建设的巨大作用？这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文选》中，都可以找到明确的回答。

我们知道，在十年动乱中，教育是个重灾区。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两个凡是”的思想仍禁锢着一部分人的头脑，加上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和小生产的狭隘观念所造成的忽视、轻视教育工作，教育战线这个几乎已荒芜的领域可以说是问题成堆，困难重重，百乱待治，百废待兴。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七年一出来工作，首先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因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这里，言简意赅地把教育与四化，与科学的关系，作了有层次的、科学的表述。是的，教育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它生产人才，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它能生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经验表明，从近代开始，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不仅仅是劳动力的增加，首先是生产技术的发展，是智能劳动比例的增加。这种智能又是通过教育的途径生产出来的。因此，教育就成了科学

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桥梁。正是从现代化的生产的要求和特点上，小平同志说，教育是基础，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现代化大生产的先决条件。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点，当前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技术的竞争证明了这点，而我们建国以来的正反面经验也证明了这点。

教育的巨大作用，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教育是一种广泛的培养人的社会实践，它不仅培养人的智力和技能，而且同时对人的思想、道德、性格加以塑造。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们的精神文明的建设，也离不开教育这个基础。小平同志在《文选》中，重申了我们党的一贯的教育方针，指出教育要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各方面全面发展，要使学生思想、道德风尚上得到良好的培养，这就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强调了教育的基础作用。此外，在现代社会，企业行政管理干部的培养也要通过教育的途径进行。这方面，小平同志也作了许多新的阐述。《文选》所收集的文章中，从教育对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其它各个方面，较全面地阐述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为党的十二大明确地把教育定为战略重点之一提出了决策性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同志在论述整个教育工作的同时，还对高等教育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小平同志首先说明了高教的基本任务，指出高等学校不仅是培养各种专门人才的中心，而且还是科研的骨干力量之一。邓小平同志说：“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点要定下来。”“随着高等院校的整顿，学生质量的提高，学校的科研能力会逐步增强，科研的任务还要加重。朝这个方向走，我们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就可以快一些。”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让所有的高等院校普遍加重科研的分量，但是重点大学都要逐步加重科研的分量。”也就是说，高等院校的基本任务，一是教学，出人才；二是科研，出成果。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发展。在当前，为了使高教更好地适应四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就要围绕这两个任务，做到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早出成果，多出成果。这是高教整顿、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因此，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要围绕这个基本出发点，根据中国国情，改革教育。采取两条腿走路，广开学路，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办学。并且改革大学的招生、教学、考试、助学金、分配以及行政后勤管理等制度。这就给高等教育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教育的战略重点地位，不仅要在思想认识上得到重视，还要在财政投资上得到保证。邓小平同志很早就指出：“科研、教育经费应该增加。但不能希望马上增加很多。”要“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来，一九八〇年，他又指出，同经济发展相比，我国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最近，中央书记处和全国六届人大会上，中央再一次强调了重视智力投资问题。中央负责同志批发了千家驹同志的文章，文章提出四个现代化，教育要先行，要把教育投资放在第一位。这样做，目的也是要从财政经费上保证教育的战略重点地位。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正确指针。就拿广东省近年来高教事业的情况来说，经过拨乱反正，贯彻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冲破了“左”的和小生产的观念束缚，许多领导也开始重视教育。在短短的五年之中全省普通高校由一九七七年的二十二所，发展到现有的三十四所（其中中央部属院校十所）。在校本专科学生共四四〇〇〇人，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65%；在校研究生一〇一八人，为一九六五年研究生人数的五倍。师资队伍由一九七七年的八一〇〇人，发展到现在一二三〇〇人。此外，广播电视大学、业余大学、职工大学、函授大学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现有的在校学生人数达到二六〇〇〇人。办学条件也有所改善，学校政治思想工作逐步加强，教学质量逐步提高。科研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九七八年以来全省高校获得国家和省优秀科技成果奖共四百二十五项，获得国家科委发明奖四项。一九七七年以来，我省高校已培养出本、专科毕业生三七八〇〇人，毕业研究生三〇一人，其中二八五人获得硕士学位。总的来说，我省高教正在调整中不断前进和发展，对本省和全国的四化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对照邓小平同志对教育的论述和要求，作为战略重点来看，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省高等教育还远远不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如果说，我国整个教育事业还处于较落后的状况，比起先进国家还有较大差距，那么，我省在全国各省之间相比，又是较落后的一个省份。我省高等教育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曾居于全国较先进的地位，而现在，优势已经消失，转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同广东作为全国发展经济的重点省份之一的特殊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这种落后，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数量少，速度慢，直接影响到各条战线急需的专业人才的配备。从平均每万人口有大学生的人数来看：一九五〇年全国有二点五人，我省二点八人，超过全国平均数零点三人。以后，逐步落后，与全国平均数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九六五年，全国有八点四人，我省仅有六点八人，相差一点六人；一九八二年全国有十一点五人，我省仅有七点三人，相差四点二人，在各省市中排列第二十一位。从在校生平均增长速度来看：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全国增长七点三五倍，平均每年递增7.1%，我省增长六点一九倍，平均每年只递增6.5%。居中南五省的末位，全国各省市的第二十二位。高等学校是出人才的基地。我省高教事业的落后，对各战线专业人才的配备产生直接的影响。据一九八一年底的调查，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全国是0.9%，我省是0.6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交战线，技术人员只占职工总数1.76%（全国是2.8%）；农业战线，科技人员占农业人口0.023%，其中大专水平的只占农业人口0.009%；财贸战线，有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只占职工总数0.45%；政法战线，大专水平的法律人

才只占司法干部总数的1.4%；普教战线，全省高中合格教师（本科毕业）只占36%，初中合格教师（专科毕业）只占15%。

二、缺口大，短线多，同四化建设的要求相脱节。我省现有普通高校在校生中，按门类划分，财经只占2%，政法只占0.1%，成了两大缺口。如果除去部属院校，省属院校不仅政法、财经、管理是大缺口，就是工科中不少专业如能源、交通、轻工等，以及我省急需的外语等，也都是缺口短线。因此，目前我省高校的结构、规模状况，远远无法适应四化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以一九八三年大专毕业分配为例，各战线要求分配毕业生共四二〇〇〇人，但实际只能满足五分之一。工科全省需要数一二〇〇〇人，实际分配数一二六七人，占需要数10%；财经全省需要数四〇〇〇人，实际分配数一七三人，占需要数4.3%；政法全省需要数九六〇人，实际分配数五十三人，占需要数5.5%；英语全省需要数七二三人，实际分配数六十六人，占需要数9.1%。一些专业尤为短缺，如食品工业需要一四三人，但一个也分配不到；电器需要一六一人，农业经济需要八十四人，国际经济计划与管理需要一七八人，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需要七十二人，而实际分配只是一至二人。今后随着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办好经济特区、开发海南岛和南海石油等，更是需要大量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我省高教事业再不加速发展，则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将更为严重。

三、条件差，水平低，与培养人才的质量要求不相适应。据统计，省属院校的校舍，按现有在校生计算，尚缺一〇七〇〇〇平方米，有半数院校缺图书馆，有三分之二院校缺合格规格的运动场。各校实验室和宿舍普遍紧张，以至仪器设备堆放走廊，不少师生还住旧仓库、茅棚和危房。仪器设备欠缺、陈旧，按教学大纲要求，基础实验课只能开出50—70%，专业实验课开出率更低，而需要高级设备的实验和理工科学位研究生的实验，则几乎近于空白。办学条件的限制，使我省高校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在全国处于较低地位。以授予学位为例，全国首批能授予博士学位的学校一五一所，我省只有四所，占2.6%；全国首批能授予硕士学位的学校三五八所，我省只有九所，占2.5%。我省省属院校上报申请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三十三个，因条件不足，只获准十二个，占申请数36.8%。

造成我省高教事业的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我们教育部门本身来说，主要是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缺乏周密的调查研究，事业发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教育结构比较单一，缺乏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老校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等。但根本的一条，就是高教工作还未真正被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过去由于‘左’倾思想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在我们党内相当普遍、相当长期地存在着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它严重地妨碍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有“左”倾思想的人，不尊重科学，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甚至错误地把知识视为异己的力量，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与劳动人民对立的阶级。这种思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就走到了毁灭科学文化教育，对

广大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极端。小生产的观念，与“左倾”思想是有联系的，但它更侧重于表现出缺乏现代科学眼光，视野短浅狭隘，保留着传统的小生产规模和传统教育的观念，看不到现代大工业发展带来的种种重大变革，看不到现代教育科学在大工业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更看不到现代教育的一些特殊规律，只求眼前功利，不图长远效益，结果往往导致把教育看成是单纯的消费和包袱，所谓“生产是硬任务，教育是软任务”、“先经济，后教育”的观点，就是这种小生产的狭隘性和保守性的反映。我省高教事业的落后，与这两种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结果，突出反映在高教事业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长期比例失调，高教事业经费和基建投资比例不仅没有发展，甚至逐年下降，在省财政总支出中简直到了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高教事业经费占省财政总支出：“一五”期间为8.81%，“二五”期间为8.58%，“三五”期间为1.88%，“四五”期间为2.52%，“五五”期间为1.2%；高校基建投资占省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是：“一五”期间为1.02%，“二五”期间为0.4%，“三五”期间为0.05%，“四五”期间为0.27%，“五五”期间为0.016%。从两个比例数来看，这种下降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状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和其它中央负责同志一再呼吁之下，有所改变。近年来，我省高教事业经费和基建投资逐年略有提高，但是，还没有恢复到“一五”、“二五”期间的水平，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也还偏低。一九八一年按人口平均教育经费，全国是九点九三元，我省是九点六三元，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排第十五位；其中高教经费按人口平均，全国是二点一六元，我省零点八二元，在各省、市、自治区中排第二十二位。作为广东的同志，应该对这种严重落后的状况深思。正如千家驹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如果现在我们仍不正视教育的落后状况，不重视加大教育的投资，那么，将和五十年代的人口问题一样，在不久的将来，终有自食其果，噬脐莫及的一天。鉴于教育投资的效益周期较长，这个问题，更应该早抓，抓晚了就要被动。

三

我省高教事业长期落后，起点低，今后如果仅按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发展，不可能迎头赶上，到一九九〇年相对地将比现在更要落后。教育部设想在八十年代中，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增长一点五倍，即从一九八〇年招生二十八万人，发展到一九九〇年招生七十万人以上；在校大专学生增长一倍，即从一九八〇年在校一一四万人，发展到一九九〇年在校二三〇万人，平均每万人口有大学生二十三人（假定总人口数不变，下同）。我省如果也是招生数增长一点五倍，在校生增长一倍，则一九九〇年在校生达到八八〇〇〇人，平均每万人口约有大学生十四点六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少八点四人，差距比现在更大。所以，要迎头赶上，必须下决心采取比全国更大的增长速度。我们设想如果八十年代中，招生数增长三倍，一九九〇年达到四〇〇〇〇人，在校生数增长二点一三倍，一九九〇年达到一三八〇〇〇人，则平均每万人口有大学生数，可达到教育部设想的全国平均

水平。另一方面，成人高等教育，包括广播电视大学、业余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职工大学、农民大学、干部学院等，更要积极发展，如果一九九〇年能招生五万人，在校生达到十八万人，比现在增长七倍，平均每万人口的在校生数，亦达到教育部设想的全国平均水平。

我们认为，为了实现上述加速发展的设想，必须抓好三项关键性的措施：

一、充分发挥现有普通高校，特别是中央部属院校的潜力。各高校都应千方百计挖掘包括师资、设备等方面的潜力，多招本、专科学学生，有条件的增招研究生，扩大办学规模。如中大、华工、华师等校可扩大到万人以上规模；要根据本省实际需要，调整现有专业口径和培养目标，增设本省缺口、短线专业；要重视抓好重点学科、重点专业的建设，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要多层次、多类型办学，本科院校同时办专科班、干部专修科，接受地方、部门委托培养，举办分校和支援新校，举办函授、夜大学，以及各种短训班。

二、充分调动地区、部门、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开辟多条渠道，采取改建、新建等多种形式，逐步形成我省布局合理、门类齐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教体系。主要考虑在现有院校基础上，扩建一所省属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和一所多科性农业院校；加快汕头大学、深圳大学、海南大学、财经学院的建设；把一两所条件较好的师专改为师院；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在我省创办石油、海运院校；建议广州、佛山等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以及某些部门或大企业，与普通高校协作或联合办学，发展短期、收费、走读、不包分配的职业大学，为本地区、本部门培养人才。

三、大力发展成人高等教育。近两、三年内，要求逐步做到我省所有本科院校和有条件的专科院校，都办起函授大学和夜大学；建成我省电视大学教学基地和教育电视台，开办本省需要的专业，招生扩大到全省各县、市；各中等城市都办一所业余大学，各地区（市）办一所高级农业技术专科学校（农民大学），把有条件的省、地（市）一级干部学校改办为干部学院。同时，今年内要建立省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及办事机构，并公布第一批考试专业和科目。

总的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已日益为愈来愈多的同志所认识，党和人民对我们寄予很高的期望，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的。今年春，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努力开创我省教育事业新局面的决定》，其中对高教的加速发展作了财力、物力、人力上的部署规划。我省高教工作还是有基础的，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也很多，我们满怀信心，振奋精神，以邓小平同志的文选为指针，为努力开创我省高教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陶行知的人才学思想

孙传华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探索人才成长的规律,陶行知是开创者。他早在1919年写的《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就认识到培养人才对于国家建设与民族兴亡的重要意义。后来他在的一封信中又强调,“整个世界都是向着科学猛进,我们中国必须受科学的洗礼,才能在科学的世界中适于生存。但是要想创造科学的中国必须培养科学人才的幼苗才能达到目的。”^①在三十年代初,陶行知为了振兴中华、抵御外侮,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倾心研究世界出身于学徒、工人的科学家的传记,探索他们成长的主观和客观因素。

陶行知在从事人民教育事业的三十年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人才成长的规律和培养人才的方法,并付诸实践。在他发表的数百篇论文中,有许多是直接论述人才问题的。他的研究,虽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人才学,但是总起来看,他的论述涉及到人才成长的一些主要方面。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育才学校》一书,是陶行知遗留下来的一本比较完整的关于培养人才的论著。其中有许多独创的见解。这是他几十年呕心沥血为中华民族培养人才的结晶。

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

为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为谁服务?这是培养人才的根本方针问题。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民为贵。人民第一。一切为了人民。”^②“一切的学问都要努力向着人民的幸福瞄准。”^③在教育界陶行知是最先明确地解决这个根本原则问题的。他的许多论文、诗歌、书信中都充分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第一的观点。

在他看来,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是手段,为人民服务是目的。以前,“以为士大夫是人才。殊

不知人才的新解释是抱有学术为大众除痛苦谋幸福的人。”^④他立定宗旨“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他坚决反对造就一些人才出来为着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做人上人,认为培养人才要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要为整个人类谋利益。因此他要求学生要做到“每天四问”,即每天问一问我的身体、学问、工作、道德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这四方面是结合为一体而不可分的。只有做到四进步,达到德智体全面发展,才是人民有用之才。这四个方面的道德的进步是最根本的。“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做恶愈大。”^⑤正如列宁说的,“道德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服务的。”^⑥一个人有学问有才能,固然重要,但是道德好是第一位的,是统帅。

陶行知说的道德好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而献身。他自己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李维汉同志说,“陶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育了人民,又锻炼了自己的思想,才能,道德,文章,成为一代完人。”^⑦

一位有成就有才能的专家,科学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位有高尚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陶行知认为,“科学的使命是要造富的社会,不是造富的个人。”^⑧“科学该做养人保人的工具,不该做杀人的凶器。”^⑨因而他严厉谴责那种崇拜金元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科学家。1932年他在《血染的诺贝尔奖金》一文中指出诺贝尔起先制造炸药,原是为了开采矿石之用,后来为政府所诱惑“诺贝尔不惜屈科学家之尊严,为军人造杀人之凶器。和平奖金之建立乃是诺贝尔晚年忏悔之表

示。”^⑩他愤怒地斥责马可尼拿着无线电发明向帝国主义投效，充当墨索里尼屠杀阿比西尼亚人民的“科学刽子手”。此人曾亲赴东非前线去实验屠杀法。因此陶行知称这种人为“科学强盗”“科学走狗”“科学刽子手”。1935年当马可尼来到中国的时候，有几位科学家邀约陶行知去欢迎，陶行知不仅拒绝，还告诫青年科学家要与马可尼这个科学丑类划清界限，不要学马可尼拍卖科学。^⑪

陶行知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1936年他在《中国大众教育》一文中，讨论“什么是前进？”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反日是前进，反封建是前进。世界观的是前进，狭义的国家主义是落伍等等。他经常教导青年爱国是个人的本分，“我觉得凡是脚踏中国土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应当爱中国。”^⑫1938年中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陶行知向文化艺术界热诚地宣告：“告音乐天才，有音乐天才的朋友不要把自己的天才在靡靡之音上浪费掉。你们要站在民族的联合战线上来，替大众写乐谱。”“告文学天才，有文学天才的朋友不要为文学而文学，也应该加入大众的队伍里为大众写歌词。”^⑬

现在“科学已经被屠户用做杀人的利器。我们应当从屠户手里夺过来。……拿科学抑强扶弱。”^⑭

陶行知所要培养的人才，正是这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才。是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的人才。

克服大难以致于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陶行知深知人才难得，人才的成长发展有一段比较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才的培养教育采取什么方式最为有效，人才成长的道路是怎样的？就成为他毕生操究的课题。

人是不能离群索居的，都是社会中的一员，他的成长以及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都要受客观环境的制约。古今中外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的成长，都经历了自然的和社会的种种磨炼，走过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陶行知认为自然界和社会环境，都有两种大的力量，一是助力，二是阻力。这些客观因素对人才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助力是扶助人类生长的东西”，“阻力是与人为难的东西”。助力和阻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

互相转化。有时阻力使人才的成长受到挫折，以致在创造中失败。但是这个挫折或失败都不是绝对的，是前进中的迂回。有阻力为难挡路，也会有助力扶助提携。因此失败包含着成功的因素。科学试验往往是经过千百次的失败而最后取得成功的。

自然界或社会环境中的助力也好，阻力也好，都是作用于人的客观因素，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对于个人来说，则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即使阻力很大，也要有与困难搏斗的精神，并能以苦为乐，最后必然获得成功。所以陶行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单有母亲不能生子，成功之父是谁？奋斗是成功之父”。^⑮又说，“逆境令人奋斗，生长历程中发生了困难，才能触动思想引起进步，人的脑袋就是这样长大的，文明也是这样进化的。”^⑯只要自强不息阻力可以转化为动力。陶行知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中经常援引世界知名科学家来说明这个道理，以勉励大家。爱迪生十二岁因迷恋于科学试验，读了不到三个月的书，就被当时美国顽固保守的教师以“坏蛋”之罪名开除出校，这是他成长中的阻力，后来幸得其母的了解和支持，终于成为近代的大发明家。发电机原理的发明者法拉第，在订书厂装订图书时，一面钉书，一面看书，因此钉得慢，其他学徒就到利波老板那里去告状。这是拉法第的阻力，他面临失业的危险。可是老板利波却说拉法第是一面钉书，一面吃书，书钉好了，头脑也吃饱了。谁这样我都马马虎虎。由于开明老板的谅解，对法拉第的成才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陶行知劝告做父母的，当教师的，要象爱迪生的母亲那样，懂得爱护人才培养人才。

要与阻力搏斗就不能怕苦，怕难。那么怎样认识和怎样对待人生的苦与乐呢？“人生是患难与欢乐织成的，追求真理的人，以与患难搏斗为乐。唐僧向西天取经遭遇八十一难，不知者以为他是自寻苦吃，其实他是抱着一个宏愿要完成，看破生死，乐而忘苦，总之，人生与患难有不解之缘。患难给有志者以战斗之情绪与战斗之智慧。”“有了战斗之情绪与战斗之智慧，还必须有战斗到底之意志，才能克服大难以致于成。”^⑰这既是陶行知对世界著名专家学者成功之路的认识，也是他对自己创业经历的总结。

向创造生活前进

陶行知从事人民教育的一生，就是不断革

命，不断创造的一生。早在1919年他就提出“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的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就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创造开辟都要胆量”。^①人类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社会的发展，都是人们创造劳动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指出，“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特点。”^②陶行知认为“人的特别本领就是不靠自己的身体为工具，文明人与野蛮人的最大分别就是能把这些非身体的工具发明得格外多，制造得格外精巧，运用得格外普遍。”^③显然，培养人才，就是要充分发扬人的这种自觉的能动性。

在探讨陶行知的人才学思想时，我们不能忽略成为一个伟大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本身，就是值得人才学研究的一位杰出的人物。这不是本文探讨的主题，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陶行知在培养人才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在教育事业上的许多创新都表明了他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他的成功是善于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去办人民的教育事业。因此他的办法很多。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

从晓庄学校到育才学校，陶行知都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及客观需要创办的。育才学校的方针、路线、政策、计划，措施等等都是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制定出来的，他又有新的创造和发展。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教育的方法论，他十分强调“做”，在他看来，“古今中外所发现第一流的真知灼见，无一不是从做中得来。”因此，他也就非常重视培养人才的创造力，提倡在创造中学习创造。他还说，“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他能启发解放儿童创造力以从事创造之工作。”陶行知自从在美国留学回国以后，一直是向着创造生活前进的。

不论是举办平民教育、晓庄师范、还是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他都各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在当时的教育领域中独树一帜。

《育才学校》这本人才学的论著，正是陶行知在创造中提炼出来的，第一流的真知灼见。他根据儿童的心理特征制定了“育才三方针”即迷悟

爱。所谓迷，就是根据儿童常常迷在某种特殊活动的天性，用特殊方法来培养；所谓悟，是根据儿童的一般智力，给予普通的教育，使他们获得更广泛的知识，以便更深的了解他们的特殊活动；所谓爱，是根据儿童具有愿意帮助人的倾向，在集体生活中培养他们对民族、人类有自觉的爱。迷悟爱这三者是不可分的，其中心是向着创造生活前进。

1943年11月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陶行知的《创造宣言》。这一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也对育才学校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封锁。陶行知就是在这危险的关头向全校师生宣读并发表《创造宣言》的。其目的是鼓舞大家的斗志，在创造生活中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他号召要用大无畏之斧，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开出一条生路来。

在《创造宣言》中。陶行知批驳了种种胸无革命大志，毫无创造精神的懒汉懦夫思想；树立了中外历史上和现实中勇于创造的人物的榜样。略举一、二例：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毫画他几笔，便成了一幅名贵的杰作……。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生了正气歌，产生了苏联的国歌。还有人说什么年纪太小，不能创造。太无能了，不能创造。山穷水尽，等死而已，不能创造。凡此种种，陶行知认为都是懒惰者之遁辞。“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白米饭，除造粪之外，便一无贡献么？”他提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前进吧。”^⑤

育才师生在陶行知《创造宣言》的鼓舞下，一个以提高教学与研究水平的创造活动深入的展开了。大家认为“没有研究，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育才！”“一切为了创造，创造为了除苦”。从而形成了集体研究，集体创造的学风。师生中的各种学习或研究组织纷纷建立起来。文学组成立了“佚名社”研究《阿Q正传》，“榴花社”“浪花社”研究诗歌创作；戏剧组的“夜莺社”则创作剧本，研究戏剧；音乐组成立了“育才合唱团”；绘画组创立了“绘画研究会”，建立了“儿童美术馆”，经常举办“星期画展”；社会科学组出版“小时潮周刊”。此外，社会组还经常举办

别开生面的时事晚会，他们曾把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以活报剧的形式，用艺术手法搬上舞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然组成立了“谈天会”探讨天文。他们还编演了“化学之舞”，把化学元素人格化，通过歌舞表示他们的来历，化合，分解以及用途等。他们把科学内容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使人们在欣赏艺术中获得自然科学的知识，这是他们独特创造，陶行知认为教育者“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的创造理论和技术”。陶行知创造了这两者。

吴玉章同志非常赞赏陶行知的革命精神和创造精神，说：“凡一切过去的思想，学说，理论，制度等等都要经过理性的裁判，如有不合理的，即使人人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也大胆的要反对，要革命”。②创造性的劳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繁荣的源泉。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由必然到自由都是通过创造性的劳动而获得的。为了发扬创造精神，陶行知除了发表《创造宣言》外，还制定了《育才创造年计划》，写了《创造年献诗》，颁布了《育才创造奖金办法》。他的这一整套理论，方针和路线，主旨是指引求学者的方向，活跃思想，促进人才的发展和成长。而这一切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里进行的，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可是陶行知却说，我是崇拜自己的创造，故能乐而忘苦。

有特殊才能的幼苗应该加以特殊的培养

培养人才应采取什么方案才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的需求？这都是陶行知很早就关心研究的问题。

“儿童好奇，科学教育应从儿童时代下手”③早在1915年，陶行知即有这种见解。到了1925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小学理科之重要时又提到这个想法。尔后他在普及教育运动实践中，常常发现老百姓有许多穷苦孩子有特殊才能，因为没有得到培养的机会而枯萎了。“这个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深深地触动了这位人民教育家的责任感。他决心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幼苗。他说，不管是麻子、癞痢、缺唇。“只要有特殊才能，我们都应加以特殊之培养”。④

陶行知培养人才幼苗的理想，到1939年创办育才学校时，才得以实现。用特殊的方法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幼苗，育才学校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人才学思想。他从研究考察近代世界科学家的成长

史中得出两条经验：“一是科学要从小孩学起；二是科学的幼苗要象爱迪生的母亲那样爱护才能保全。”⑤陶行知把生活中常常被人们忽视的现象，提到培养人才的理论上来阐明，给人很大的启示。个人天赋的差异是客观存在，古今都有开智较早的“神童”，但是这些人才幼苗如果不及时给予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也会枯萎的。应该给有才华的青少年创造早成的条件。

分专业给予特殊的培养，是育才学校的特点。陶行知说，“特殊才干之幼苗一经发现，即从小教起，不但合于世界学问之幼年史实，即我们这短短两年的试验，也证明了路线之正确”。陶行知主张人才幼苗从小培养的观点，是从“百年树人”这一角度出发的，是有远见的。即使是十分有才华的人才幼苗，要成长为栋梁之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因此从民族的长远利益考虑，陶行知提出：“如果家里、学校里、铺子里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已被发现有特殊才干，那末立刻就应该给他以适当之肥料、水分、阳光，使他欣欣向荣”。他的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因材施教，务使各得其所的同时，育才也十分重视普修课的学习。“透过启发性的普通教育，我们培养和指导他们对特殊活动取得更深的了解，对人生各方面的关系和宇宙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取得更广的知识”。⑥为了预防并纠正专修课教育的偏狭性，陶行知要求在教学上应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使普修课联系专修课，找出他们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让各组专业的教师或比较深造的学生，提出他们的学习精华，深入浅出，向全校报告以丰富普修课的内容。这样，“普修课与特殊课之鸿沟打通，乃能达到一般的特殊与特殊的一般之境界”。⑦任何一种特殊才能的人，都必须有广泛的知识为基础才能有所作为。

掌握丰富的知识是人才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一般学校的传统教育方法是灌输式。陶行知认为，“活的人才教育是不灌输知识”“与其把学生当作天津鸭儿填入一些零碎的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钥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地去开发文化的宝库和宇宙之宝藏”。⑧这几把钥匙是，语文、数学、外语、科学方法——它包含治学治事各方面。四把钥匙是各专业都必须扎扎实实掌握的。但要求不同，对艺术部门的学生，数学只须达到足够处

理日常生活的程度后,即可任其选择。学习外文,陶行知则认为“知识之前哨丰富之学术多在外国,人才幼苗一经发现即须学外国文。至少一门,与国文同时并进,愈早愈好,风雨寒暑不使间断,若中途发现其不堪深造,则外国文即须停止,以免浪费时间”。^②实际上,在那时他已经注意到如何建立各种人才自己特有的知识结构问题。不论何种人才都应掌握四把钥匙,不同专业又应掌握专业基础知识,落实到每一个人,则应建立自己特有的知识结构。

不论是治事治学,都需要有科学的方法。得其法者事半功倍。在造就人才教育中,陶行知常常教人治学治事的方法。他乐于把点石成金的钥匙交给大家,他把做学问的方法概括为六个字,称为六字诀,即“一”、“疑”、“集”、“钻”、“剖”、“韧”。只要在这六个字上下功夫,“在做学问上一定有豁然贯通之日”。这六个字的要领是:

“一”即做学问要专一。陶行知很推崇荀子说的“好一则博”这句话。他认为“荀子的这句话是很有精义的,……世界名人学者对于治学的解释尚少有如此精约的”。^③在他《创造年献诗》中又进一步地阐述了这句话的含义:“荀教‘择一而壹焉’,莫跟鼯鼠学五技,凿井愈深口愈大,博学首要在好一”。^④一个人选择了一个中心题目去研究便可旁搜广引,自然就博起来了。

“疑”即存疑。在探索科学真理的过程中,要撕掉裹头布,思想要解放。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书本,“书若尽信不如无”。陶行知提倡发现问题抓住不放,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做到“源头之上搜证据”。

“集”即搜集。选定了研究题目后,就要掌握丰富的材料。陶行知解释“集”字照篆字的写法好象许多钩钩一样,搜集材料就要用许多钩钩到处去钩,钩集到一起来好细细研究。

“钻”即深入的意思。钻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钻得进去。做学问要象地质探矿那样的钻,采用最好的方法,“深入到里面去,探获学问的根源奥妙与诀窍,而且会有很好的收获”。

“剖”即解剖分析。搜集了许多材料,深钻下去还不够,还必须解剖出来明辨真伪,以便取舍。如此“鉴别材料,慎选材料自然因应适宜了”。

“韧”即坚韧。陶行知认为,做学问要用韧性战斗的精神。历久不衰,始终不懈。

陶行知把这六字诀教给育才学校的幼年研究生,让他们确定研究主题,不断收集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当时有二十多名幼年研究生,他们写出了四个剧本,二十多支曲子,研究报告有十余种。有位研究苏德战争的,写出了二十万字的报告。著名历史学家葛伯赞到育才讲学以后称赞说,陶行知办的教育是革命教育,人民教育。他“所创导的育才幼苗教育,已经有些成果。十几岁的孩子居然能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自己导演自己编的剧,而且还能写出短篇创作,在座谈会中,能够分析时局。这些,都证明了天才教育是一种适合于人类智慧发展的教育”。^⑤

陶行知为中华民族培养人才的思想,是我国文化教育宝库中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发扬他艰苦办学,勇于创造的精神,研究他培养人才的理论和方法,为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1982年10月

①②③④ 陶行知《行知书信集》1981年10月安徽人民出版社第362、39、209、75页。

⑤⑥⑦⑧ 陶行知《育才学校》1951年4月上海教育书店第15、75、16、13、15页。

⑨⑩ 《陶行知文集》1981年8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20、387、476页。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陶行知教育文选》1931年3月教育科学出版社第63、333、345、290、238、43、8、60、300、268、281、278、287、302页。

⑳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55页。

㉑ 李维汉《对人民忘了自己》,《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第19页。

㉒ 吴玉章《回忆陶行知先生》(同上)第15页。

㉓ 葛伯赞《我和行知先生》(同上)第150页。

㉔②③④ 陶行知《斋夫自由谈》第222、115、49、222页。

㉕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全一册第445页。

㉖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8页。

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 辩证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李秀潭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的科学理论，经历两个时代的历史检验，闪耀着更加夺目的真理光辉。然而，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它在发展进程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因此，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当今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史的角度，就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些初步探讨。

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的主要功绩。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自然成为马克思一生理论活动的中心。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刚刚创立自己的新哲学体系，向整个旧世界提出挑战时，就以特有的理论敏感，通过对劳动异化的剖析，精辟揭示了社会主义矛盾运动的趋势和归宿。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以此为指导，揭露和批判了各种假社会主义的实质，科学地预见了社会主义辩证发展的基本轮廓，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创造了一个时代”。（《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22页）

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结合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实践，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揭示革命的经济根源，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这一思想作了经典的论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摒弃了那些把社会发展归结为少数英雄豪杰的意志和思想的各种唯心主义说教，

扫除了形形色色宿命论的迷雾，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推动下，不断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理论是理解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钥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一八六七年，马克思倾尽毕生精力写作的《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在这部著作中他虽然分析的是整个人类社会辩证法的局部情况——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辩证法的分析，对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后，随着革命工人运动范围的扩大，把在新条件下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到了首位，为确实理解原始社会历史提供了钥匙的摩尔根的伟大发现等历史科学的新成就，要求给以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同时，恩格斯利用自然科学领域三个伟大发现，专门深入地研究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这些因素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广阔背景上，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光辉理论，科学地预见到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精辟地概述了两个阶段的特征。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可以有计划来运用生产资料，但是，还存在着按劳分配的不平等的矛盾，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这就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在分配上和社会分工上的矛盾。同时，马克思还从世界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分

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由英国转移到法国，随后又转移到了德国的发展趋势，修正了在他们革命活动前期关于社会主义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在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观点。

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的论述，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对资本主义矛盾发展趋向进行严格科学研究后提出的科学推测和设想，是探讨未来社会的出发点和进一步发展的总方向，它需要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验证、修改、补充和发展。

二

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二十世纪，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新条件，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的新结论，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的学说。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的理论，同马、恩相比较就不只是科学的预见，而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列宁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的经验，深刻地有远见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辩证发展的一般规律必然变更形式的趋势，并概括了发展的一般辩证规律在新情况下的表现、作用及其新特点、新形式，从而为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指明了方向。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一伟大认识工具，认真研究了社会主义的矛盾运动，揭示了社会主义矛盾运动总的规律和特点。他一方面指出，社会主义与旧社会不同，对抗性的矛盾“将消失”；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人类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发生作用，非对抗性的矛盾“将仍然存在”。同时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非阶级的‘经济斗争’”，表现为人们分配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工农之间以及工人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列宁选集》第4卷120、460页）列宁精心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本质、发展趋势和解决方法。他指出，

非对抗性矛盾的本质在于矛盾双方之间虽有差别，但是共同性突出。例如，工人阶级和农民都是劳动阶级。这种非对抗性矛盾的运动趋向，是导致代表着这些矛盾的阶级集团等力量的接近，这些力量团结的因素的增长和巩固。在关于社会主义非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法中，列宁注意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立面斗争的特殊形式的地位和作用，特别重视“自下而上”的、来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批评，强调树立先进的范例这种形式的重要意义。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列宁对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思想。特别在一九二三年，列宁在病榻上回顾苏维埃五年多来走过的道路，展望社会主义发展前途时，针对俄国的落后和它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飞跃”之间的矛盾，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在克服和解决社会主义矛盾中的意义和作用。列宁逝世前写的被称为遗嘱的几篇文章，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机关的民主化问题，反对官僚主义问题，反对过分集中问题以及合作社的作用问题，等等，就是着重从理论上和实际措施上探求解决这方面问题的。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列宁的学说，并从苏联的实际出发，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没有剥削和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在概括和总结二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理论。诸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矛盾学说，对新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进行了具体分析，初步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在苏联完成了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根据社会阶级结构的变更，及时提出苏联已消灭剥削阶级的论断，以及消灭阶级和消灭工农阶级差别这两项任务可以分为两步走的思想；社会主义事物发展的特点是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步衰亡；社会主义条件下，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与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等等。

当然，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也出现过失误和片面性。例如，斯大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

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不正确论断，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再如，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斯大林对剥削阶级消灭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未能做出科学的分析，而是以同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为轴心而“左”右摇摆，并在实践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三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展开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探索了这些矛盾的种种特性及其特殊的解决方式和途径，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初期，我党从过渡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即采用和平改造的办法，把人的改造和对经济的改造结合起来进行，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的论断进一步具体化。

党的八大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教训为鉴戒，并针对五十年代苏联理论界一些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已不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是对立面（或差别）的融和等形而上学观念，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矛盾进行了分析，作出了新的结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创见和主张，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战略性的理论根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反映了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关于社会矛盾问题的崭新分析。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第一次发表了他提出的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

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完整学说，对两类社会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方法，作了全面的论述；依据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分析，提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并科学地总结了我国和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力求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关于经济学的笔记、十年总结，直到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都提出对社会主义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问题。除此之外，毛泽东同志还揭示了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发展的客观规律。一九六三年，毛泽东指出，“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转引自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这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单独胜利实现，但社会主义国家却不可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的条件下单独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需要经过若干代人长时期的努力奋斗。

可惜的是，对于这些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性的理论问题，当时全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在思想认识上没有很好扎下根；加之，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以致未能把这些理论全面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认真加以贯彻执行。诸如，片面夸大上层建筑的作用，政治的作用、精神的作用（以及个人意志的作用），始终把阶级斗争提到第一位，把全部社会活动归结为政治运动，往往撇开生产力的状况，抽象孤立地看待生产关系的先进与落后，企图通过人为的生产关系的急速变革，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导致“左”倾错误的原因之一。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把本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的阶级斗争视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利用，酿成了持续十年的“文革”内乱和危机，使我国社会主义发

展遭受严重挫折。

四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过程中，在总结正反两方面丰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状况的周密考察和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情况和新闻问题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在当代中国得到运用和进一步发展。

总结近年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的认识，最大的理论成果在于，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透彻地研究和了解中国的特殊矛盾，全面地考察和识认我国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命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结合拨乱反正，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做一番溯本求源的研究，从而深刻地把握了社会主义本质，把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和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过的种种具体模式区别开来。其次，对我国的国情，即我国各方面的基本情况进行前所未有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包括我国的自然环境、人口、各方面经济发展的状况，科学、教育、文化发达的程度，社会其他各种要素，我国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矛盾；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和从建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至三中全会以来的变化；不利条件和有利因素。正由于对以上矛盾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全面的考察研究和综合分析，才能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般的东西、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特殊的东西、现实）之间，找到最优的结合方式。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的报告等中央文件中，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讲话中，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轮廓和主要点作了明确规定，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这些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表明我们党已经开始找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它包含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思索，蕴含着对我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丰富经验教训的总结。

其次，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科学分析了我国当前社会矛盾在各个领域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提出了解决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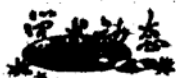
不同领域特殊矛盾的途径和方法，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诸如，在经济领域，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总结过去经济发展的曲折历史和研究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过程中，对生产关系的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进行了调整，在所有制结构上适应生产力多层次结构的需要，实行了坚持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使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从而使矛盾各方面互相促进、互相补充，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经营管理和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实行了经济责任制，使各个经济主体与劳动者责任、权利和利益密切联系起来，把人的劳动和人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起来，把发挥物质利益的动力杠杆作用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效地统一起来，从而正确、合理地解决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充分调动了劳动者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从而也就找到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实行生产责任制使社会主义事业在经济上获得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政治领域，我们党运用毛泽东同志的两类矛盾学说，分析了社会主义现阶段阶级结构的变化，论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矛盾总体中的地位和影响。党中央明确指出，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不再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主题。但是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因此，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阶级矛盾，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党中央确立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这不仅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而且从政治上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就使社会主义在政治上获得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思想文化领域，为了正确解决思想领域存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革新与保守、新与旧等矛盾，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充分肯定科学、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知识

分子的重要作用。特别在十二大，党又提出了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不仅为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思想领域的矛盾指出了根本途径和方法，而且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这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出的新的结论。

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方法是逐步改革。这也是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总目标的唯一有效途径。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就是破旧创新，改革应成为我们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改革应贯穿四化的全过程。这样，就把改革提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方法的高度。这一新结论的提出，对于实现从不发达、不成熟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发达的成熟的社

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党中央近年来关于无产阶级在执政条件下，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关于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首先是一种运动的思想；关于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同外国共产党关系的原则等许多重大问题的提出，都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进行了探索和总结，使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得到具体充实、丰富和发展。当然，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它在学习过程中需要不断由实践来修正、检验，赋予活力。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的科学理论也将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广州举行“关于发挥广州中心城市作用问题讨论会”

由广东经济学会、广州市委研究室、市计委、市社科所及市城市经济学会联合发起的“关于发挥广州中心城市作用问题讨论会”，于七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总干事、中国未来研究会顾问童大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顾问李更新，上海、天津、重庆、哈尔滨、沈阳、武汉、广西等地的专家学者及广州地区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的专家、教授和市属各部门的同志共一百五十多人。会议共收到论文七十多篇。会议围绕怎样认识广州的特点和优势、地位和作用，在体制上、政策上要解决些什么问题及广州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十二位省内外专家、学者分别就发挥沿海中心城市的作用的重要意义、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发展方向、广州对广东经济的关键作用等问题作了大会发言。上海、重庆等地的同志在会上谈了如何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省、市负责同志任仲夷、梁灵光、许士杰、叶选平等同志到会并听取了部分讨论发言。

（小明）

精神生产在社会生产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胡吉良

我们从理论上弄清创造精神文明的活动即精神生产在社会生产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能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更加自觉地贯彻十二大的精神。

长期以来，国内外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都主张社会生产是指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不属于社会生产范畴。这种否定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组成部分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社会生产作为人类创造自身生活资料的活动，从不同的关系上考察，它的范围是不一样的。从经济学上来看，社会生产就是物质生产。因为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经济结构，而“首先是物质生产”。①社会生产的经济学意义就是揭示人类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活动的性质、方式、作用和发展过程。然而，社会生产又是一个哲学范畴。哲学是从人类社会的一般过程和一般规律来研究社会生产的；在这里，社会生产具有基本的和全面的两种意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总是从狭义的和广义的两个方面来分析社会生产的范围。社会生产的基本形态是物质生产，“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②物质生产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强调社会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常常从狭义上对它作了规定，把社会生产和物质生产等同起来。

这种狭义的理解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经济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关系，研究社会生产首先要从经济的方面出发，而这种狭义的理解正好抓住了社会生产的根本方面。它对于揭示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历史发展的一规律很有必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划分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再从物质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来。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要求从广义上来分析社会生产的范围，把它作为创造人类生活的全面的、完整的生产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物质生产，同时又提出了“全面生产”的概念，明确指出，“全面生产”也就是“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是“整个世界的生产”，其中“也包括精神的生产”③。从全面生产的范围看，物质生产仍然是单方面形式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重要著作中，例如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当中，提出了“精神生产”、“意识生产”、“艺术生产”、“科学生产”等概念，表明了他们关于精神生产的思想的一贯性。另外，还应当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全面生产还包括了生命生产。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也常常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两种形式，认为非物质生产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但这是有前提的，即相对于物质生产来说的，和那种完全排除精神生产的观点有原则的区别。所以这种区分并没有妨碍他们肯定其他的非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产。马克思在专门分析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区分的理论时说道：“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对于斯密所考察的东西——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且是这种生产的一定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

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精神生产中，表现为生产劳动的是另一种劳动，但斯密没有考察它。”④斯密从经济学上来研究资本主义物质财富生产，因此他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两种形式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马克思肯定了这一点，同时又指出精神生产劳动表现为另一种生产劳动，并且分析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辩证关系。

有些同志也许会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是讲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的反映，就好像精神是物质的反映一样，而不是把精神生产看作一种相对独立的生产形态。其实不然，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精神生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思想、道德、艺术、科学等等本身的生产，一方面是创造这些生产成果的物质表现形式的生产，如印刷、雕塑、设计等等活动。前者可以说与物质生产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后者就不是这种反映关系所能包容得了的。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精神生产是创造人类精神生活资料的活动，是和创造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相对独立的，讲的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⑤

精神生产之所以是社会生产的组成部分，乃是由于生产本质上是社会的。每一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进行生产。当人们创造自己生活资料的时候，立即就会遇到他们在其中活动的社会条件、进行生产的目的等等，这使他们的生产一开始就带上社会的性质。生产的社会性表现在：一，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生产；二，也是更基本的方面，生产是人类创造自身生活即社会本身的整体活动。生产的最终目的和结果是生产人本身也就是生产整个社会机体本身。马克思说：“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⑥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生产自己，不是生产自己的某一方面，例如单纯的外界适应能力，而是生产自己的全面性，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种的繁衍。因此，也就是生产社会机体，即社会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因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可以说是人的类生活、是类的全面性。在这里，单靠物质生产显然是不够的，应当依靠人类创造自身生活的总和活动，这就是全面的、完整的社会生产。

马克思多次提出和论述了“生产一般”的概念。所谓“生产一般”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生产的共同特性，二是指各个特殊生产部门、生产形态的总和。所以马克思又常常使用“生产的总体”、“生产生活”、“类生活”等概念来表述社会生产。可见，社会生产乃是人类社会生活本身。如果从这个整体上来考察社会生产，那末，人本身也即社会机体本身总是表现在生产的社会过程之最终结果的本质中，而物质生产即“直接的生产”只是作为一个因素表现在总的生产运动过程中。物质生产虽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它并不直接生产出社会的思想、道德、文化、艺术和科学，也不直接生产出另外一些人，它只是在最终意义上表现出对这些非物质财富的决定作用。

直接生产出思想、道德、文化、艺术和科学等精神财富的是精神生产，是从事理论、文化和科学工作以及从事印刷、雕塑、设计等工作的人的劳动。人类生活不外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创造精神生活资料的劳动和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具有同样的性质，都是人类的生产活动。如果说，物质生产直接生产出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那末，精神生产则直接生产出人们的精神生活资料，而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生命生产的有机统一则生产出整个人类生活。一个社会，如果不进行精神生产，同样也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人们将会倒回到动物群体生活中去。当然，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但如果认为它们的区别表现为生产和非生产的区别，那就不对了。在对人类自身生活生产的特定关系上，两者共有生产的性质，而不是共有生产的术语。社会生产不仅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而且是一个多种形态统一的系统。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在从事精神生产和生命生产。只有在这三种形态的统一中，才能揭示生产的社会性、整体性和全面性。

二

在社会生产系统中，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既是相互独立存在，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

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种特殊形态，但受物质生产一般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指出：“从物质

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⑦就是说，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精神生产。人们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两者的统一正是一切精神活动的最坚实的基础。精神生产的任务主要是创造反映自然和社会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可是，人们只有在生产活动中才能不断地认识自然和社会，获得科学研究的材料，开拓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因此，每一时代的精神生产始终是该时代物质生产的直接或间接的体现。社会科学研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思想道德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直接受生产关系的制约，生产力则表现为最终的决定作用。教育、文学艺术和哲学等，就其性质来说，是直接决定于人们社会关系的；就其内容来说，既概括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又反映了物质生产的内容和水平，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至于自然科学，主要是受生产力发展决定的，人们对自然的改造产生自然科学研究的需要，提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材料和实验手段。每一时代的精神生产都是在该时代物质生产基础上进行的，虽然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文学艺术在反映生活和物质生产的形式和深度方面有些可能会高于以后时代的文学艺术，但就其整个内容和总的水平来说，都无法超出当时的物质生产方式。在阶级社会中，“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⑧

然而，精神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形态，在物质生产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精神生产主要是通过各种精神成果来影响物质生产的。物质生产不能离开思想和科学文化的指导。这是因为物质生产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总和活动，不能没有人们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不能违背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规律。即使在生产极端落后的原始公社时代，人们也必须根据对谷物生长、牲畜饲养及动物生活习性的粗浅了解来种田、牧畜和狩猎。在这里，立即就表现出精神生产的巨大作用：没有精神生产，就不可能进行物质生产。正如胡耀邦同志在谈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说的：“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⑨

一般来说，精神生产通过自己的成果从四个方面影响着物质生产：其一，规定物质生产的方向；其二，指导物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其三，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生产积极性；其四，指导生产工具的改革。不过，精神生产的不同部门对物质生产又有不同的影响，我们应当作具体的分析。

人们的政治思想是完成经济任务的重要保证：一方面，政治思想规定了物质生产的方向；另一方面，经济任务提出以后，必须用正确的思想来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劳动者的生产目的明确，劳动热情高涨，便能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挖掘生产潜力，以有限的生产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哲学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这对于人们掌握物质生产规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人们研究生产、流通各个环节工作中的道德问题，对于建立生产文明、商业文明，促进文明生产和文明经商具有很大意义。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经济管理等各门经济学科，从不同的方面研究了物质生产过程，成为制定生产规划、实施生产管理的理论指导。而规划与管理却是每一时代、每一部门物质生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科学是生产力。科学物化于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成为生产过程的直接要素。科学的作用在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知识和生产技能，指导生产工具的改革，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提高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所以，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乃是衡量该国生产发展水平的主观尺度。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决定了这两种生产类型在社会生产系统中是共同起作用的。精神生产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在物质生产中也有精神要素的参与。每一种生产产品都是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共同作用的结果。科学是物质生产过程的直接要素，当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新产品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把自己的智力和体力物化到新产品中，把生产工具的损耗部分转移到新产品中，因而也把科学物化到新产品中。所以，物质产品是各种生产原料的新的构成形式，其中包含了科学的物化成分，并且还往往是思想道德、文学艺术或多或少影响生产过程的结果。

三

精神生产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在社会生

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它和物质生产的联系，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

马克思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⑩

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产的发展，也制约着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作用的发挥。在原始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精神生产还没有从物质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有了提高，在勉强维持人类生存的条件下，还有一些剩余产品来养活少数从事思想文化和科学工作的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发生了，一些精神生产部门开始建立起来了。但是，在奴隶社会，生产力的落后既限制着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也限制着人们对精神生产的作用的认识。当时只有思想文化及数学、天文学等少数几个部门开始出现，加上奴隶主阶级对奴隶人身的占有和野蛮奴役，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作用是比较微小的。在封建社会，生产虽然比奴隶社会有了发展，但是落后、分散的自然经济仍然束缚着精神生产的发展，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封建地主阶级同时也占有精神生产资料。在欧洲，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科学成为宗教的奴婢。在中国，虽然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但思想文化却大多成为封建士大夫手中的专有物，这些人是远离物质生产的；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一些伟大的发明，对生产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相对于二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来说，科学的发展和生产的发展一样，仍然是极端缓慢的，科学的实际作用也是不大的。

资本主义社会是精神生产获得迅速发展并发挥巨大作用的时期。社会化的大机器生产冲破了自然经济的狭隘界限，使物质生产的各个部门以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成为紧密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各门新的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新的边缘学科产生了，并对物质生产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影响。另外，资本主义生产追求高额利润的目的，以及由此产生的激烈的竞争，迫使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在现代资本主义，

一切都为了生产利润，“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⑪资本家把精神生产纳入资本增殖的轨道，毫无疑问会妨碍某些学科的发展，并使科学成为排斥工人的工具。这些矛盾只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克服。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资本家重视科学研究和应用，是符合大机器生产要求的，客观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结合。

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适合发挥精神生产作用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有和资本主义一样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同时建立了资本主义所没有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些都为发展精神生产并发挥其作用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规律，是以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为基础迅速发展生产力，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社会主义本身就提出了全面发展精神生产的要求。正如胡耀邦同志指出的，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促进物质生产的主要是科学技术部门，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整个精神生产部门都起到了促进物质生产发展的作用。

纵观漫长的人类文明史，可以得出一个带规律性的认识：精神生产依赖于物质生产，因而每一时代的精神生产都有其不同的特征和作用，然而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精神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细致，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所以精神生产在社会生产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大。特别是在近代，精神生产显示了对于社会生产的巨大的推动力量。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更大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的结构，出现了两种趋向：第一，科学研究先于物质生产。科学是物质生产的先行官，物质生产的大发展需要科学研究的突破，而科学研究的突破必然引起物质生产的大发展。近二、三十年来世界经济的起飞，正是由第二次科技革命引起的。第二，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得到迅速加强。在科学发达的条件下，物质生产过程逐步实现着由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变，生产过程变成实验性的、物质创造的、物化了的科学。科学的普遍应用把人们从直接物质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使社会的注意力、社会的人力物

力投资逐步地(也是有限度地)从直接物质生产过程转移到科学研究的领域。在这种生产过程中,人们将主要执行科学研究和生产管理的职能,而科学则逐步地代替人们的直接生产劳动职能。随着科学的普遍应用,生产管理的作用大大加强了,管理成为把科学与生产结合起来的环节,而管理则是科学技术、生产知识和经验、经济科学、哲学、政治、社会心理、教育等各方面知识的综合应用。因此,在现代生产中,精神因素在生产过程中日益重要,现代生产要求人们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科技知识,更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文化修养。可见,一方面直接物质生产劳动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的比重相对降低,另一方面是精神生产劳动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的比重相对提高,构成了现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关系的

发展趋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页
- ② 《同上》第1卷第32页
- ③ 《同上》第1卷第42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5页
- ⑤ 《同上》第42卷第121页
- ⑥ 《同上》第42卷第121页
- ⑦ 《同上》第26卷第296页
-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 ⑨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页
- ⑪ 《同上》第26卷第298页



省小学教育研究会举行德育专题讨论会

省小学教育研究会于七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在珠海市举行小学德育问题讨论会。省、市教育领导部门的有关同志和各专区代表以及小学品德教育工作者共八十九人参加讨论会,各地代表提交了三十五篇论文和经验总结。

在会上,各地代表围绕“如何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加强学生道德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新一代”的专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研所何瑞泉提出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必须坚持“往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讲求实效,以理导行,知行一致”的教育原则,既要培养学生立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远大目标,又要从“小德抓起”,培养良好行为习惯;不但要学生懂得道理,而且以理指导行动。广州市乐贤坊小学副校长张祖培介绍了该校与学生家长紧密联系,通力协助做好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会上有十三位同志作了专题发言。代表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有益的争论。

(黎民安)

论“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论意义

章 沛 王经伦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的具体——抽象——具体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是人们所公认的。但这一思想，同时又具有重大的认识论意义，对逻辑科学的探讨起着重要的作用，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本文特就这一方面，对马克思这一重大贡献试作扼要的论述。

马克思在《导言》中，关于具体——抽象——具体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如下的一段话中：“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①这一段话不但具有方法论的内容，而更重要的是，同时又具有认识论的丰富内容。在哲学中，方法论和认识论是不可分割的，因而，方法论的东西同时也就具有认识论的意义。

在这里，马克思所谓“第一条道路”，说的是从具体蒸发为抽象，是一个认识过程，可以概括为“具体——抽象”这一科学公式。

所谓“第二条道路”说的是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思维过程，可以概括为“抽象——具体”这一科学公式。

在第一条道路上所谓“完整的表象”也就是被感知的客观对象的整体在头脑中重现的形象，是感性认识的反映形式。至于所谓“抽象”或“抽象的规定”，马克思在《导言》中的另一处地方，又称之为“合理抽象”。他说：抽象“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②显然，抽象或抽象的规定，照马克思的理解，也就相当于形式逻辑所理解的概念和范畴（科学的基本概念）。这样的概念和范畴反映着以及只能反映着对象的本质属性，或

一定方面、或一定层次、或一定阶段的属性。这样，认识的过程就进入到理性认识的阶段。

由此可见，马克思说的“第一条道路”正是从对象具体到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的阶段，正是整个认识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

在关于“第二条道路”的阐述中，马克思对理性认识过程作了进一步的分析：首先，他指出，第二条道路的出发点也就是第一条道路的终点，都是指的“抽象的规定”，第二条道路是第一条道路的继续，两条道路组成了完整的连续的认识过程。其次，他指出，第二条道路的结果，是具体在思维过程中的再现，而“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③（注：本文所有引文的着重号均为引者所加）。其三，他指出具体在思维中的再现，是由抽象规定所导致的，而不是凭空出现，或直接由对对象具体反映得来的。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具体——抽象”和“抽象——具体”这两个公式有机地联结为一个完整的科学公式，即“具体——抽象——具体”。这个公式之所以重要，是它明确了整个认识过程的有机联系，而更重要的是，它区分出理性认识中具有的抽象和具体环节，指出只有从抽象环节上升为具体环节才能在思维中重现具体（这是思维具体），达到具体真理的认识。马克思关于认识的两条道路的思想，完整地概括了认识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全过程，同时又完整地概括了思维从抽象环节上升为具体环节的全过程。毋庸置疑，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正是完整地提出了他对哲学认识论的深入的新的理论，是马克思关于思维科学的重大贡献。

为了说明问题，马克思曾作了具体的论证。现在，仅就这些论证作出阐述，用以证明“具体

——抽象——具体”这一认识论的科学公式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

第一个论证，马克思举“人口”为例。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④到这里为止，马克思描述了在具体到抽象阶段上对“人口”的认识过程：最初，我们接触到作为人口的客观总体，它是由分布在城乡、山区、海岛以及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具体的人所构成的，它作为被感知的客观对象，在人脑中的反映形式，是具有具体的、直观的、生动的感性认识的特点的，因而它只是“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这就是说，作为总体的表象，尚未经历过抽象分析的过程。

跟着，在认识中，我们对人口这个浑沌的整体，一方面看到它的分布在城乡和各生产部门等等的差异，另一方面又看到无论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它们又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人口是一定质量和数量的人的总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对“人口”形成越来越简单的概念的过程，使我们达到了关于“人口”的最简单的规定。

由此可见，在对“人口”认识的这一阶段上，我们只抽取了“人口”对象的“共同点”，并且把它概括为“人口”这个概念。这样的认识阶段，显然就是抽象阶段，而认识也就完成了从具体蒸发为抽象的任务。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对“人口”认识的全过程远未结束，因为它只能认识到关于“人口”的共同点，即人口一般，而并未揭示出“人口”的具体性，亦即“人口”的联系、内部矛盾等等。因而，这与客观世界中的“人口”对象比较，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因此，马克思紧接着说：“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⑤

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认识行程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一）它是从前一阶段的终点（最简单的概念、规定）开始的；（二）两个阶段在认识行程中是衔接的；（三）因而，它不是从具体蒸发为抽象，而是倒过头来，形成“抽象——具体”的新阶段；（四）这个阶段的终结，已经不是对象、表象的具体，而是思维的具体；

（五）具体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是由许多抽象规定所构成的思维总体，是一个概念和范畴体系。这个思维总体反映着客观对象的总体的具体性和体系性。

这样的关于“人口”的思维总体，不但包含了“人口”的基本规定性，而且还具有有关“人口”与其阶级构成；阶级与其所据以形成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因素；这些因素与其赖以存在的交换、分工、价格的前提条件等的内在联系，从而，基本规定性和各种关系有机地结合为一个对立同一总体，这就是在思维中再现“人口”的具体。这对“人口”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抽象的概念了，而是处于一系列有关的社会范畴的有机联系之中。

第二个论证，马克思举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产生的发展史为例。他按照关于两条道路的理论，作了如下的论述：“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⑥这里，马克思叙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一些抽象概念、基本命题的提出到理论体系的建立这一历史进程。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由于十七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运用的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合理抽象方法，因而只能够在分析中得出一些抽象的一般关系，找到一些个别要素，虽然这些要素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但还未能建立起经济学的体系。而十八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则自发地遵从了思维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道路，他们实现了经济学的体系化的进程。因而，马克思肯定了后者是建立经济学的体系的正确方法。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同时也体现在他的关于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具体）的设想中。他在《导言》中写道：“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分析过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

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⑦

第三个论证，马克思举认识过程本身为例。他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⑧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明确地规定了“具体”这个认识论范畴的特点：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第二，“具体”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思维具体”、“现实具体”。第三，“具体”在思维中表现为结果，而在现实中则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第四，整个认识过程，是以现实具体、主观和表象具体为起点，而以思维具体为终点。第五，根据上述各种阐述，在起点和终点之间存在着中间环节——抽象，它是导致具体在思维中的再现的必要环节。

从上述的分析中，概括起来，马克思的论证说明了如下问题：

（一）从现实具体、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是人们认识的运动、发展全过程中相互衔接的两个阶段，体现了认识、思维过程中的阶段性和联贯性的对立同一。这一认识过程可以概括为具体——抽象——具体这一科学公式。

（二）理性认识亦即思维过程中，存在着抽象和具体两个基本环节。思维的发展过程，从认识论角度加以概括，也就是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过程。

（三）思维具体是许多规定、概念、范畴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换言之，是一个概念、范畴的组合和体系。思维具体以其具体性和体系性反映着对象整体的具体性和体系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比从具体蒸发为抽象的方法，在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上更为合理。

以上，就是马克思关于抽象和具体的思想所具有的认识论内容和重要意义。

二

马克思对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全过程中的理性认识阶段划分出抽象环节和具体环节，是建立在对抽象、具体环节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在分析中马克思揭示了抽象环节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局限性，它上升为具体的必然性，以及揭示了具体环节的多样性及对立同一性。

对于抽象，马克思分析说：抽象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抽象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显然，马克思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抽象的“决定意义”和“合理”性的。抽象的“决定意义”和“合理”性具体表现为：

（一）概括了同一类对象的一般性，即把同一类对象的一般属性、本质属性这些“共同点”“提出来”，使认识脱离了客观事物的直观性、形象性和表面性，赋予理性认识的形式。如“商品”概念，它已经不是指形形色色的诸如钢笔、眼镜和书籍等的形象事物，而是指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所有劳动产品。认识了对象的一般属性、本质属性，思维才能把握住物质世界中各类事物的本质和区别性。

（二）逐一分析对象的各个部分、方面。抽象对对象“共同点”的抽取，是通过把具有多种规定性的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方面，然后逐一地通过分析、比较、概括、抽象的方法而实现的，使思维从一定的方面来认识对象。对“商品”的抽象过程就是分别地从使用价值、价值等方面来反映它的属性。

（三）反映了对象的确定性，即把对对象的反映“定下来”。抽象对同一类对象的反映，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关系的条件下的反映，也就是确定地反映对象的规定性以及规定性之间的区别的，使思维确定地认识处于流动的发展过程中的对象。例如“商品”本身有一个从劳动产品发展为商品，最后商品消亡的发展过程，而思维对“商品”的抽象，则只是确定地反映处于商品阶段中，“商品”本身所具有的规定性。

由此可见抽象是思维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认识由感性具体、现实具体转化为思维具体，必须经过抽象及体现为抽象环节。所以，马

克思正确地指出,抽象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如果进一步从思维发展的全过程来考察,那么就可以看出,抽象除了有“决定意义”和“合理性”、即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之外,同时还有局限性,具体表现为:

(一)它只反映对象中的“共同点”,而不能同时反映出对象中的差异和矛盾。

(二)它只反映对象的规定性,而不能同时反映出对象是确定性与流动性的对立同一。例如它只是反映了处于商品阶段中“商品”自身具有的规定性,而不能同时反映出商品从劳动产品发展起来、最后消亡的流动过程性。

(三)它只能逐一地反映对象的方面、部分的规定性,割裂了对象各规定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商品”,只是分别地反映了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规定性,割裂了生产者只是为了取得价值才生产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被消费者接受才能取得价值等等的相互联系。

抽象的上述局限性,在抽象环节中,抽象思维自身是无法克服的。这是由抽象的同异分立原则所决定的。所谓同异分立,就是把相同的属性概括在一起,暂时撇开相异的属性,从而形成抽象、概念。按照这一原则,抽象撇开了认识对象中的“异”,肢解了“共同点”与差异、矛盾的有机联系,把本来包含着的差异、矛盾的对象反映为抽象的同一。这种抽象的同一性在客观世界中是没有它的原型的。所以,处于抽象环节,思维不能如实地反映对象的本来面目。而要克服这些局限性,只有把抽象环节上升为具体环节,这里正体现了抽象环节上升为具体环节的必然性。

具体环节是对对象多种多样属性的对立同一的认识,它表现为整个认识过程的结果。由于具体环节是以对立同一为认识原则的,这样它就能在抽象环节的基础上,自觉地揭示对象内部的差异、矛盾。具体环节综合了与“共同点”对立的相异之处,达到对对象同和异的对立同一的认识;它综合了认识对象的基本规定性和规定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各种规定性重新组合为有机地联系的矛盾同一体,达到对对象的单一性和总体性的对立同一的认识;它是从对象的发展过程性来认识对象的,发展的过程性是通过全过程中的各阶段而体现出来的,过程性表现为阶段性的综合,达到对对象发展阶段的规定性与发展过程的

流动性的对立同一的认识。因此,具体环节表现为一个完整的认识、思维过程的结果,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三

有些同志对马克思关于抽象与具体的思想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对此,我们的看法如下。

第一,有人认为:马克思完全否定了从具体到抽象阶段,认为“第一条道路”是错误的,只有“第二条道路”才是正确的。因而,对“具体——抽象”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观点。这种观点的论据是马克思如下的一段话:“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⑨

马克思这段话,一方面直接说的是“方法”问题。作为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的正确方法,是“抽象——具体”的方法,而不是“具体——抽象”的方法。因为合理抽象方法只是一种具有局限性而不能完整地反映对象的具体性和体系性的方法。马克思只是在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科学这一问题上才对“具体——抽象”作出否定评价。这种否定,应该明确指出,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而不是全盘否定。因而他才正确地指出,抽象规定在思维行程中起着导致具体的再现的必然性和必要作用,才把十七世纪经济学家通过“具体——抽象”方法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抽象的一般关系、个别要素评价为“有决定意义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这段话还具有认识论方面的重大意义。如果根据这段引文从而认为马克思又否定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阶段,这其实只是误解。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观点把人们认识中的具体到抽象阶段和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具体——抽象”方法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由于理性认识、思维是从抽象开始的,因而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应当从对象的最简单的一般关系开始,然后由简单关系逐步上升到复杂关系,这才是正确的科学方法。因此,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则应该从商品入手而不是从“人口”入手。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基本要

素，它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只有从商品入手，才能正确地阐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运动规律。而“人口”则是有史以来所有社会的共同因素。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最基本要素。马克思因而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逻辑分析方法，这种批判并没有涉及从具体到抽象这一认识阶段的存在、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问题。从马克思对抽象的科学分析看，足以说明他是肯定了抽象以及从具体到抽象阶段的存在。

如果否定了从具体到抽象阶段，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只能导致否定思维抽象的客观源泉和基础，其结果只能是把思维封闭在主观领域内，完全割裂了思维对客观世界的依赖关系，使思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有人认为“具体——抽象”、“抽象——具体”是两种方法，而不是相互衔接的两个认识阶段，所以，不存在“具体——抽象——具体”这一认识全过程，不存在“具体——抽象——具体”这一认识论的科学公式，至少，这一公式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并不体现马克思关于抽象和具体的思想内容。其理由是：马克思建立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例如《资本论》，只是运用了抽象到具体，而没有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既然两者不是连续出现，所以它就不是衔接的，更不存在两者衔接的认识过程。

诚然，马克思在建立《资本论》体系时是直接运用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的，从思维上说，也就是意味着经历了“抽象——具体”、即在思维中再现具体的思维过程。但必须指出，这不是研究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方法和过程。在认识、思维过程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既然马克思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他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研究，必然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客观基础上的，通过收集大量的经济实例，从现象的分析深入到本质的认识。这一研究过程，既包括体现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对大量的经济学说史料的分析，也包括提出一些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概念、范畴等理论形式。在这些基础上，才有可能考虑如何从理论体系上重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问题。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⑩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

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是指从具体到抽象的阶段；“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是从抽象到具体阶段，概括地说，研究或者认识、思维就是一个“具体——抽象——具体”的过程。

对于如何从抽象到具体地建立体系的问题，马克思在《导言》中曾提出过完整的设想。这就是建立理论体系所运用的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在具体到抽象阶段的收集材料、形成抽象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组合，从而建立理论体系，以反映对象的完整的具体性和体系性的过程，是“具体——抽象——具体”过程中的后一阶段。

列宁指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⑪因此，作为取得《资本论》研究成果的过程，不能孤立地只看到属于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和认识、思维阶段，更应该看到属于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的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和认识、思维阶段，这才是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从一些基本范畴的阐述到整个理论体系的成立，同样运用了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翻开《资本论》正文的第一页，就可以看到运用这种方法分析商品范畴的实例。马克思首先对商品的感性具体进行分析，抽象出全部商品的共同点，抽象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体现在商品中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等方面。显然，这里运用的是具体到抽象的方法。然后，通过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认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所决定的等等的内在联系，完整地把握商品，从而使商品成为思维中的具体的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从实践、调查报告中得来的具体材料来阐述经济范畴，同样说明是遵循了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和认识、思维过程的。

第三，有人认为，马克思的“两条道路”是从理论思维方法角度，而不是从认识的一般过程的角度来谈问题的。这种观点是把认识论和方法论对立起来，割裂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片面地认为“具体——抽象——具体”只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其实，马克思是从认识论的高度、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联系来概括出“两条道路”，并据此阐述“两条道路”在认识过程中是衔接的、连

续的。因而,可以据之表述为“具体——抽象——具体”这一科学公式,这就是说,“具体——抽象——具体”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

马克思对“两条道路”进行理论概括的那段话,用的完全是哲学的、认识论的术语。这就证明,马克思是把方法论问题提高到认识论的高度来加以总结的。在“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第一条道路”上,揭示了思维抽象的客观基础。只有当客观对象的表象进入大脑后,思维才能够对对象进行分析,把对象割碎为不同的方面、层次,逐一地进行抽象。如果完全脱离了客观对象,抽象活动就无从谈起。这表明了思维抽象对客观对象的依赖关系。在“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第二条道路”上,是对理性认识阶段的进一步分析,把它区分为抽象环节和具体环节。抽象环节只是对客观对象的共同点、性质、方面的逐一分析过程,表现为理性认识中的初级环节。具体是在抽象的基础上,对客观对象的性质、方面及其内部矛盾的综合,是对对象具体性和体系性的认识,表现为理性认识中的高级阶段。关于“两条道路”的思想,概括了认识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以及理性阶段从初级环节进入到高级环节;认识从表面到本质,从单方面到全面,从确定到发展的认识过程,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它具有重大的认识论的意义。

马克思把这一认识论原理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以此作为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无论是对经济范畴的认识,还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认识,都是坚持运用了这种方法的。这说明,方法是认识对象的方法,而不是孤立的方法,认识论与方法论是一致的。

至于马克思之所以要指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别,目的在于指出研究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形成抽象,再现具体的方法。而叙述方法则是把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按照其内在联系加以表述的方法。前者体现的是“具体——抽象——具体”的全过程,而后者则仅仅体现了“抽象——具体”这一阶段。不能以后者作为否定“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论意义的理由。

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⑩有人认为,列宁这个表述和“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论科学公式是有矛盾的。其实,列宁这段话是概括从认识真理

到检验真理的过程,而“具体——抽象——具体”是认识、思维过程,二者活动范围的区别在于:前者包括主观和客观的活动,后者仅仅是主观的活动。

列宁在这里概括的是,认识从感性阶段开始,然后进入到理性阶段,最后把理性阶段得到的认识拿回到实践去检验这样一个客观到主观,主观再回到客观去的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全过程。在这个全过程中,列宁是区分了认识真理和检验真理这两个不同的阶段的。在认识真理即“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的阶段中,“抽象的思维”指的是理性认识、思维的整个过程。

但还应指出:列宁是承认理性认识、思维的抽象环节与具体环节的存在。举例来说,他在《哲学笔记》中曾指出概念有“抽象的概念”和“具体的概念”^⑪的区别。所谓抽象概念就是在具体到抽象阶段上所形成的,只反映对象的共同点的概念;而所谓具体概念是进一步在抽象到具体阶段上所形成的、有许多规定的概念。显然,列宁对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的区分,是承认认识区分为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两阶段,承认理性认识区分为抽象、具体环节的产物。由此可见,列宁说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与马克思说的“两条道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①、③、④、⑤、⑥、⑧,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3页。

② 同上书第8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1页。

⑨ 同上书第102页。

⑩ 马克思《资本论》,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

⑪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3页。

⑫ 列宁《哲学笔记》,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⑬ 同上书第192页。

一本普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好读物

——简评《科学社会主义常识》

程 宇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过去由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学习、研究和宣传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致使我们对此缺乏应有的理论准备，在认识上有着很大的盲目性，以致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冒牌社会主义所欺骗，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自从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拨乱反正，并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号召。在正在深入进行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情况，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答，也迫切要求我们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去武装头脑。然而，在当前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工作中，科学社会主义的普及工作是比较薄弱的一环，需要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工作的同志给予应有的重视。搞好这一工作，不仅是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一项重要思想建设，而且将会反过来对我们的提高工作起着促进作用。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曾经说过：“通俗讲演的经验，使我相信对那些没有受过专业教育的人，不得不用浅易的语言去讲授，这却是澄清自己思想上一些模糊之处的一种最好的方法。”（《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序言）这里虽然说的是通俗讲演，但是对通俗读物也是适合的。普及与提高是互相促进的。

由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写、刘夏帆同志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常识》，正是这样一本以知识青年和一般干部为主要对象的通俗读物。它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作的经验总结，力求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这对

于关心我国当前深入开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读者来说，是一本很有意义的普及读物。

这本书的优点，首先在于它向读者们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即研究对象。这也是当前学术界正在研究和讨论的问题，这本书以它的具体内容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曾被列宁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曾经说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学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10页），后来又进一步指出：科学社会主义要“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93页）前者说得比较概括，后者则较为具体明确，实际上是一个意思，说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规律。看来这本书是以恩格斯这个思想作为编写的依据的。

本书的第一章，开宗明义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和它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and 意义，介绍了马、恩、列、斯、毛等人对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贡献，并结合当前我国进行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指出认真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然后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在实现这一客观规律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去说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这种性质是既不同于奴隶阶级，也不同于农民阶级的（第二章）；它指出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终身的“一般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

(第四章)和共产主义(第十四章)。

本书着重介绍了无产阶级为实现自身的解放并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有客观的和主观的；有为资本主义所准备下来的和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所创造的；有在一定阶段上所需要的和长期需要的；有一国国内的和国际的，等等。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要争取解放，首先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否则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在中国的具体形式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后，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还得继续坚持和巩固这种专政（第四章、第五章），这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首要的政治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最根本最主要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应把工作重心毫不犹豫地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因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条件，没有它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解放前的旧中国，原是一个经济文化异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要把它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具有高度物质文明的国家，则更是一个刻不容缓而又极其严重的任务（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但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充分的物质财富，而且要有人们思想道德的大大提高，精神财富的丰富发展，因此，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大力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彻底清除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用共产主义的思想和道德去造就一代新人（第十一章）。前面说的是客观物质条件，经济条件，这里说的是精神条件。

无产阶级要完成以上的任务，实现以上的条件，就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因为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胜利完成的根本保证（第十五章）；无产阶级政党要对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实行正确的领导，就必须运用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尤其是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这个统一战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

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无论是在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是争取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胜利完成的一个重要法宝（第六、七、八、九章）。因为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去完成。

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要实现共产主义，彻底战胜资本家阶级，解放全人类，则要靠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如果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最终胜利，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就必须履行它的国际主义任务，援助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应该为彻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第十二章）。

从上述可以看出，本书的内容安排是较为简明和扼要的。它紧紧依据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条件这一中心思想，对内容进行剪裁和取舍，把一些属于其他学科研究范围的内容略去，这样中心就比较突出。

本书编写于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六中全会期间，书中的许多章节都突出了我党三中全会以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贡献，体现了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比如，恢复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明确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是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样就既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结合阐述了我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的余毒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这里要着重提一提的就是知识分子问题。本书专门安排一章来论述知识分子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的重要地位，批评那些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劳动者、不能创造财富的错误看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等反动谬论；特别是分析建国以后我国知识分子队伍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已经培养起一支二千多万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指出他们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经逐渐成为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

化水平而斗争的尖兵和骨干；并着重指出在今后四化建设过程中，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这对于使读者明确认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很有好处的。用专章的篇幅来论述这个问题，是目前其他的科学社会主义读物所没有的。这也可算是本书的一点有特色之处。

还有就是本书在论述问题时，尽可能地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比如在论述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节中，就列举了一九八二年四月广州工人参加文化考核的具体数字材料来说明加强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此外，本书在结构方面的逻辑性也是比较强的。因为它是一本系统地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基础读物，这就必然要求它的各个章节之间需要有比较严密的逻辑联系。比如，本书的各个章节都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对象——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目的之间有着逻辑的联系，争取无产阶级解放各个方面的条件之间也有着逻辑的联系。一本以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内容的读物，注意到不是编成一本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的论文集，而是力求依照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安排，这是比较合理的。

不过，本书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首先，本书在引用马克思1854年《给工人议会的信》中关于工人阶级实现劳动解放的两个条件那段文字时，省略了“劳动”二字，这是不应该有的疏

忽。因为马克思所指出的两个条件：其一是为工人阶级所创造的“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其二是“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的集体监督”。前者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生产力，为无产阶级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可能；而后者则是指变“劳动者不得食”为“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很明显，说的都是解放劳动的条件。如果省略了“劳动”二字，就把它变成一般性的条件，以个别代替一般，这是不妥的。

另外，前面说它的内容安排比较合理，这是就总体来说的，如果就具体内容来说，也还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比如，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国家，它既是专政的国家，又是民主的国家。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因此，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它既是专政的消亡，也是民主的消亡。基于此，本书关于国家消亡这一节的安排，似乎也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因为本书是一本以缺乏专门知识的读者为对象的普及读物，因此应要求在行文上力戒枯燥刻板，尽量做到通俗和引人入胜。在这一点上，本书也很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

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又进一步地把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发展了，本书写成于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希望能在再版的时候，进一步根据十二大的精神加以修订，以使它更加完善起来。

论提高经济效益的理论根据和主要途径

刘 光 第

经济效益问题是我国一切经济工作的一个核心问题。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党和国家曾采取了许多措施，理论界也发表了大量文章，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但是迄今成效却很不理想，其中原因固然很多，我认为首先在理论上并没有讨论清楚，同时在实践中也远没有引起重视。从理论上讲，我认为没有肯定经济效益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基本经济范畴，没有明确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具体化。从实践上看，没有严格按照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着重加强宏观控制，加强计划经济，加强对经济杠杆的利用，加强经济立法工作。本文拟从这些方面，谈些初步看法。

一、经济效益是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经济范畴

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一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从而抓住了“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256页）

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没有类似剩余价值这样的经济范畴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赖以旋转的轴心”呢？根据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经验总结，我们党明确地提出了我国各项经济工作都要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它也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是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前提。

我们把经济效益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中心，与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旋转的轴心”，其含意完全是一致的。

但是，提高经济效益这一重要思想及其理论意义，至今并未为广大从事经济实际工作的同志所认识，仍然热衷于盲目追求生产增长速度，盲目追求产值，忽视经济效益，事实证明，这样生产速度最后也是不可能上去的。

经济学上的一些概念和范畴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的。经济效益这一概念，随着我国现实经济生活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目前，在这一概念中，我认为它包含了下列几

个主要特点和要求：

第一，产出与投入直接联系

经济效益的首要要求是要把产出和投入直接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如果在产出增长时，投入也相应地增长，或者增长得更快，就谈不上经济效益。讲究经济效益，必需投入少，产出多，产品的效用能抵偿生产费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5页）

第二，生产和需要直接联系

讲究经济效益，不仅要求投入少，产出多，而且要求投入的劳动符合社会需要。如果投入的劳动不符合社会需要，生产和需要脱节，那么，即使投入少，产出多，也是没有经济效益的。在投入不符合社会需要的条件下，投入虽少，节约也无意义；产出越多，浪费却越大。因此，投入不仅要讲究数量，而且还有一个方向和质量的问题。只有在投入的劳动量符合社会需要的前提下，再讲究投入少，产出多，才可以提高经济效益。

第三，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密切联系

经济效益包含了物质效果与经济收益两个方面，前者属于使用价值形态，包括了物质资源的合理利用，环境和自然生态的维护，产品质量、品种及其实际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等等；后者属于价值形态，包括产品的成本、资金占用、产值、利润等等。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完全在于掠夺利润，因此，着重考核价值指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于创造物质财富满足社会需要，因此，把使用价值放在首位，但是，同时也重视节约劳动消耗和劳动占用，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们并不贬低价值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作用。马克思说：“假如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余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说，这种工人的劳动是真正生产的，也就是说，它创造新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48页）马克思在评价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自己建立的合作工厂时说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劳动增殖。在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增殖必然表现为价值增殖或资金增殖。讲究经济效益就不仅包括了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新创造的价值超过生产中消耗的价值，要有盈利。这两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任何一方面被破坏，就不能说是经济效益。因此，显示经济效益的大小，不仅要有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指标，而且要有价值指标，如：国民收入的增长、资金利润率等。

第四，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的密切联系

社会主义经济效益是全面的社会经济效益，包括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眼前效益和长远效益的统一。提高微观经济效益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基础，微观经济

效益如果普遍不好，宏观经济效益也不可能好；但是，宏观经济效益却不是微观经济效益的简单总和，往往微观效益好，而宏观效益不一定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微观经济效益必须服从宏观经济效益。

把上述特点和要求概括起来，经济效益的概念大致可以表述如下：在存在商品货币的计划经济中，要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和劳动占用，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指导经济工作实践的重要原则，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依以旋转的轴心”。围绕着它运转，经济就生机勃勃、活跃发展，离开了它，经济就死气沉沉，停滞不前。

经济规律是以一定的经济范畴为其表现形式的，如果说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最适宜于表述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经济效益这一概念最适宜于表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呢？我认为可以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在所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中起着主导作用。毫无疑问，经济效益在社会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效益在所有经济规律中起着主导作用，它决定着其他经济规律作用的根本方向，其它经济规律的作用都要服从于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都必须以是否提高经济效益为依归。

总之，对于经济效益，从理论上予以科学概括，广为宣传，使它深入人心；从实践上认真研究，广泛运用，已成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和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当务之急。

二、当前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

经济效益既然是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依以旋转的轴心”，它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因此，要提高经济效益，光解决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或某一个过程的问题是 impossible 奏效的，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多方改进，从一个企业看是这样，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更是这样。

所谓综合治理，最主要的是要按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改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国民经济调节系统，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等几个方面入手。互相配合，协调工作。但是改革只能是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只能改革那些迫切需要改革的体制，不可能一下子全面展开。当前提高经济效益最主要的途径，我认为应该着重从宏观控制方面多下力量，要把大的方面管住。只要大的方面管住了，全局活了，小的方面才能搞活。如果大的方面失控，小的方面也就难办。基于这一看法，我认为抓宏观方面，有下列工作值得立即去做。

第一，必须坚决加强计划经济和综合平衡工作。现在无论从微观看或从宏观看，经济效益之所以不能提高，根本在于计划不周到和不科学，综合平衡工作做得很差。这种弊端集中表现在分配过头，基本建设失控，资金分散，需要和供给无论在总量上或构成

上都失去平衡，社会总需求超过了社会总供给。经济效益首先要求经济按比例地发展，比例失调就谈不上效益。

过去报刊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提法：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收入的使用额超过了国民收入的生产额”或者说：“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现在看来，上述提法是不科学的，所以几乎没有人再提了。因为在统计上，说到积累、消费、国民收入使用额、国民收入生产额，都是指实现了的数额来说的，在假定没有进出口贸易的情况下，积累和消费的总和即国民收入的使用额，总是和国民收入的生产额相等的，前者不可能超过后者。但是，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在国家计划安排上或财政收入的分配上确实存在着基本建设投资安排过多，超过了国民收入生产额中生产资料的供应，同时，城乡人民收入的提高，也确实超过了消费品生产供应的可能，再加上各单位自筹资金失控和各种贷款规模扩大，致使基本建设挤了正常生产，重工业挤了轻工业，这是当前经济效益低的根本原因所在。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坚决加强综合平衡，解决超额分配，即必须解决计划内外超过国民收入生产额的分配问题，使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保持平衡。要解决分配过头问题，现在必须同时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改进计划管理体制，加强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协作和联合；必须加强立法工作，限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改变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对于这个问题，光用经济手段和说服教育是不够的。同时，还迫切要求通过立法，坚决而有步骤地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决不能只对企业和劳动者实行经济责任制，对国家经济管理部门以及计划管理、设计管理、施工管理和物资供应等部门都应该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明确法律责任，充分发展法律的强制作用。

在解决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和资金分散这问题时，我们往往只考虑运用财政手段，而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运用信用手段。现在资金分散，建设规模失控，这同银行体制不健全是有很大大关系的。银行是信用活动的中心，全国货币资金活动的总枢纽。财政和银行是国家执行计划经济的左右手，国家掌握了财政和银行，就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就可以控制国民经济全局。但是，现在银行群龙无首，信用分散，削弱了国家所可能聚积的经济实力，这也是经济效益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提高经济效益，国家手中没有经济实力是不行的，而聚积经济实力，要靠财政和银行两家来办，单靠财政一家是不够的。

随着决策权的分散和市场机制的广泛的运用，财政和银行将日益显示出它们在宏观经济控制上的重大作用。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除自有者外，不是来自财政，就是来自银行，即使自有资金，也要通过银行周转，银行也能适当地利用和控制，所以财政和银行是国家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控制器和调节器，只要运用得好，就完全可以加强国民经济计划的科学性，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当然，财政和银行是两个职责不同的经济综合部门，它们在解决国民收入超额分配问题上，在聚积建设资金保证重点建设，提高经济效益方面，从不同的渠道起着殊途同归的作用，因此，必须既有明确分工，又要通力协作。

为了加强计划经济，充分发挥资金的调节作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已成当务之急。自从企业扩权、财政“分灶吃饭”以来，资金分散的情况日益严重，必须尽早成立中央银行，加强宏观经济调节。中央银行，运用它高度集中统一和强有力的权威地位，可以有效地控制货币发行，统一调度全国资金，加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有计划调节，确保财政和信贷的综合平衡，从而提高投资效益和经济效益。

中央银行不应该兼营专业银行的业务，但在它领导下面可以设立若干专业银行，分掌各项专业。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中央银行控制专业银行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审核、监督各专业银行的信贷计划的执行，除主要通过信贷计划控制信用活动外，还可以运用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存款转存等办法，足以在业务上有效地控制专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在财政实行了利改税之后，成立中央银行，统管全国金融事业，这对于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改善资金结构、调节经济发展方向，将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

因此，我认为要加强计划经济，当前在方针上必须坚持综合平衡，建立各种经济责任制，明确法律上的责任，在体制上必须立即成立中央银行。只有这样，才能从宏观上求得平衡，为微观经济的开放和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才能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必须加强对各种经济杠杆的配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除了首先要加强计划经济外，同时必须加强对各种经济杠杆的配合使用。国家利用经济杠杆可以把国民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不但指导性的计划要善于利用经济杠杆，即使指令性的计划也必须善于利用经济杠杆，至于市场调节则只能完全利用经济杠杆，指导他们的活动。

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经济杠杆是价格、税收和信贷三大项。现在价格体系很不合理，当然需要改革，但涉及面广，难度大，只能有步骤地进行。在价格还不能大动的条件下，信用和税收是当前最好利用的两大杠杆，其中尤其是利用信用可以起很大作用。

在税收方面，现在就应该通过建立新的税种，把预算外资金的一部分以及企业不合理不合法的既得利益通过税收集集中于国家手中。农村也可以考虑开辟新的税种，以平衡收入，简化农产品价格。因此，无论农村税收或城市税收都有研究改革的必要。

在信用方面，由于银行信用很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社会上的信用形式很多，渠道很多，使国家无法控制。信用的特点是非常灵敏和活跃的，只要国家银行的信用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有效地引导或代替社会信用的活动，那么，就必然会出现五花八门的信用形式和信用渠道，影响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影响资金的正常周转，削弱生产事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在成立中央银行的同时，研究开办多种信用形式，以适应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形式发展的需要。银行应大力开展信托信用，清理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投资信托公司，把国家批准以外的其他信托公司一律取消，由银行统一领导信托业务。此外，还必须发展集体合作信用和商业信用等形式，促进信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国家更有实力控制经济全局的发展，从而有力地提高经济效益。

第三，必须大力加强立法工作。如上所说，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

至于实际上能否提高经济效益，则有赖于一个能够体现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体制来解决。而一个好的经济体制的确立是和经济立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立法必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经济立法不仅要确认已经变革了的事实，而且要积极地去指导改革的前进。当前这两方面的立法工作都非常必要。没有经济立法，提高效益是不易奏效的。为了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必须制定固定资产投资法；为了管好流动资金，必须制定流动资金管理法；为了保证在利改税中，坚持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原则，应尽快制定成本法、会计法、折旧法等。我们必须善于运用法制来保证各项方针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此外，还应该制定一系列财经纪律制度，加强财政监督、信贷监督和会计监督，使企业活动纳入国家计划和法令规定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可能逐步提高经济效益。

1983年5月



《九云梦》的卷数和刻书年代

官桂铨

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中“现存明人编撰的话本集叙录”第14种《九云梦》，据杭州大学图书馆藏书著录，是新发现的明代话本小说集。可惜此书仅残存首册，“前后无序跋例目”，不知其卷数及刊刻时间。程毅中先生《简评〈话本小说概论〉》说：“《九云梦》一书，据说是朝鲜人金春泽所撰，更值得珍视。”（见《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

按：《九云梦》全书共六卷，嘉庆八年（1803）朝鲜刻本，厦门大学图书馆藏。李秉乾《试谈馆藏古籍善本的考订工作》中说：“《九云梦》六卷，佚名撰。一八〇三年朝鲜刻本，三册。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白绵纸，天地宽。地脚书口写‘天地人’（三册分），属小说类。卷末题崇禎后三度癸亥。据此分析，该书刻印时间是一八〇三年，即中国清朝嘉庆八年时候，仅见杭州大学藏一册，未注明卷数。书皮暗黄色厚纸，并有朝鲜字。天地大，字大朗目。是我馆唯一的朝鲜刻本。”（见1980年12月福建省图书馆学会编印《论文和经验交流材料选编》铅印本165页）

由此可知，《九云梦》原书当作于崇禎年间，胡士莹先生把它定为明人所编撰，判断是正确的。

试论当前农村放宽政策的若干问题

梁 钊

当前农村随着形势的新发展，要求进一步放宽政策。这件事是同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管理体制的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是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实行以及各类专业承包、开发性承包等农村经济的新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讨论政策的宽严问题，应该紧密结合农村这场伟大变革去研究。

放宽政策的由来和依据

三中全会以来，中华大地蓬勃生机。我省由于认真贯彻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坚持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进一步搞活经济，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农村由于一再放宽政策，短短的几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极大地增强人们对振兴农业的信心。

农村放宽政策问题，首先集中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方面。几年来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认识不断提高，政策也随之不断放宽。这经历了从不联产到联产，从联产到组、到户、到劳到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适用于边远山区和经济困难的地区，同时也适用于经济发达的富庶地区；不仅适用于农业，同时也适用于林、牧、副、渔各业以及农村的其他经济领域。实践已经证明：联产承包责任制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合乎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规律的。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亿万农民冲破旧的框框，发挥了巨大的劳动潜力。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农村各种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不断出现，开发性承包正在向深度广度扩展。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与此相适应，就需要进一步制定新的政策，调整过时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政策，这就是农村一再放宽政策的由来。但是，有

的同志对联产承包责任制，尤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放宽政策的措施仍有怀疑，对新发展的农村经济形式的性质分辨不清。前几年争论一个“包”字，即能不能搞分户承包的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有怀疑的人不多了。现在争论放宽政策的问题，涉及的范围更加广阔，问题也更加复杂。这里包括有对集体企业的个人投标承包，个体农户的雇工，私人购买生产资料以及合股经营、股金分红等等。因而迫切地要求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农村放宽政策的依据，作出合乎实际的有说服力的回答。

什么是当前农村放宽政策的依据呢？

一、放宽政策就是从实际出发，大胆改革，坚决抛弃不适合实际情况的旧观念和旧模式。

“放宽政策”或者“更加放宽政策”是比较而言的，是针对着过去统得过严，限制太死，干涉过多，过分集中来讲的。决不是任意放宽，越宽越好。农村放宽政策，首先要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坚持有统有分，给承包者以更多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真正把权、责、利统一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放宽政策要继续清除“左”的影响。长期以来在“左”倾思想影响下，把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当成共同富裕，把承认差别，通过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当成了资本主义；把集中劳动、统一经营当成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把家庭承包，分散劳动视同资本主义；把集体经济视为固定的单一的形式；把公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当作资本主义。总之，不把过去肯定过的，但是实践证明是妨碍我国农业发展的旧观念旧模式抛弃掉，就不能解放农村生产力。农业上必须大胆改革，在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放宽政策，使亿万农民放开手脚，充分发挥巨大

的劳动潜力。大胆改革和放宽政策总的目标，是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好坏、是非的标准。

二、放宽政策要尊重客观规律，顺乎人民的心愿。

放宽政策决不是主观随意地制定政策，而是要充分尊重客观规律，顺乎人民的心愿，制定有创见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确政策。

客观规律是事物内在的必然的本质联系，它通过某种形式反复地表现出来。所以，政策是否得人心，是否合乎客观规律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虽然有可能缩短，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仍然需要从广度和深度方面，经过反复实践的检验，看能否达到预期的结果。现在农村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政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是经过反复的实践检验的。原来许多强调过的认识和政策，不断地被实践所突破，被新的政策所代替，这是合乎规律的。例如，过去总是说农业劳动力不足，强调要劳力归田。现在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巨大威力，农村劳动力普遍过剩。这就需要进一步放宽政策，为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寻找出路，提倡离土不离乡，使他们逐步转上工副业和加工、运销、服务业，以及种养、养殖为主的种类繁多的开发性承包经营，上山、下海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又例如，过去对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诸多限制，害怕出“资本主义”，因而禁止农民经商，长期以来，农民经营商业被视为异端。但是，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村生产的大发展，农村流通领域出现了严重堵塞的状况，于是进一步放宽农村流通领域的政策是必然的。现在，我们不但允许农民经营合作商业，同时允许农民个体或合股经营商业、服务业；不但允许农民经营坐商，同时允许农民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长途贩运。为了繁荣城乡经济，农民经商不但不应禁止，而且应该鼓励和提倡。

尊重客观规律和顺乎人民的心愿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时刻注意群众的利益，群众的经验，群众的情绪，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我们党，才能大

胆地、勇敢地、无所顾忌地，切实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把尊重客观规律和顺乎人民的心愿高度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作为制定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

三、放宽政策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农村在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中更加放宽政策，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但是却有一些同志说，大包干及其一系列政策“表现很好，成分可疑”，就是说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特别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中放宽政策，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似有问题。这就需要严肃回答。

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它既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普遍特点，又是具有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寓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中。我们在农村经济改革中放宽政策，要坚持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方向。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为搞活经济一再放宽政策，使我国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确多样化了。但是这并没有削弱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继续占着绝对优势。社会主义经济的实力和活力都大大增强。无论从社会生产的总体上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统一），还是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来看（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都是如此。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在广泛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放宽政策以后，不但没有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而比起过去那种僵化的单一的模式来，则是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对于一种制度和政策，一定要从本质上看，不能只看现象，要通过现象看本质。要提倡唯物辩证的方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方法，反对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从表面上看是分户干，按户包干。于是就有人从现象出发，得出结论：分户干就是单干。如果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在各种类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中，集体和户

的关系是出包与承包的关系。管理形式改变了，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并未改变，土地和大型设施、生产资料仍然是公有的。同时又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办法，即生产资料可以公有私用，在一定范围内还允许私有公用和私有私用，大包干是生产与分配的直接结合，不必收起来再分配。这种直接分配形式的内容，包括社会扣留、生产费用的补偿和个人的劳动所得，也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来就是自己的”，农民看得见、摸得着，解决了长期以来生产与分配脱节的矛盾，克服了“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弊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特点是有专有联，有统有分，专和联、统和分都是辩证的统一。无论是专和联还是统和分，都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家庭承包户、专业户、重点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体通过合同和市场调节纳入国家计划，国家通过国营企业和各类经济、技术部门为农业服务，自觉地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农村的集体经济和农民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

原来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性质认识不清，对大包干思想抵触的同志，有的人在普遍实行联产承包以后，又走上另一个极端，撒手不管，放任自流，这是很错误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能够自觉地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放宽政策以后对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必须加强领导，进一步稳定、健全和发展，必须加强计划管理，强调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坚决完成国家任务和严格履行合同，要注意市场信息和预测，尽量避免盲目性，坚决取缔投机倒把活动与违法行为。

放宽政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 开创农业新局面的需要

由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产量显著增加，收入也逐步增长。专业户、重点户和合作经济的新发展，使农村普遍出现了两个新的情况：第一是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普遍剩余；第二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资金也逐步增长而有剩余，不仅农村储蓄增长很快，农民持币选购、储币待购的也日益增多。

两个剩余要求寻找出路，我们就要为剩余的

劳动力与剩余资金找到劳动对象、找到设备技术。这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朝着农、牧、副、渔全面发展，向着农工商综合经营发展，极大地促使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生产的蓬勃发展，标志着我国农村从自给、半自给性生产，转向社会化、科学化生产，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过渡，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

从长远来看，我国农业的发展要取决于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科学技术的武装。进一步放宽政策，将使农业社会化、科学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开创农业新局面的需要。

一、只有放宽政策，才能广泛的动员农村闲散资金，利用先进科学技术，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目前的建设资金只能集中用在能源、交通和科学技术、教育等智力开发方面。农业虽然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但是，国家还不可能拿出大量的资金投入农业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我国农业现代化决不能照搬外国模式，由国家投资包办，象苏联办国营拖拉机站那样。而是要走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子，一靠科学，二靠政策。当然，从全局需要出发，统筹兼顾，由国家投资兴建某些大电站和水利枢纽工程是必要的。但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资金主要应该来自农村，靠农业自身的资金积累和劳动积累。例如，实现农村电气化就不能单纯依赖大电网，有水力资源的山区，应该强调采取多种形式举办小水电。只要放宽政策，采取集股投资，收入分红的办法，或是专业承包开发投资的办法，就一定能集腋成裘，办成大事。其他各类农村基本建设承包和开发性承包，莫不如此。

二、只有放宽政策，才能做到人尽其才。要充分发挥农村能工巧匠和技术力量的作用，大胆使用那些技术上的能手，经营上的高手，劳动上的强手。采取多种形式、灵活多样的承包方式或招聘办法。可以由集体承包单位或农工商联合体招聘能人、师傅；也可以由能人承包集股经营；可以在本地承包，也可以跨地区、跨社、队承包；可以联产承包，有的也可以个体经营。总之要创造条件使各种能人包括各类科学、技术工作者，在生产领域，科学技术领域和经营管理领域大显身手，从而使一部分人先富裕

起来,同时带动和扶持广大农民共同富裕。充分发掘和大力培养农村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他们较快富裕起来或者获得较高的收入,不应加以限制。

三、只有放宽政策,才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做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一个重要方针。人多耕地少是我国之短,尤其是我省之短,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保留和发扬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长处,充分利用农家肥料,集约经营,在有限的土地上使农作物首先是粮食稳产、高产,并注意生态平衡,保持良性循环。广东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我省所处的热带、亚热带地域在全国占第一位,光、热、水资源丰富。全省面积二十一万平方公里,折合三·一八亿亩,而现有耕地仅有四千八百万亩,大量的山区、台地和荒地、水面尚待开发。以海南宝岛为主的湿热带就有三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五分之三。海岸线之长,大陆架和南海海域之大均居全国第一。发挥这些优势,必须开阔视野。从农业方面来看,就是十分有利于大力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因此,除了继续抓紧粮食生产,加快海洋捕捞和浅海养殖之外,应该充分利用可供开发的山地、荒地和水面,放宽政策,大搞开发性承包经营。在经济作物方面主攻甘蔗、橡胶、水果、茶叶、蚕桑和热带经济作物等几个大项,把发展林业与农业结合起来,农业与畜牧业、养殖业结合起来,把种养与加工、销售结合起来。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会取得突出的经济效益。

边远、贫脊山区的荒山、荒坡以及沿海、沿江的滩涂、低垦等的开发,一般投工较多,投资较大,生产周期较长。因此,政策应该更加放宽。在落实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要保证使承包者得到长期的可靠的稳定的收入,并使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会使沉睡的大地苏醒,发挥出自然资源的优势。

四、只有放宽政策,才能充分发挥劳动资源的优势。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造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劳动途径。鉴于我省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分布也很不平衡的状况。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开创农业新局面中,必须考虑劳动资源、自然资源和财力资源的有效结合。不仅要允许跨地区、跨社、队承包,

还要允许有组织的向国内、省内以至向国外输出劳务。例如,最近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已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我省开发所罗门群岛林业资源的计划,就是一项重要的开发性劳务输出。这项开发对于合作双方都有经济利益,而且对弥补我国的森林资源不足具有一定作用。(见1983年6月13日《经济参考》)此外,对于人口密集,耕地和自然资源较少的地方象潮汕平原,除了有计划的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之外,放宽政策,允许劳动力的适当流动是有益的。对于个人承包户和个体经营的农户雇请少量帮工和徒弟也应适当放宽。

五、只有放宽政策,才能疏通农村流通渠道,做到货畅其流,在农村由自给半自给性生产向商品生产的转化过程中,商业体制的改革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示出来,改革农村供销社体制,必须进一步放宽政策,实行多渠道、少环节的多种形式的经营,包括个体经营和法律允许范围内的长途贩运。农村的供销体制改革要充分体现群众性、灵活性、民主性的特点和优点,使流通为农业生产、加工服务,为生产前、生产中、生产后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

总之,我们要充分估计当前农业发展的大好形势,充分估计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从战略高度认识农村开发性承包的发展。在坚定不移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从实际出发,放宽政策,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劳动资源、财力资源和智力资源,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货畅其流。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走出自己的新路子,开创出新的局面。

关于几个问题的界限

最近几年,我国农业生产在广泛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不断放宽政策,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得到了发挥,但是有的同志对于这一伟大变化还存在种种疑虑。因而,划清认识上几个问题的界限,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要划清“一大二公”和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界限。

根据过去的观念:一是认为现代化是大生产,大生产就要大规模,于是生产规模、劳动组织都是越大越好;二是把公有化与社会化划等号,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优越,于是全民优于集体,大集体优于小集体,把多种形式的合作经

济和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的个体经济一扫而光。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结果变成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劳动管理上的强迫命令，造成我国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变革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必须进行调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尤其在农村，从技术基础来说，仍然未摆脱手工工具的状况，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程度也比较低。生产的规模大小，公有化程度的高低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当前在稳定和健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进一步放宽政策，允许资金、劳力、技术多种形式的结合和一定程度的流动，是适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它必将使我国农村朝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科学化方向发展。在普遍实行大包干以后，农村对适用的农业机械器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大包干，有力地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可见，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搞自给半自给经济是落后的；而从实际出发，放宽政策，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经济联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化生产是先进的。

二、要划清剥削收入与允许投资承包、股金分红的界限。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存在过三种剥削制度，即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与此相适应就有三种不同形式的剥削，或者叫剥削收入。但是在“左”倾错误盛行的时候，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搞得“纯”之又“纯”。把所有的投资承包视为异端，把股金分红、有限量的生产资料报酬、甚至银行利息，统统视为剥削。这既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任何新的社会制度都会保留旧的形式，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恩格斯指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6页）这“中间环节”，就不是纯之又纯，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又进一步

发挥了这一思想，他指出：“一个村庄或一个教区的农民……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页）这就是类似我国五十年代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形式，由于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应该说，这种形式至今还没有过时。今天，在土地和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联产承包，农民可以在承包的土地上投资，可以购买一部分生产资料，在包干分配的形式下，显然是包括了投资和生产资料在内的报酬。根据同样道理，投资承包的股金分红、私有公用的生产资料报酬等等，虽都不属于按劳分配的范围，但是目前政策所允许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投资承包的股金分红，如同银行利息一样，都不是劳动直接创造的价值，而是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再分配。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这些范畴，对于聚集建设资金，对于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是必需的、有利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范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般地表现为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瓜分。而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这些范畴已不再反映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一般地表现为物质鼓励的性质。

三、要划清两极分化和使一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的界限。

两极分化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产生的，一般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小农经济的破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放宽政策，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让农村一部分技术能手、经营高手、劳动强手，大显身手，首先富裕起来，这是为了彻底打破“大锅饭”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病，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让一部分农民首先富裕起来，就树立了榜样，然后带动大多数人勤劳致富。因此，这同私有制下面出现的两极分化，是根本不同的。

四、对农村改革和放宽政策中出现的某些过渡的经济形式要区别对待，善于引导。

现在，农村中出现的农民之间的换工；丧失劳动力或劳动力不足者请零工；合作经济之间请季节工或专业工、技术工等，均属于劳动群众之间、劳动互助和技术协作的性质，不要同私人雇工混

为一谈。至于农村个体工商户、手工业户和种养能手，请一定数量帮工和带徒弟，自然属于私人雇工范围，存在着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但这是过渡性的经济形式，只要因势利导，就能使之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

有的同志耽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放宽政策会助长私有观念。当然，这是应该注意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些弊病，在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2页）对于这些弊病包括私有观念在内，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

头脑，决不要放任自流，但又不能操之过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操之过急，就会实行脱离实际的政策，犯“左”的错误；放任自流，助长私有观念的泛滥，就会犯右的错误。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越是大胆地坚决地实行各种改革和放宽政策，就越要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要把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号召，成为人民行为的规范。把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和纪律的教育同坚决实行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政策结合起来，同时又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实践中，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一九八三年六月

書海酌蠡

“哭 庙” 辨

易 名

金圣叹因哭庙案被杀头籍没，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但哭庙案之“哭庙”应作何解？

《金圣叹小传》作者说：“闻是狱之兴，为知吴县事山西任某（指任维初）以非刑予征课税，生员薛尔张等因民忿，鸣钟击鼓，入文庙哭泣，诸生不期而至者百余人。”（《清朝野史大观》第五册）近人也说：“初四日，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皆欲声逐任令。”（《国史旧闻》第三分册《金圣叹》）今人再说：“于是初四那天，金圣叹等百余人先到孔庙鸣钟击鼓，并对着孔子的牌位放声痛哭。”（《民主与法制》1983年第三期《金圣叹之冤》）

“哭庙”是“哭”吗？是“入文庙哭泣”吗？是“对着孔子的牌位放声痛哭”吗？其实，都不是。

顾予咸在《遭难自述》中说：“吴中故习，诸生事不得直，即作卷堂文，以儒冠裂之夫子庙庭，名曰哭庙。”（《吴门补乘》卷10《杂记》）顾予咸，字小阮，顺治年间进士，为哭庙案株连者，只因偶然之故，才被议政王赦免。顾亦是学者，著作颇多，《温飞卿诗集》即其补注。他对“哭庙”的解释，为当事人解当时语，决不会错。何况，“哭庙”又是吴中故习。据此可知，“哭庙”之意，即“以儒冠裂之夫子庙庭”，释为今语，就是对着孔子牌位撕裂秀才的帽子。

试论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

韩 志 国

经济合同是经济关系的法律形式，是法人之间为着一定的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在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经济合同是国家组织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工具。近几年来，经济合同在我国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广泛实行和推广，这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已起了明显的重要作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探讨经济合同与国家计划的关系，研究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以便进一步发挥经济合同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

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合同这种法律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页）作为媒介人们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相互关系的法律形式的经济合同，它的作用取决于经济基础，特别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客观经济条件的不同，经济合同就有着不同的职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在历史上，经济合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曾经具体地描述了合同产生的历史过程：“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我在分析商品流通时就指出，还在不发达的物物交换情况下，参加交换的个人就已经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是他们用来交换的财物的所有者；他们还在彼此提供自己的财物，相互进行交易的时候，就已经做到这一点了。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23页）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合同就已经产生，并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着主导地位，商品经济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因而合同制也没有得到普遍

的采用。由于在这种经济条件下，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各种经济活动实行统一的计划，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合同制用来为计划经济服务的问题。

到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合同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经济合同被广泛地应用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各个领域，成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经济联系和经济往来的一个重要手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生产社会化的日益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于是，人们就利用经济合同这种形式来衔接生产和交换，使许许多多独立经营的资本主义企业联系起来，协同动作，密切配合；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人们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也日益频繁，各个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竞争地位，也需要建立比较稳固的经济联系，利用经济合同这种形式，来保证原材料的来源，获得产品的销售市场。这样，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为经济合同的广泛应用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又使经济合同产生了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容的作用。尽管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尽管各个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家集团也把经济合同作为加强企业和集团内部计划的工具，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本排斥了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就使得经济合同根本不可能产生为全社会的计划经济服务的作用。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计划经济不仅成为一种客观上的必要，而且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由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的存在，经济合同就被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供应、运输、销售的各个领域；由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就使得经济合同能够在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更高程度上发挥作用。这样，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为经济合同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合同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合同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同的签订实行的是自由原则，在不抵触国家法律的条件下，当事人双方可以对合同内容进行自由的协商，并且根据双方的意志来确定合同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同的签订要坚持计划原则，凡是属于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的项目的经济往来，就必须按国家下达的指标签订经济合同；凡是属于国家指导性计划产品和项目的经济往来，就必须参照国家下达的指标，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签订经济合同。只有国家规定的属于市场调节的那一部分产品和项目的经济往来，双方才可自由地签订经济合同。第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允许用赔偿损失的办法来代替合同的实际履行，可以采取按照法律或合同规定赔偿损失的办法，来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实行计划经济，整个社会的生产、供应、运输、销售都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而有计划地进行的，因此，合同的履行就特别强调实际履行的原则，当事人签订了合同以后，就必须按时、按质、按量地提供产品和劳务，既不允许随便使用其它产品和劳务代替，也不允许任意用赔偿损失的办法来代替合同的实际履行。第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合同签订、履行的全过程都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不受国

家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国家计划有关的产品或项目的经济往来，其权利义务关系的确立、变更或终止都必须接受国家计划主管部门和合同管理机关的管理和监督。按照国家规定必须进行鉴定证明的经济合同，则只有经过合同管理机关的审查证明以后，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才能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了经济合同发挥作用的新的条件，经济合同本身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它受计划制约并为计划服务，与资本主义经济合同有明显的区别。

二

随着社会主义生产的日益社会化，客观上就要求国家采取更严密、更科学的手段来计划生产、组织劳动、指挥和调节各个生产环节、各个企业和组织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往来。为了使国家的管理工作适应经济发展的这一要求，单单依靠行政手段就不够，必须把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结合起来。实现这一结合的一个有效形式，是经济合同。一方面，经济合同的签订和履行都必须坚持计划原则，体现国家对整个经济活动的计划指导，反映国家的意志和要求；另一方面，经济合同签订以后，就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违反经济合同，就要受到经济制裁直至法律制裁。因此，经济合同在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中的作用是很大的。

第一，经济合同是编制计划的一个重要手段。编制计划，是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计划管理的起点。社会再生产能否正常进行，生产、供应、运输、销售各个环节能否衔接，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编制的国民经济计划能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能不能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经济合同，作为企业和经济组织之间签订的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形式，具体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往来，这就使它能够作为国家编制计划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而增强国家宏观决策的准确性。国家在编制计划时，必须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的实际需求，二是社会的经济能力，而经济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最综合的反映。同时，由于经济计划一般只反映国民经济的纵向关系，这就使得以往的计划执行情况不能具体反映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弥补这一缺陷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经济合同。通过经济合同，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和经济往来就可以比较详细而又具体地反映出来，为国家编制新的计划提供依据。

利用经济合同来编制国家计划，不仅表现在可以利用经济合同来掌握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而且还表现在编制计划的具体过程中。目前，我们的计划编制仍然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这种程序编制的计划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在许多情况下不能把产供销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目前许多企业不能正常生产、产品不能适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提高计划的科学水平，就必须改变目前这种编制计划的办法。国家在编制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时，要根据上年或上五年经济合同的签

订和履行情况，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提出计划期的主要控制指标；部门、地方和企业根据计划控制指标逐级签订经济合同，并在经济合同的基础上编制部门、地方和企业的初步计划；然后，国家在逐级平衡地方、部门和企业计划的基础上，再提出计划的具体方案，下达到计划执行部门，作为计划执行部门进行经济活动的依据。按照这样的程序编制的计划，就可以保证计划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生产、供应、运输、销售有机地联结起来，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

第二，经济合同是落实计划的一个重要途径。社会的生产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的需求又是纷繁复杂的，就我国的现实来说，仅工交企业就有四十万个，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这些企业的全部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的统一计划。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任何计划都是尺度、准则、灯塔、路标”，（《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3页）而计划的具体化和精确化，则要靠经济合同来实现。通过经济合同，就可以把国家计划从品种、规格、数量、质量等都加以具体化，并具体落实到企业和经济组织。特别是对农业生产，在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就更需要通过经济合同使国家计划具体落实，保证国家计划的全面完成。利用经济合同来落实国家计划，还可以改变目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下达计划的办法，把过去的那种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变为权利义务关系，改进计划工作。同时，利用经济合同来落实国家计划，还可以及时发现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为修改计划和制定新的计划提供依据。计划文件本身是否正确，当它下达到企业并通过经济合同去落实时，就可以得到实际的检验。企业和经济组织之间签订和履行经济合同的情况，可以使我们能具体地来衡量计划的完备性和准确性，计划的指标是否可行，计划的措施是否有力，通过合同可以得到反映。通过经济合同，就可以检查出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断改进计划工作，使国民经济计划日益趋于完善。

第三，经济合同是执行计划的一个重要工具。经济合同的核心是经济责任。经济合同一经订立，当事人双方就要承担履行合同的义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合同当事人不但负有对他方的义务，而且还负有对国家的义务。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各个经济合同正常的履行过程，就是整个国民经济计划顺利实现过程。因此，合同的履行，就是计划的执行，合同的全部实现，就是计划的全面完成。由于经济合同能够具体衔接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之间横向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往来，使生产、供应、运输、销售有机地联结起来，这就可以实现以销定产，以销促产、产销结合，而且可使原材料供应有切实的保证。在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情况下，各企业执行经济合同的情况都与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有着直接的联系，这就可以促使企业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合同任务，保证国家计划的顺利实现。

利用经济合同来执行国家计划，还有利于国家对计划的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一方面，实行经济合同制，计划任务与合同任务融为一体，有利于发挥银行的监督职能。企业签订了经济合同，要从银行取得贷款，企业履行了经济合同，要通过银行进行转帐结算，合同的执行情况、计划的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银行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合同管

理和计划管理密切相关，实行合同管理，国家就要有一个统一的对经济活动的调节行政机构——合同管理机关，它在客观上起着一种管理和调节企业的经济活动、促进合同履行和保证计划完成的作用。这样，就使国家的各个经济管理机关能够相互配合，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和谐发展和正常运行。

三

发挥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近年来，党和国家在实行和推广经济合同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合同制度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经济合同制在我国普遍实行的时间还不长，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还不健全，合同的管理不严，加上计划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病，使得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还没有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来。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为经济合同进一步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

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是发挥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的一个基本前提。我国现行的计划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五十年代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按照这种计划管理体制，很难编出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国民经济计划，也很难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进行有效的计划管理。由于这种计划管理体制主要以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弊病，难以保证计划的科学性，也难以保证计划的稳定性。在这样的条件下推行经济合同制，就必然把经济合同作为单纯地执行计划的工具，不可能体现经济合同本身的特点，也不可能正确有效地发挥经济合同的作用。因此，为了发挥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就必须对现行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把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改为依靠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结合；把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编制计划改为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办法，为经济合同在编制计划、落实计划和执行计划中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还要正确划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该管的就要由国家管起来，该放的就要放开，让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和各自的利益，自由地签订合同。目前，在合同的管理工作中，对于因计划的变动而引起合同的变更或解除，一般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来处理，这对维护经济合同的法律效力是不利的。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情况：如果计划的变动是由于计划管理机关或工作人员所无法预见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则可以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处理；如果计划的变动纯粹是由于计划管理机关或工作人员工作中的过失等主观原因造成的，那就不能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处理，就必须追究有关部门或工作人员的经济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计划部门和计划工作人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才能保证经济合同真正具有法律效力。

加强合同管理工作，是发挥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经济合同的管理，是指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实行的行政监督。由于人们对经济合同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对经济合同的签订、履行等方面的基本

知识还不十分了解，因而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混乱。有的企业不遵守国家计划，盲目签订合同，随意撕毁合同，出现了经济合同与国家计划相脱节、相背离的情况；有的企业本来就不具备履行合同的条件和能力，但是为了得到银行贷款，也与其它企业签订假经济合同；有不少合同，条款不齐全，要求不具体，表达不明确，在合同的签订阶段就为合同的履行留下了隐患。因此，为了发挥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必须大力加强经济合同的管理工作，促使当事人双方根据国家计划和法律，来严肃地对待合同，认真地签订合同，全面地履行合同。从当前的情况来说，加强经济合同的鉴证工作，则是保证经济合同为计划服务的一个重要措施。合同的鉴证，是国家规定的合同管理机关对经济合同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可行性进行的鉴定性证明。当事人双方签订的经济合同符合国家计划和法律，符合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价有偿的原则，反映当事人的真实而又能够履行的合同，合同管理机关经过审查，就可以予以证明；反之，就不能予以证明。这是国家进行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进行鉴证，合同管理机关对当事人双方签订的经济合同就无法了解，也就无法发挥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目前，我国对经济合同的鉴证问题没有统一规定，除一部分按有关部门或地方规定必须进行鉴证的合同以外，其它的合同，是否进行鉴证，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主观意志。这对加强经济合同的管理工作也是不利的。应该随着经济合同的日益广泛的推广，不断扩大经济合同鉴证的范围，凡是与国家计划有关的经济合同，都应该进行鉴证。在条件成熟时，还要颁布有关鉴证方面的法律，以此来维护经济合同的严肃性和计划性。

建立和健全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是发挥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的一个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法律既是经济生活的规范，也是经济活动的准则，是国家组织和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立法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经济合同法的公布和实施，对加强合同纪律，搞好合同管理，保证经济合同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等各个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经济合同法对经济合同计划原则的规定，还是比较笼统的，即使是对购销合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等作出的一些规定，也是很具体的，还不足以保证经济合同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因此，建立和健全有关的经济法规，就成为保证经济合同为计划经济服务的一个重要条件。要加快制定计划法，对计划原则，计划内容，计划的综合平衡，计划的编制、审批、下达、执行和调整，计划的管理和监督，计划责任制度等重大问题作出规定，明确国家计划的法律效力；要加快制定有关合同管理方面的法规，如鉴证条例、仲裁条例等，使合同管理工作能够有法可依，处理合同纠纷能够有章可循；还要加快制定经济合同法的各个实施细则，把经济合同法规定的计划原则具体落实和体现到各种具体的经济合同之中，从而建立起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协调的经济合同体系。同时，还要大力加强经济司法工作，建立和健全执行国家有关经济法规的专门机构，及时处理各种经济案件，追究和制裁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证国家法律的贯彻执行。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

蔡 馥 生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是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商品和由商品交换产生出来的货币开始的。马克思认为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难处在于商品，而不在于货币。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便对读者说明：“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页）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章关于货币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一开头就引用英国国会议员格莱斯顿的话说：“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但马克思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只在于清楚地理解货币所固有的形式规定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一切资产阶级关系都镀上了金和银，表现为货币关系，因而货币形式似乎具有一种无限复杂的、对它本身说来是外来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4页）

如何弄清楚货币固有的形式规定性呢？这就很有必要回顾一下货币的发展史。货币的发展史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信用货币和纸币这四种形式。

实物货币。实物货币在原始社会的野蛮时期就有了萌芽。到了文明时代，随着商品生产的发

展，产品种类逐渐增多，实物货币有了发展，但各国各民族的实物货币的形式不尽相同。在各国历史上，最早充当货币的大多是牲畜、兽皮、谷物、布帛等物资。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古代也曾用过牲畜、兽皮、谷物、布帛以及作为装饰品的贝壳来充当货币。但以实物作为货币，其中有的容易霉烂，如谷物，不能久藏；有的不能分割，如牲畜，一分割就失去它的使用价值。这样，在长期的交换过程中，实物货币便让位于金属货币。金属货币既不易霉烂，也可分成若干小块。

金属货币。金属货币在我国该是从仿造铜贝开始的。到了商朝和周朝时代，主要金属货币有布币、刀币、圉币。布币亦称铲币，流通于韩、赵、魏等国，即现在的山西、河南、河北一带。刀币也是一种生产工具，流通于山东半岛，后流入于河南、河北等地。圉钱，圆体方孔或圆孔，流通于周秦，即现在的陕西、四川。在楚国即现在的湖北省，有爰金和蚁鼻钱。这些金属货币虽具有实物货币所缺乏的优点，但在交换过程中也暴露出它们的缺点，如价值小而体积大，不便携带搬运，会氧化生锈。这样，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铜铁等贱金属货币便让位于贵金属的金和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就是金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5页）在西欧，贵金属货币的金和银的广泛流通，是在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在我国的历史资料中，历代帝王都有用黄金来赏赐大臣的记载，但我们从未见过我国的金铸币。银币也是长期作为银块元宝来流通使用的。鸦片战争后，才从国外流入大量银元。到1889年开始在广东开设造币厂自铸银元，湖北、天津继

之，银元才通行全国。

信用货币。货币虽天然地是金银，但金银是矿产，而且产量都不高。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它们担负起千万种商品交换的媒介，显然是难以胜任的。这样，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便出现了银行券、支票、汇票等信用货币来弥补金银这两种贵金属货币的不足。信用货币是代替贵金属货币充当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一种信用证券。它直接是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银行券出现于十七世纪。当时银行券的发行是由商业票据所引起的。商品经济越发达，越需要大量金属货币来充当流通手段。金属货币不足，携带也不方便，银行便发行银行券、支票、汇票等来为商品经济的顺利发展服务。商品交换增加，信用货币就增加，商品交换减少或结算时，这些信用货币便流回到银行。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按交易需要来调节的，并且每一张多余的银行券都立即回到它的发行者那里去。银行券这样，支票和汇票也是这样。但是发行银行券需要有发行准备金或叫兑换准备金，其中一部分就是金币或银币以备持票人来兑现之用。在资本主义上升的时候，银行为适应工商业的需要，扩张信用业务，以分取从工人阶级榨取来的剩余价值。但是资本主义的痼疾——经济危机一到来，挤兑风潮爆发，工商业贷款收不回来，大批银行便随着工商企业的倒闭而倒闭。这是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我国的信用货币早在唐代就出现，当时各地商人从远道到京师，把货物出卖后，要把货款带回去，既繁重又风险。商人便把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即当时各道驻京办事处），进奏院发给商人一张票券，叫文牒或叫公据。商人回到本道便拿这张票券向本道衙门取款。

纸币。纸币和信用货币虽然本身都是一张纸，没有什么价值，只是载明若干货币单位代表金属货币来执行货币的职能，但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首先，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则是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中产生出来的；其次，纸币是靠国家权力强制发行和流通使用，信用货币则全靠银行信用来发行和流通使用；再次，纸币是不兑换现金的，它的发行可不受限制，而信用货币则是要兑换现金的，它的发行要交纳发行准备金，发行数量是受限制的。纸币是价值符号，从表面看，它好像是

直接代表商品价值的符号，实际上不是这样，马克思说：“表面上看来，价值符号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它不表现为金的符号，而表现为在价格上只表示出来、在商品中才实际存在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但是，这个表面现象是错误的。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5页）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银行券、支票、汇票等信用货币就很盛行。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由于参战国家军费大量增加，国家财政预算出现赤字，这些赤字在战争时期不断增大，它只能用增发银行券来弥补，因此造成通货膨胀。这种大量增加的银元券，如让持票人向银行兑换金币或银币，势必爆发挤兑风潮，发行银行是无法应付的。因此，各参战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相继宣布银行券停止兑换现金。这样，兑换的银元券一变而为不兑换的银元券，成为国家强制发行的纸币。这种国家强制发行的纸币，任何人都必须接受，不能拒绝。所以，强制通行的国家信用货币是价值符号的完全形式。由于凭国家权力可以“点纸成金”，古代有的国家虽然工商业还不十分发达，信用货币还不盛行，统治者为了要汲取民脂民膏以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也发行纸币。马克思说：“在信用完全没有发展的国家，如中国，早就有了强制通用的纸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7—108页）西汉白鹿皮币是我国最早的纸币。宋代的交子也是一种纸币。它分官交子和私交子两种。官交子是分界发行，即每三年换一次，实际是长期不换。这些纸币因为并不是在工商业发达的社会从商品交换产生出来的，不为人民群众所公认接受，因而不能继续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的货币——人民币，亦是一种由国家统一发行和管理的纸币。但我国的人民币既不同于封建帝王用来汲取民脂民膏的纸币，和资本主义国家当前普遍使用的不兑换的纸币也有本质的区别。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纸币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它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国的人民币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因而它不能作为资本，不能被利用来剥削劳动人民，而是被利用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人民生活

服务的。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的纸币是从弥补财政赤字产生出来的，它既没有兑换准备金，也没有物资做保证。这种弥补预算赤字的财政发行必然造成通货膨胀。我国的人民币，有充足的物资作保证，保证人民币的持有者能从市场上买到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的纸币是带有侵略性的。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用货币作武器，实行货币贬值，以争夺国际市场和大量垄断资本输出。我国的人民币是独立自主的货币，它只在国内流通使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为人民生活服务。

理解了货币发展的过程和我国人民币的性质以后，我们再来研究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

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发展过程时就说明他所论及的只是金属货币，而且是以金作为货币商品。他说：“我们所谈的只是以商品交换直接产生出来的那些货币形式，而不是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那些货币形式，如信用货币。为简化起见，到处把金作为货币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4页）马克思虽然说明他所论述的只是金属货币，但在阐述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主要职能之后，却明确指出纸币的流通规律和金属货币流通规律的差别。他说：“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实际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反着表现出来了，颠倒过来了。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票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的自己的价值，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数量。流通的金量随着商品价格涨跌而增减，而商品的价格却似乎是随着流通中纸票数量的变动而涨跌。商品流通只能吸收一定量的金铸币，因而流通的货币量交替地紧缩和扩张是必然规律，而纸票却似乎不论增加多少都可以进入流通。国家发行的铸币哪怕只少于名义含量1%克冷，就是减低了金银铸币的成色，因而破坏它们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国家发行只具有铸币名称而不包含任何金属的无价值的纸票，却是执行了完全正确的措施。金铸币显然只有在商品价值本身用金计算或表现为价格的时候才代表商品价值，而价值符号却似乎直接代表商品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11—112页）

理解马克思所指出的纸币流通规律，对于我

们制订社会主义金融政策，指导社会主义金融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在货币流通和价值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金属货币因其本身有价值，所以才能流通，而纸币则必须能流通才有价值，才能做价值的符号。在旧中国，长期来是以银两为计价和记帐单位的，1933年4月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宣布废两改元，以银元为计价和记帐单位。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实行所谓法币制度，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四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法币规定以白银为发行准备金，却不能兑换银元。据1935年10月统计，除中、中、交、农四家银行外，全国还有三十多家私营银行也发行银行券。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统治区，仅山东一省就发行了九十种纸币。1935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就达8.2亿元。1937年到1945年财政预算赤字逐年增加，伪法币发行量增加了390多倍，1945年到1948年8月这三年间，伪法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多倍，远远超过抗战八年的增长速度。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为欺骗人民，又发行了所谓金元券，一出笼就被人民拒绝。同时，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美国、比利时、荷兰等帝国主义国家均在中国设立银行，发行钞票在市面流通使用。由于国民党政府国家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在抗战时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币值一落千丈，人民群众蒙受极大损失，对伪法币失去信仰，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便乘机大量侵入，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流通，到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前夕，据估计，仅美国美元在中国的流通额就达十二亿元。香港汇丰银行、麦加利和有利三家银行所发行的港币在中国的流通额亦达十七亿多港元。在旧中国金融市场十分混乱的情况下，要使人民币能为全国人民所接受，占领全国金融市场，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为达到这个目的，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采取了下列政策和措施：

（一），肃清伪法币、伪金元券、伪银元券。在有利于打击敌人，有利于保护人民利益，有利于稳定市场，保证人民生活等原则下，采取实事求是的有效措施，逐步肃清解放区内伪法币、伪金元券、银元券，使人民币占领全国金融阵地。

（二），驱逐外币，特别是港币。几十亿的外币在我国内流通，说明帝国主义者曾从我国掠

夺价值几十亿外币的物资，在全国大陆全部解放前后，即在华南地区展开了驱逐外币运动，向人民群众宣传，按规定牌价收兑，把外币集中起来投向海外把物资抢回来，同时禁止外币在市场流通使用。

（三），禁止金银在市场上流通使用。金银都是一种商品货币，它们都是最好的货币素材。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它们在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两种商品货币如果没有信用货币的协助就无法完成货币的职能。我国的金银产量很低，不能胜任货币的流通手段自不必说，但如让它们留在金融市场流通，那就会妨碍人民币的流通。因此，政府一方面按牌价把金银收兑集中到银行来，以便加强人民币这一统一的金融市场的管理，另一方面可把金银作为世界货币使用，进口我国所需要的物资。

经过采取上述这些措施，我国的人民币在建国前后很短时间内便占领全国金融市场，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胜任地执行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货币职能。

第二，在货币价值与货币流通量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在金属货币制度下，货币的价值决定着货币的流通量，金的价值高，货币的流通量就可少些，反之，货币的流通量就要多些。在纸币制度下则相反，纸币的流通量决定纸币的价值。纸币的流通量增加，纸币的价值就下跌，反之，则纸币的价值就上涨或稳定。怎样控制人民币的发行量，使它能和市场需要量相适应，这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我国人民币在建国初期是采取经济发行的方针。经济发行就是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增加工商业信贷来发行，故也称信贷发行。这种经济发行能控制货币发行量，因为工农业产品增加，银行就贷款给商业部门进行收购，这种发行就有物资的保证；而商业部门把商品卖出去，又把货币收回，还清银行贷款，人民币就不停留在市场上。至于财政发行，是资本主义国家经常用来弥补赤字的办法，它包括财政部门向银行透支，或企业把银行贷款用于上交利润税款等财政性开支。这种发行是没有物资保证的，所以，必然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对国计民生都很不利，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应采用的。

第三，在商品价格和货币流通量的关系上。

马克思指出：在金属货币制度下，商品价格的涨落决定于金属货币流通量的增减，商品价格高，货币的流通量就要增加。反之，就会减少。在纸币制度下则相反，纸币的流通量的增减决定商品价格的涨落，流通量增加，商品价格就上涨，货币流通量减少或不变，商品的价格就下跌或稳定。为了保障人民生活 and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国除坚持经济发行的方针外，同时对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物资，实行计划价格。这样便使人民币持有者买到生活需要的物资，使我国人民币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

第四，在市场需要量和货币流通量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在金属货币制度下，如果货币流通量超过市场的需要量，超过的金属货币就会自动紧缩退出流通界，在纸币制度下，则不管投放多少纸币，流通领域都可以容纳。依照纸币这一流通规律，为了防止过多货币冲击市场，管好货币流通，我国在1950年的抗美援朝时期，就开始实行现金管理制度。规定党政机关、团体、企业，现金只留三天零用钱，其余必须存入银行。这样便把全国的货币管理起来了，不让它冲进市场兴波作浪。另一方面开展爱国储蓄运动，把城乡闲散资金收集起来以供应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的需要。这样便保证了抗美援朝时期国民经济继续发展和取得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

从“二五”时期开始，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撕毁协定，使我国经济遭到极大的困难。国家财政预算出现赤字，只能靠财政发行，增发钞票来弥补，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有的通货膨胀。经过贯彻执行党和政府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形势有所好转。但十年动乱，生产力受到更大的破坏，国家财政预算长期出现赤字，均采用财政发行的办法来弥补。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基本建设的战线拉得太长，1979年国家财政预算仍出现了赤字，虽经发行国库券来弥补，但国家财政预算的赤字未能完全消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后，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了重积累、轻消费，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的偏差，积累率已从1978年的36.5%，调到1982年的29%，消费基金有了较大的增长。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已由1978年的27.8%提高到1982年的

33.6%，轻工业所占比重由31.1%提高到33.4%。这些说明三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国民经济已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在这大好形势下，我国金融工作应该怎样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呢？我认为：

第一，禁止使用外币，让人民币完全统一占领全国的金融市场。大量外币存留在我国市场，说明大量的物资外流。解放前这样，解放后的今天也是这样。因此，我们不能容忍解放前港币充斥市场现象的重演。采取什么办法呢？近年来有发行特区货币的呼声，这当然是一种可考虑的办法。但当前情况和三十多年的情况大不相同，我们必须从出口商品价格、外汇价格、特区本身经济力量，特区和港澳关系等方面来考虑，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

第二，要坚持经济发行方针以保证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由于“二五”以来没有坚持经济发行这一方针，搞了不少财政发行，在当前人民币流通量超过商品流通量，国家财政预算赤字还未能完全消灭的情况下，必须坚持经济发行这一方针，不能再搞任何方式的财政发行。

第三，要贯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通过补偿贸易、来料加工装配、与外资合作经营等方式，尽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打好工农业生产技术基础，提高劳动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改变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出口商品数量，以争取更多的外汇来为四个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



“闻鷓鴣”新解

程芳银

辛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山深闻鷓鴣”句，异解颇多。

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释此句曰：

“‘闻鷓鴣’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

近人邓广铭先生反驳说：“所谓‘山深闻鷓鴣’者，盖深虑自身恢复之志未必即得遂行，非谓恢复之事决行不得也。”（转引自刘逸生《宋词小札》）

刘逸生先生则认为：邓先生的解释“这自然比罗大经的解释合理，但个人以为这些鷓鴣之声应该是指投降派的叫嚷。因为这更近于作者写此词时的心情。”

这都是从古人认为“鷓鴣的叫声”象“行不得也哥哥”而阐发来的。众多的注本大都如此，不一一赘举。

但汉杨孚《交州异物志》记载：

“鷓鴣其志怀南，不思北……其鸣也，‘但南不北’。”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亦载：

“鷓鴣似雌雄，飞但南不北”，“鸣曰‘向南不北’。”（见前集卷十六、续集卷八）

在这阙词中我认为辛弃疾用的却是杨孚、段成式之说。“闻鷓鴣”之句，鷓鴣喻指南宋小朝廷但南不北，全句对南宋统治者不思收复北方而感愁怅、愤懑。这样似更切合辛弃疾写词时的心情，



学术专访

如何联系广东的历史实际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

本刊历史编辑组

就如何通过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向我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本刊历史编辑组于今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学术专访》。为了更广泛地反映广东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又陆续走访了中山大学的陈锡祺教授和胡守为、黄重言副教授;暨南大学的朱杰勤、陈乐素教授,以及华南师范大学的关履权教授等。在这次采访过程中,我们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些老前辈的历史学家们热忱拥护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呼吁,认为这是史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他们又异口同声地要求为更好地开展这一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他们呼吁有关领导要认真地把这方面工作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下面发表的是这次采访的记要。

一、史学家们的呼吁

七月四日,我们来到环境幽雅的中山大学东北区,对陈锡祺教授进行采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据说这一天,他原打算跟中大部分师生一道,到番禺县莲花山参观,后听说我们要来采访,就留下来了。莲花山是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遗址,一八四一年,英国侵略者通过鸦片战争强占香港岛后的第二天,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的代表琦善曾在这里会见义律。当时即有数千爱国军民围山观看,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这是可以用来对我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遗址,采访的话匣就从这里打开。

陈锡祺一开始就谈到历史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说,讲爱国主义,所有国家,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国家,必须从历史讲

起。不了解本国和本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对自己的祖国产生热爱的感情。他说,我们的祖先深深懂得历史的重要,修史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是过去史学家修史的指导思想。为了修史,许多史学家作出了很大牺牲,他们的事迹很感人。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各个朝代的历史,过去史学家的治史精神,许多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陈锡祺对建国三十多年来历史科学研究的情况作了回顾。他说,我们党向来重视历史,毛泽东同志读了很多历史书,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很注重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记得解放初,报纸上就辟有“伟大的祖国”这个专栏,介绍祖国的大好河山,介绍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这就是用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具有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明,世界上许多国家、许多有识之士都很羡慕我们。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祖国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一伙只要历史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服务,叫嚷大学不设历史专业,中小学不上历史课。这显得多么荒唐!连本国的历史都不要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前途不是可想而知吗?

现在的情况又怎样呢?陈锡祺回答说,打倒“四人帮”以后,历史科学重新得到重视,我们党重视历史的传统得到发扬。但存在问题也不少。看来历史科学在社会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普遍的重视。许多青少年以至不少国家干部,对祖国的历史或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想起过去读小学时,就要背诵中国历史朝代的更替。现在小学生

能背诵的恐怕为数不多，这也难怪，没有教嘛，没有要求嘛。再说对文物保护问题：文物也可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国文物确实非常丰富。广东有自己的特点，近代文物特别多。但是由于过去文物保管工作做得不够好，有些文物散失了，有些遗址也找不到了。

我们请陈锡祺教授就这一问题细谈自己的意见。他略作考虑，举出了几个例子。他说，在鸦片战争中，从虎门到广州有许多遗址，大部分都管理不善。有些炮台原来还保存的，现在没有了。广州在鸦片战争时有东、西两炮台，过去很多人不知道这两个炮台的方位，现在调查清楚了，但遗址中已没有什么可供参观的了。遗址上也不立标志。又如四方炮台，这是广州郊区三元里人民打击英国侵略者的地方，遗址很重要，但疏于维护。此外，洪秀全在花县的遗址，搞了多年也没搞好。康有为在广州的“万木草堂”是他培养维新志士的地方，也有必要加以保护和维修。

陈锡祺教授对此很有感慨，我们也颇有感触。据我们所知，只就本市白云路鲁迅故居的复原问题，多少人提出建议、甚至多次在人大会议上提案，有关部门至今仍然推来推去。广东史学界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问题上，不仅积极响应中央负责同志的呼吁，而且以主人翁的精神提出积极的建议，这种精神是很好的。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又连续走访了好几位老一辈史学家。

八十高龄的暨南大学历史系陈乐素教授，在加强文物保护方面也有同感。他说，粤北山区的南华古寺很重要，禅宗这个佛教流派在历史上很有影响。不要以为这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就不予重视。唯心主义这个东西很复杂，需要认真研究。罗浮山也很重要，葛仙翁曾在那里炼丹。炼丹不能只看作是迷信，跟化学的发展有关，很值得重视和研究。肇庆，南明政权的遗址；新会，文天祥的遗址等，这都需要调查、需要鉴定、需要保护。

陈乐素不仅是宋史专家，而且搞了多年古籍整理工作，现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在采访中，他就古籍整理和研究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我们的古籍很丰富，起码有几万种。象《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库，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任何国家都无法跟我们相比。他指出，我们的古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库。爱国主义教育，不能空喊口号。我们说祖国伟大和可爱，

必须拿出具体的东西来。具体的东西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物，一类是文字。长城、敦煌等地是文物遗址，参观了这些地方，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文字部分，就是古籍。古籍，包括书画在内，都可以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古籍整理好，研究好。整理古籍，一是校勘，一是诠释。整理是个大问题；在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写出诸如中国哲学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这些便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我们觉得，陈乐素教授所提的问题很重要。因为从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可以使人们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现在有许多中国的东西，外边很重视，评价很高，而我们倒不了然。许多青年人，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自古落后的国家。搞好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可以用来扫除诸如此类妄自菲薄的思想。让人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从而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坚定人家能够达到的，我们也一定能达到的决心。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请陈先生联系广东的实际，谈谈在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有哪些急切要做的工作。

陈乐素说，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很重要，中央一直很重视，陈云同志也作过多次指示。我们要很好地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分阶段地把古籍整理工作搞好。他指出，在古籍整理方面，广东应该是重点。若干年来，广东对古籍整理重视不够，许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他说，出在广东的东西，广东人或在广东的人不整理，不研究，那怎么行呢？这不光是某个学者的事情，首先领导要重视。暨南大学要成立一个古籍研究所，酝酿了很长时间，到现在还是一个“筹备处”。过去是经费问题；经费解决了，人材又是一个大问题。他希望有关领导认真抓一下。

陈乐素同时呼吁，广东应当重视地方史志的研究。他说，关于地方史志的研究，跟兄弟省市相较，广东也是落后了。广东至今还没有一个健全的筹备班子。他说，在历史上，广东的开发，岭南的开发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秦汉以来，特别是从宋到清，一个是江浙，一个是广东，经历了一个逐步开发的过程。既有经济开发，也有文化开发问题。韩愈、苏轼等人都曾经到过广东。广东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他说，近代的广东出了康有为，梁启超，出了孙

中山。康梁讲变法，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北伐战争从广东开始，也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一是内，一是外。“内”就是广东经济文化的发展；“外”就是汉唐以来广东跟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他指出，不搞好地方史志的研究，就很难说明诸如此类的问题。

当我们同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谈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问题时，更感到史学界的这种呼吁是很值得重视的。如朱杰勤教授在谈到中外关系史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密切关系时说：在中外关系史中，广东这个地方很重要，广州很早就跟外面有接触，广东条件好，研究工作理应走前一步；但事实是，广东迟迟上不去。福建泉州成立了一个中西交通史博物馆，展出的东西很丰富，广东至今还没有考虑这项工作。其实，广东可以展出的东西也很多，文物也很丰富，我们曾提出成立博物馆的建议，却没有下文。为此，朱杰勤呼吁，广东有关领导应当重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广州海港史的研究工作。要对已经进行或尚未进行的研究项目进行调查。要发现和培养这方面的研究人材。广东人民出版社也要积极出版一些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著作，反映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朱杰勤教授最近编成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的书稿已交给外省出版了。当我们问及此事时，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发牢骚，而且深信，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继续贯彻执行，现在还是“冷门”的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今后一定会开展起来的。

二、坚持从广东的历史实际出发

陈锡祺教授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我们继前次的采访，就如何联系广东近代历史的实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问题，请他发表看法。

陈锡祺很谦虚。对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同行们发表的意见，深表同感。他说，在爱国主义教育中，首先强调近代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提法，是正确的。这是因为，近代的中国，中华民族所受的灾难最为深重，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使中华民族濒临危亡。近代以来，我们民族的优秀女儿，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奋斗，其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因此，中国的近代实在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表现得特别激昂、特别高涨的时代。近代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

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把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因此，用近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全国人民，也就更直接、更丰富、更深刻，效果也就更好。

接着，陈锡祺就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联系广东历史实际问题进一步发表了看法。他说，近代的广东，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很特殊，例如，最早反抗外国侵略的是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最早引进西方生产技术的是广东的早期买办；最早的改良主义者出在广东；1872年，广东陈启源开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也是公认的近代民族资本家开办的第一间工厂。广东经济的发展，广东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继承和发扬广东近代的爱国主义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陈锡祺认为，联系广东的历史实际，宣扬近代的爱国主义，必须突出宣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孙中山可说是最伟大的爱国者。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可谓集近代爱国主义之大成。孙中山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维护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卖国虐民的反动统治；二、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和繁荣富强的国家，让中国人民从贫困苦难的生活中摆脱出来；三、使中国不仅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而且要超过他们，让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陈锡祺认为，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受到广大人民爱国主义思想和行为的激励。据他自己说，他是在中法战争时开始下定革命决心的；而他的爱国主义又鼓舞了当时的仁人志士和广大华侨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陈锡祺说，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直至今天仍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仍将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陈锡祺说，要继承和发扬近代爱国主义传统，在近代史研究上，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思想的影响。过去对洋务运动，完全骂倒，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从镇压太平天国来说，它是反动的；但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角度看，却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洋务派办了许多新事业。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就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对待早期买办，也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近代引进西方的东西，很多就是买办干的。广东的容闳、郑观应都做过买办。但他们在跟外

国打交道时，却充满着爱国主义。郑观应听到法国海军攻打基隆，就彷徨不安，睡不着觉。他写的《盛世危言》，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陈锡祺认为，历史是复杂的。不论是谁，在热爱祖国上做过一些好事，该肯定的就得肯定。

陈锡祺还说，由于广东在近代史上所处的特殊位置，编好一部广东近代史，不仅对广东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而且对全国也将是一个大贡献。我们和陈先生一样，希望一部内容丰富而又有独到见解的《广东近代史》能早日问世。

三、华侨史是一部爱国主义的活教材

广东是重要的侨乡。联系广东的历史实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自然就要联系到华侨的爱国主义、联系到华侨史的研究问题。为此，我们走访了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黄重言副教授。

我们从黄重言最近发表的论述华侨史的几篇文章谈起，比如谈了他在《广东华侨历史学会通讯》发表的《试论我国侨乡社会的形成、特点和发展趋势》的文章，使我们很受启发。从这里入手，并请他着重谈谈华侨爱国主义的表现、特点和发展趋势等问题。

黄重言说，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华侨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他说，汉唐以来，华侨都是为生计所迫而侨居国外的。他们是普通劳动者，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和政治野心。到侨居国外后，他们以勤劳刻苦、勇于创造的精神，为开发侨居国的资源，发展侨居国的经济贡献力量。他们和侨居国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劳动，既热爱自己的祖国，又热爱侨居的国家。

黄重言强调，华侨的爱国主义，源远流长。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祖国面临被吞并、被瓜分的危险，这不能不激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极大义愤。海外侨胞和国内人民一道，在外御强权、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功勋彪炳，史不绝书。

黄重言认为，近代以来，华侨的爱国主义曾出现过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辛亥革命期间。成长于国内、出身于侨眷、后来又成为侨民的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反映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爱国要求，成了民

族民主革命的伟大旗手。他的革命宣传和在海外领导的反对保皇派的论战，对启发华侨的爱国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广大侨胞接受了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革命纲领。他们出钱出力支援革命，出现了许多毁家为革命，以身殉革命的英雄人物。之后，他们又积极支持国内的反袁护法斗争，反对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支持祖国收复山东权益，支持北伐战争统一中国，还积聚巨资回国参加经济建设。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大觉醒的里程碑，也是华侨爱国主义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里程碑。从此，华侨登上了政治舞台，为祖国的独立、统一和繁荣富强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第二次高潮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华侨在海外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抵制日货，筹集数以亿计的巨款汇回祖国，捐献飞机、大炮、坦克、药物；爱国青年更是热血沸腾，大批回国参军，不少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抛头颅，洒热血。这次高潮的代表人物是陈嘉庚，他毁家纾难，支持抗日，并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自己身体力行宣传这个真理，使广大华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第三个高潮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这时，海外知识分子和广大华侨青年满怀爱国豪情，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归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回国热”到1955年达到高峰。他们回国后，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黄重言指出，华侨的爱国主义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近代以前，华侨的爱国主义多属自发。近代以后，这种爱国主义由自发向比较自觉的方面发展，最初跟民族主义相结合，后来又逐步发展到跟社会主义相结合。但是，不管那一个时期，华侨的爱国主义总是跟血缘、地缘和传统文化这三条纽带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说，由唐至清，华侨总爱把祖国称为“唐”，自称为“唐人”，把回归祖国称为“回唐山”或“住唐”。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唐朝是中国古史上最富强和最富朝气的朝代之一，为后人所景仰。以“唐”相称能启迪民族自豪感，也寄托了华侨期望祖国繁荣富强的美好感情。

黄重言指出，华侨在海外跟侨居国人民和睦相处，久而久之，许多华侨接受了侨居国的语言和文化，有些还跟当地妇女通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华侨仍保留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和

风俗习惯，保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华人社会”。这种由三条纽带维系着的对故乡、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华侨还是外籍华人，都牢固地、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听罢黄重言的发言，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华侨同样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可以这样说，一部华侨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用这样的历史教育华侨，能使他们正确认识自己和前一辈华侨的过去，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华侨的爱国主义传统；用这样的历史教育全国人民，能进一步肃清在华侨问题上“左”的思想的流毒，更加自觉地执行党的华侨政策，为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努力。

四、中外关系史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博览馆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所长朱杰勤教授，是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国内知名的专家。在采访中，我们希望他能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谈一谈爱国主义教育问题。我们担心是不是给朱教授提了一个难题。不料，我们的话音刚落，朱杰勤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好谈！”这才使我们放心，并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朱杰勤认为这个道理很简单。他说：只有通过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过伟大的贡献，从而进一步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朱杰勤说：欧洲奴隶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发生，都跟中国有关系。比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提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时说：“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可见中国对世界进步所起的作用。

朱杰勤接着说，讲到近代的中外关系，主要是侵略与反侵略的问题。我们有许多反侵略的战例、事迹，是可歌可泣的，是可以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不过，从中外关系的总体上看，战争时期是短暂的，和平时期是较长的。两个时

期，中外关系内容都很丰富，我们都要用历史事实来宣传。

在谈了近代中外关系中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之后，朱杰勤又回到古代的中外关系问题。他说，在古代，为了生存，为了改善生活，为了图得各自的发展，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就必须发生联系，内外就必须进行交流。事实最能说明问题，古代的中国传到西方去的都是好东西，都是比较宝贵的东西，如丝织品，如陶瓷，如人参等等都是好东西。这些东西，对改善西方人的生活，促进当地手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钢是汉代运去的，漆器也运去了。

朱杰勤接着指出，中国历史上一直很重视中外关系的研究。在汉代，由于匈奴的骚扰，阻塞了我国丝绸运往西方的道路，汉朝政府不得不对匈奴进行接二连三的打击。于是，司马迁的《大宛传》、《乌孙传》和《匈奴传》及班固的《西域传》相继问世，这显然是配合汉朝经营西域的需要。唐代中印交往颇为密切，玄奘法师奉命撰述《大唐西域记》。宋代与朝鲜友好，使节往来不辍，便有徐兢《奉使高丽图经》之作。由于宋、元、明各朝与东南亚各国来往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亦盛，于是有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等等。郑和下西洋后，又涌现出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和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等有关中外关系的著作。十六世纪后期，中国防倭和援朝抗日期间，关于日本和朝鲜的著作纷纷出现。清代关于中俄关系的著作为什么这样多？因为十七世纪俄罗斯不断侵略黑龙江流域，引起朝野人士密切注意，于是有何秋涛《朔方备乘》等书出版。当时出现研究西北史地风气，目的在于对付俄罗斯。到十九世纪，英国侵略者侵略我国东南沿海，于是有魏源的《海国图志》之作。诸如此类的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

事实充分说明，一部中外关系史，可以说就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博览馆。这是朱杰勤教授和我们的共同认识。在这个博览馆里，有古代的东西，也有近代的东西，有物质的东西，也有精神的东西；有战争时期的东西，也有和平时期的东西。其中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今天可以用来进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

五、不能忽视的方法论问题

在这次采访中，许多历史学家都谈到，要发挥历史科学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方法论问题。他们的意见，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要全面认识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关履权教授说，曾经有一种见解，认为只有在遭到外族的压迫与侵略时，从言论和行动上进行坚决抵制，或身在异国，满腔热情地关心祖国而有所贡献的人们，才称得上是爱国主义者。这种见解把爱国主义理解得过于狭隘。他赞成范文澜同志的意见，主张对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作广义的理解。他说，爱国主义应该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民族战争中的爱国主义。当一个民族或国家遭到异族或异国侵犯时，这个民族或国家的人民奋起反抗，维护民族尊严与国家独立，这应是爱国主义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二、革命战争中的爱国主义。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近代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相继领导的革命运动，都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的性质。三、社会改良中的爱国主义。当民族当国家处于社会矛盾尖锐，政治、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能够切中时弊，提出革新更法的政治主张，或采取让步政策，或忠言直谏劝阻约制反动统治阶级的暴行，尽管他们的动机是维护国家政权的根本利益，但这种改良与让步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这是符合祖国和人民利益的，无疑也是有爱国主义的性质。四、在创造中华文明中的爱国主义。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涌现了许多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文学家，他们富有成果的实践，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对世界人类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为祖国赢得了历史的尊严和光荣。这显然也是爱国主义历史遗产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五、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在祖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虽曾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民族分裂和民族战争，出现过几个国家政权并立割据的局面，这毕竟是历史的暂时现象。各民族的友好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反对民族分裂，维

护祖国统一，是民心所向，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又一重要方面。关履权说，以上五个方面，都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爱国主义教育中，都应该受到肯定和宣扬。

既要宣扬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又要宣扬中华民族在精神文明方面对世界的贡献。中山大学历史系代主任胡守为副教授说，中国古代有很多发明创造，在天文、数学、医药学等方面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过重大贡献。这些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固然要宣传，同时，也不能忽视我国在历史上出现的许多卓越的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对世界所作的贡献。

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关履权、胡守为认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因此，对爱国主义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阶级分析也是需要的，但要正确运用。过去有一段时间，出现过一些不正常的情况，片面强调阶级分析，把奴隶主、封建主以及资产阶级中的一些杰出人物，不是全面否定，就是基本否定，理由是，他们最终还是为剥削阶级服务。是跟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的。胡守为说，这种倾向在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中，要特别引起注意。他还说，研究历史，贵乎实事求是，史料一定要真实，要有根有据。片面夸大，任意拔高，那不是科学，也没有说服力。他说，过去人们推崇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为什么呢？重要的一条，就是认为他比较实事求是，尊重史料的真实性，把推论建筑在可靠的根据之上。陈寅恪先生比一般的史学工作者高出一筹，原因就在这里。胡守为说，对一个人、一件事、一种思想的评论，都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个人，纵使有许多不好，但只要他爱国，有一件事或几件事做对了，就不应全盘否定。如左宗棠，他确实做过许多坏事，但他注意西北防卫，在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上做过好事，该肯定的就得肯定。

关于通过历史研究和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学术专访暂告一段落。我们只是报道了广东史学界部分同志的看法，不免挂一漏万。我们热诚期望，在史学界同志们的积极支持下，能将这一具有意义的工作越做越好。

梁启超论孟子遗稿

梁 启 超

孟 子 略 传

孟子名轲，邹人（邹为春秋邾国，今山东邹县）。盖生于周烈王时，当周平王东迁后三百八十余年，孔子卒后九十余年，秦始皇并天下前百五十余年，民国纪年前二千二百八十余年。（万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定为生于烈王四年己酉，但所据之书不甚古，今不敢武断，但举约数耳。）其时七雄并立，而泗上十二小侯尚存。孟子所尝游居之国，在七雄中曰梁曰齐，在小侯中曰邹曰鲁曰宋曰滕曰薛曰任。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而私淑孔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据《史记·孟荀列传》。而《汉书·艺文志》本注云，子思弟子，赵岐《孟子注序》亦云长师孔子之孙子思，后人遂有谓《史记》门人之人字为衍文者。崔述《孟子事实录》云，孔子之卒，下至孟子游齐、燕人畔时，一百六十六年矣。伯鱼之卒，在颜渊前，则孔子卒时，子思尚不下十岁。而孟子去齐后居邹之宋之薛之滕，复游鲁而后归老，则孟子在齐时，亦不过六十岁耳。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余年，孟子何由受业于子思乎？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若亲受业子思，必当明言其人以见其传之者同，何得但云人已乎。孟子之学深远，恐不仅得之于一人，如孔子之无常师者然，故但云私淑诸人耳）。其于古圣人最乐道尧、舜、文王、伊尹、伯夷、柳下惠，而所愿学终在孔子。孔子卒后，儒分为八（据《韩非子·显学篇》）。邹鲁学者多断断于礼容之末节而不见其大，惟子思述家学以作《中庸》，上探本于性与天道，而下及经纶天下之大经，孟子受其传而光大之，儒学一新焉（孟子虽然亲受业子思，然其得子思之传则无疑，合《中庸》、《孟子》两书读之可见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子思、孟子连举而并攻之，谓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倡之，孟轲和之”。观此可知孟子之学所出也）。以为人所以能宏道者，由其有良知良能，故言性善。此善性当务自得而有诸己，故言存养。此善性当博极其量，故言扩充。其教人在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故与曾子一派专务致谨于容貌辞气颜色之间者有异，与子夏一派专讲进退应对之节传章句之文者亦有异，其示人入道之途有二：曰狂，曰狷。狂者进取，故勇于自任，以圣人为必可学，以天下事为必可为；狷者有所不为，故尚名节峻崖岸，不屑不洁，终未尝枉道以徇乎人也。时商鞅方以法术功利之说致

秦于富强（商鞅入秦时，孟子约十一二岁，商鞅见杀时，孟子约三十四五岁），而苏秦、张仪、公孙衍之流，复以纵横游说人主，势焰倾天下（苏秦合纵时，孟子约四十岁。孟子游梁时，公孙衍、张仪，皆先后相梁），而诸国数交战无宁岁（齐梁桂陵之战，孟子约二十岁。齐梁马陵之战，秦梁岸门之战，孟子约三十二三岁。梁楚襄陵之战，孟子约五十岁。六国合兵揜秦至函谷，孟子约五十五岁。齐灭燕，燕畔齐，孟子约六十岁。秦楚丹阳之战，孟子约六十一岁。楚灭越时，孟子约四(?)十岁。赵灭中山时，孟子约八十岁），孟子深嫉之。故其论政也，以怀利为大保，以禁民为要义。而非攻寝兵

之说，尤三致意焉。指善战阵工聚敛者为民贼，斥纵人横人为妾妇之道。然其理想之政治固在统一，特谓欲求统一，当以仁政而不以战耳。欲行其道，乃见诸侯，年逾五十始游梁。时梁惠王数败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孟子因至焉。以仁义语惠王，不能用也。居三岁，惠王卒，襄王立，孟子去梁。时齐宣王新即位，招致贤士于稷下，孟子往焉。由梁返邹，由邹之任之平陆乃入齐（约五十四五岁），仕齐为客卿，中间以母丧归葬于鲁（约五十六七岁）。既终丧，鲁侯欲礼而用之，以沮不果。复至齐，既而齐伐燕，取之。孟子劝宣王存燕，不听，燕人果畔，宣王惭焉。孟子致为臣而去，年已六十矣。孟子陈义既高，不为时主所悦，又以道自重，不肯下人，故难进易退。所至之国，未尝有所终三年淹。既去齐，返邹，过宋，滕文公为世子，就见焉。文公嗣立（其年不可考），孟子游滕，为制井田。然滕壤地褊小，终不能大有为，孟子亦遂归老于邹。与其弟子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此据《史记》本传文也。赵岐《孟子题词》则以七篇为孟子所自著。今考其书于时君皆举其谥，其中梁惠王、齐宣王固先孟子卒，若鲁平公、邹穆公、梁襄王、滕文公之类，未必皆先孟子卒。疑此书由孟子发凡起例，而弟子写定之，《史记》之言当矣。书中诸弟子惟万章、公孙丑二人不称子，或即由二子写定耶）。其弟子之著者，曰万章，曰公孙丑，曰乐正子（名充），曰公都子，曰屋庐子（名连），曰徐辟，曰陈臻，曰充虞，曰陈代，曰彭更，曰咸邱蒙，曰桃应。并时学者

孟子年谱
孟子名軻，邹人。邹，今山东邹县。孟子生於周烈王时。
常因齊王東遷後二百一十餘年，孔子卒後九十年。
鮮年，秦始皇并天下，前百五十年，民國紀年。
前二百一十餘年，其時七雄並立而泗上十二
小侯尚存，孟子所當游居之國，至七雄中曰梁曰
齊，在小侯中曰鄒曰魯曰宋曰滕曰薛，曰任。
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私淑孔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按之

相与上下议论者，曰告子（失其名，其人能先孟子不动心，言性又多合于孔子，盖儒家一大师也），曰宋轻（《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钘并举，《庄子·天下篇》以宋钘、尹文并举，钘即轻也，盖当时墨学大师，孟子称以先生，亦甚敬之矣），曰淳于髡（髡，《史记》以入《滑稽传》。然《孟子荀卿传》亦载其名，盖齐稷下先生之有名者，其与孟子论名实，殆亦通名家言也），曰许行（许行不见它书，观本书述其言论，盖农家者流之祖，渊源出于墨学，亦当时一大家也），曰白圭（《史记·货殖列传》称白圭乐观时变，盖最大之生计学家，其与孟子言治水，亦一工学家矣）。其宗旨行谊为书中所称述者，曰墨翟，曰杨朱（杨朱为道家别派，除本书外，惟列子征引其学说特详），曰公明仪（公明仪，《祭义》郑注谓为曾子弟子，《擅弓》孔疏谓为子张弟子），曰公明高（公明高疑即公羊高），曰陈仲子（《荀子·非十二子篇》以陈仲、史鰌并举，盖亦自成一学派者），曰子莫（子莫不见他书，本书称其执杨墨之中，当是一大师），曰陈良（陈良不见他书，据本书知为南方一大儒）。其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辞而辟之，世人多疑为好辩，孟子自谓不得已也。孟子卒于周赧王中叶，年盖八十以上焉（万斯同引《孟氏世谱》谓孟子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虽他无确据，然孟子必甚老寿无疑。书中有齐楚伐宋语，事在赧王二十八年，则孟子之卒，或更在后也）。其书，《史记》作七篇，与今本正同。《汉书·艺文志》作十一篇，盖所传更有外书四篇云（赵岐《题辞》云，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书四篇，其文不能宏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汉孝文时与《论语》、《孝经》、《尔雅》同置博士，未几俱罢（见赵岐《题辞》）。而后汉程曾、郑玄、赵岐、高诱、刘熙皆为之章句。今岐书独传（程曾作《孟子章句》，见《后汉书·儒林传》。曾，章帝时人，盖注孟子之最先者。高诱《正孟子章句》，见诱所为《吕氏春秋》注序。郑玄刘熙注皆见《隋书》）。

孟子之教育主义

性善论

性，孔子盖罕言焉。故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记孔子言性者惟一章，则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仅言相近，于其善否不著辞焉（《易·彖传》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易·系辞传》云：“成性存之，道义之门。”皆孔子之言也，亦未尝言善否。《系辞传》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则以善与性对举，而性为后起）。盖谓道德在实践，不必多为玄远之谈也。而受其学者必欲进而研求道德之本质与其动机，此亦人类向上心所必至，而学者所当有事矣。于是子思作《中庸》，始以道之大原推本于天性，故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虽未显言性善，而善意寓焉矣。孟子之学，出于子思，其特标性善为进德关键，则

《中庸》之教也。

孟之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

此孟子一生论学大宗旨，特于此揭明之。其言必称尧舜者，孟子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又言“尧舜与人同耳”（《离娄》下），盖以尧舜为最高人格之标准。必称尧舜，正所以申性善之义也。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尽心》上）

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是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公孙丑》上）

所以谓之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公孙丑》上）

盖世上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咕啞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其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藁槨而掩之。掩之诚是也。（《滕文公》上）

读此可知孟子所谓善者，仁义礼智也。所谓性者，生而固有，非由外铄，所谓不虑而知之良知，不学而能之良能是也。乍见入井而怵惕，过视委壑而颡泚，此二节皆举常情之必然者以立证，非所以纳交云云，非为人泚云云，即非由外铄我固有之之注脚也，亦即不学而知不虑而能之注脚也。

《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

此引《诗》而证明人之善性，受之自天，即《中庸》“天命之谓性”之义也。故又云：“此天之所以典我者”（《告子》下）。前文言我固有而非由外铄，其言尚似局于我之一身，此更推原人性共同之所自出以完其说也。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中略）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

此极力发明人类有共通性。性既非吾一人所独而为全人类之所共，则人类所具之德，吾固当具之；人类所能之事，吾固当能之。人类中既产圣贤，则人类之本质能产圣贤甚明。吾既为人类之一，则吾亦能为圣贤甚明。此立言之本意也。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

此性善之圆满义，亦即《孟子》全书最精到之语也。昔佛初起于菩提树下，穆然四顾曰：“异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而又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此两语者，骤视若

不相容，不知佛性即我也。一切众生，皆从佛性中流出，还归于佛性，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也。惟其如是，故唯我独尊也，我即佛性，佛性即我之义。佛教经论中言之甚详，今不具引。至孟子“万物备我”之义，所谓“我”者，必非指此七尺之恒干甚明，此恒干至蹙陋至慙慙，何以能容万物，备我者亦备于我心而已。我心非他，即人类同然之心也，即天之所以与我之心也，亦即佛典所云众生心也。是故虽我也，而与物同体与天同体也。然则不云我备于万物，不云万物备于天，而必云“万物备于我”者何也？宇宙万有之现象，皆由我识想分别而得名，苟无我则天与万物且不成安立也。昔法人笛卡儿，以怀疑哲学闻，其言谓一切万有之存否皆不能无疑，惟必有我存，斯无可疑。何也，若疑我不存，则能疑之主体既先亡矣，万物则皆我心体中所函之象，而我之心体，则超乎此七尺恒干之上（此恒干亦万物之一也）。与万物为一体，与天为一体，因其为我意识所体认，则名之曰“我”，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也。我意识能体认真我，则万物立备矣，故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中庸》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何以故？以吾性即人性故，所谓心之所同然也。又曰：“能尽其性，则能尽物之性”。何以故？以人性外无物性故（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即此义）。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也，此实千圣真传同条共贯之第一义，孟子直揭以示人，群儒之所莫能及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告子》上）

今古论性，几成聚讼，综其要旨，可得五家。孟子言性善，其一也；荀子言性恶，其二也（《荀子·性恶篇》云：“人之性恶也，其善者伪也”。杨注云：“伪，人为也”）；告子言性无善无不善，其三也（公都子所举三说，其第二说，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实与第一说告子之指同。盖性既无善无不善，自然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也）；世子等言性有善有不善，其四也（世子名硕，周人，盖与孟子相先后，其说见《论衡·本性篇》。彼文又言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论性略与世子同也。又汉杨雄言性善恶混，即本世子说）；此文公都子所引或人言有性善有性不善，其五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与性有善有不善异。彼言凡人之性，皆含有善不善两质。此言某甲之性善某乙之性不善也。王充《论衡》所主张及唐韩愈之性有三品，皆此第五说也）。此五说者若甚相反，以吾观之，皆是也（惟后两说稍涉粗浅）。欲明此义，仍不得不旁证诸佛典。《大乘起信论》云：“摩诃衍者（译言大乘），有二种，一法、二义。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诃衍义。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诃衍体故。是心生灭因缘相，能示摩诃衍自体相用故。”又云：“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此义云何，以是二门不相离故”。以彼义相印证，则告子所谓无善无不善者，盖指此众生心，即所谓一心法也。此一心法超绝对待，不能加以善不善之名。孔子所谓性即指此，故只能概括其辞，曰性相近也。然依此一心法能开二种门，故可以为善可以

为不善也，孔子则言习相远也（《楞伽经》、《大乘起信论》皆极言熏习义）。孟子言性善者，指真如相，即一心法下所开之心真如门也。荀子所谓性恶者，指生灭因缘相，即一心法下所开之心生灭门也（小注：《起信论》又云：“以不违一法界故，心不相应，忽然念起，名为无明”。又云：“世间一切境界，皆以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此无明为生灭相所依。荀子所谓性恶指此）。两俱得谓之性者，以是二门各总摄一切法，是二门不相离故。不宁惟是，生灭门所显示之体相用，千状万态，故谓性有善有不善可也，谓有性善有性不善亦可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说，最粗浅不圆。信如所言，则此性不善之人与圣贤非同类矣。与孔子说相戾。此性不善之人必无佛性矣，与佛说相戾）。譬犹数人闭眸扣象，各道象形，谓所道象全体固不可；谓所道为非象体亦不可。各明一义，俱有所当，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若必欲品第其优劣，则告子所说，与孔子合，义最圆融（无善不善指性之体；可以为善不善，指性之用）。孟子指真如为性，所以劝向上，其义精。荀子指无明为性，所以警堕落，其义切。然而当有辨者，告子所云无善无不善，以释心体，诚甚当矣。然告子所下性字之定义，则曰：“生之谓性”；又曰：“食色，性也”。是其陈义已全落生灭门。既落生灭门，则有对待，而无善无不善之说不能成立矣。故为孟子所难而几无以自完也。然其言仁内义外，则固优于孟子。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善，以人性具此四端，故谓之性善。使孟子专言仁或专言仁智，则其说应颠扑不破（孔子专言仁，有时以仁智对举。其以仁义两者对举，又以仁义礼智四者并举，则自孟子也）。盖孟子所谓性，指真如相。真如浑然，物我同体，仁之德具焉；真如有本觉，智之德具焉。此二者诚无始以来即固有之，谓为天下之所以与我者可也。若义与礼，则是生灭因缘相中分别比较所立之名。若以之与仁智并列，而谓皆与有生俱来，则其说决不能自圆。孟子屡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其所举显证，惟恻隐一端耳。以下三端，皆未举证，恐欲举亦正不易也。以吾论之，恻隐之心，为人所固有，此无待言。次则是非之心亦然，一事物当前，吾人对之自有一番审量判断，或以为为是，或以为非，此尽人所同也。然其所是非者为合于礼义抑不合于礼义，则甚难言。此非独因吾人之智识有高下也，盖礼义之本质，先自不定，常随时随地而有异同。例如妇人夫死改醮，在泰西为常事，中国则谓之不义矣。男子置妾，在中国为常事，泰西则谓之不义矣。东方之复仇，西方之决斗，在古代皆谓之义，今若有之，则触刑纲矣。此义之无定也。例如裼裘之衣，古为大礼盛服（今泰西犹然）。今若袒胸而赴宴会，必共诧为非礼矣。西人相见，抱腰接吻，行于广众中，我国有此，必大诧为非礼矣。野蛮部落之祭礼，有例须以其长子为牺牲者，自文明人观之，其残忍殆不可思议；然彼固以为不如此则非礼矣。此礼之无定也。夫其本质先自无定，乌从于人性中求之，且既指各人分形受气者以为性，则已是生灭门中之事，其不能有善而无恶，甚章章矣。此所以不免为后人所议也（司马温公《性辨》云：“孟子以为仁义礼智皆出乎性，不知暴厉贪惑，亦出乎性也”。王荆公《原性》云：“孟子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谓人性无不仁，如其说也，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人之性无不善，而人果无之乎？”此皆驳孟说之最

有力者)。荀子性恶说，自宋以后，大为世儒诟病，其“其善者伪”一语，尤所集矢。实则“伪”字以“人为”为本训，谓进善须用人力耳，即玉不琢不成器之义，曷尝悖理？众生心中之无明生灭相，本自无始以来即有之，指之为性，未尝不可。况绎孟荀告诸子论性之言，皆就各人赋形受气后立论，则性恶之说，毋宁较近真。孟子固言“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矣”（《滕文公》上），非谓其中有恶耶？惟荀子特标性恶为义，则一似性中绝无善质，此其偏而不圆，乃更甚于孟子。荀子言善由人为，苟本恶则何以加以人力即能为善耶？要之若言性之体，则无善无恶；略言性之相，则有善有恶；若为性之用，则可以以为善可以为恶。此孔佛一致之说，孟荀则各明一义，不必相非也。宋儒必欲扬孟抑荀，而说有所不得圆，则谓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义理之性纯善，气质之性善恶杂，其本旨虽在申孟，然终不能屈荀，且已全降服于告子之说矣。其实则全采佛典教义，特避其名耳。

中国名学不发达，最为学术进步之障。如孟子所谓性，荀子所谓性，告子所谓性，乃至宋儒所谓性，其实并非同物（或虽同物而其外延内苞之量不同）。若能各赋以一名，各人于其所研究之对象，下一定义而立一范围，则争辩或遂息，或所辩更深入而精到。今同用性之一名，而所指不同，故虽辩而未由折衷也。又如孟子既言性、又言情（“乃若其情则可以善矣”；又，“是岂人之情也哉”），又言才（“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又，“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又言心（“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又，“此之谓失其本心”），又言命（“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又言气（“平旦之气”、“浩然之气”）。所谓情才心命气等，其与性是一是二，界说殊不明瞭，皆由不讲名学，故壁垒不精严。中国一切学术，皆受此病，所以远惭印度，而近不竞于泰西也。

孟荀言性，皆所以树教育主义之根抵。孟言性善，故其教法在发挥本能；荀言性恶，故其教法在变化气质。二者各有所长，而孟子尤能先立乎其大矣。

孟子发挥本能之教。其次序亦有可寻者，第一立志，第二据存，第三长养，第四扩充也。

孟子既昌言性善，然世间恶人甚多，确为不可掩之事实，故学者疑焉。孟子则以为此恶者非性也，乃习也。《牛山》一章（《告子》上）最畅斯旨：濯濯未尝有才，非山之性，斧斤牛羊使然耳。违禽兽不远，非人之性，旦书括亡使然耳。斧斤牛羊，旦书括亡，皆后起者，外铄者，其非性明甚。然伐之旦旦，括之反复，则所以习之者深矣，习深则几成第二之性，不察者即指此为性焉。然观雨露所润，非无萌叶，平旦夜气，好恶近人，则虽习于恶，而本性之善，终未尝息。孟子盖谓惟此为性，其习焉而几成第二性者，实非性也（荀子言性恶，则以为善者非性也，乃习也。故其言曰：“化师法积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者为小人。”（《性恶篇》）曰“纵”曰“安”，是率其本性也；曰“化”曰“积”，则习而成第二之性也）。

环境影响于人生者至大。牛山何以濯濯，以其郊于大国，受环境之害也。孟子又曰：“富岁子弟多赖（阮氏元云，赖犹懒也），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此就时间之环境言也。空间之环境则亦然，热带及腴壤之民多赖（《史记·货殖传》云，楚越之地，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蚩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今世热带之国民，无一能富强者），寒带及瘠土之民多暴（生计太蹙，非为暴烈之竞争，则不能自存，故寒带及确薄之山谷，常有食人族；丧乱之世，围城之中，往往易子而食，折骸而爨，亦同此理），皆环境之影响使然也。孟子举此证，意谓前后本此一人，何以遇富岁则懒，遇凶岁则暴，以明懒暴生于环境，于本性无与也。然吾以为以此为性善之证，不如以此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之证也。因环境而生习，因习复造环境，富岁凶岁，本一时偶起之现象，然既因富岁而产多懒之子弟，懒既成习，则岁不富而亦懒矣。既因凶岁而产多暴之子弟，暴已成习，则岁不凶而亦暴矣。懒者既多，则不懒者亦习而懒；暴者既多，则不暴者亦习而暴。于是懒暴由个人而及于社会，如病之有传染也。懒者之子孙恒懒，暴者之子孙恒暴，于是懒暴由今日而及于将来，如病之有遗传也。夫天下无完全之环境，甲种环境，能生甲种恶习；反之乙种环境复生乙种恶习。人人各有其恶习，恶习既成，则其与性相去几何，故荀子迳指为性恶也。

性虽善而可以习于不善，如何而始能免于不善？曰惟修养。性虽恶而可以习于善，如何而能进于善？曰惟修养。故孟荀言性虽相反，而其归本于修养一也。《易传》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之谓也。

孟荀之注重修养也同，其修养下手之方法则不同也。以比佛法，荀子则小乘法也，渐教也；孟子则大乘法也，顿教也。《孟子》全书教人修养者千言万语，可以两言蔽之，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告子》上）故真能率孟子之教者，大彻大悟，一了百了。本无次第之可言，惟如何然后能立乎其大，则孟子提掇三义焉：曰立志，曰存养，曰扩充。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尽心》上）尚志者，谓高尚其志也。人类之能进步，以其有向上心，不以现状自满足，而常求加进，此其所以异于禽兽也。志一立则肌肤筋骸皆挺举，而神明发皇。而不然者，则奄奄若陈死人，更复者何事，直一齐放倒耳。故孟子首以此教学者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告子》上）彀之为用有二：一曰求中程，二曰求到达。学者立志亦然，当悬一鹄以为衡，而求其必至。然则其鹄维何，孟子之教，则志为圣人而已。其言曰：“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又曰：“尧舜与人同耳”（《离娄》下）；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又引成颢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引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引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滕文公》上）；又曰：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离娄》下）人莫患乎甘伍于流俗，以多自证，以同自慰，如是必逐渐堕落，日沈埋于卑浊凡下而不能自拔。纵稍有寸获，亦必沾沾自喜，骄溢而不能复进矣，所谓器小易盈也。孟子教学者刻刻以尧舜文王自比较，更无丝毫躲闪之余地，亦永无踌躇满足之一日，此师子频呻龙象蹴踏气象也。

立志之法，莫妙于悬一所崇拜之古人以为模范。如该撒常自比亚历山大，拿破仑常自比该撒，杨雄常自比司马相如，苏轼常自比白居易。皆刻意模范，而所成就亦略相等，或且过之。事功文章之末且有然，况于学道乎。孟子所自悬以为教者，则孔子也。故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又曰：“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尽心》下）此孟子自言其志也。

语以向上，则谦让未遑，此之谓志行薄弱，而堕落之徵兆也。孟子诃之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离娄》上）又曰：“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公孙丑》上）又曰：“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梁惠王》上）皆大声疾呼，唤起吾人之自觉心，使自知吾身力量之伟大，未有志焉而不能至者，要在学者毅然发心直下承当而已。

“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尽心》下）此孟子教人以模范古人之法。“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尽心》上）此孟子教人以不依傍古人之法，要之皆立志之照也。

荀子之教尊他力，故言假物（《勤学篇》云：“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重得师（《修身篇》云：“莫要得师”。又云：“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又云：“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舍乱妄无为也”）。此与其性恶之旨相一贯。盖性既恶，则非藉他力不能以矫正也。孟子言性善，故尊自力，其言曰：“万物皆备于我”（《尽心》下）；曰：“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离娄》上）。孟子常教人学圣人，然又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是自师吾心，即所以师圣人也。故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馀师。”（《告子》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源。”（《离娄》下）自得者，纯恃自力之谓，圣贤师友，能示我以为学之法，不能代我为学。能引我志于道，不能代我入道。故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尽心》下）又曰：“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尽心》上）此孟子教育之方法也。泰西旧教育主义近荀子，其新教育主义近孟子。

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子思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中庸》）此皆自力之教也。佛法亦言自修自证。而不然者，虽有多闻，犹闻说食，已不能饱也。学问者，父子兄弟不能以相代者也。人格者，父子兄弟不能以相易者也。

持自力之教者，必以凡人皆有自由意志为前提。有自由意志，然后善恶惟我自择，然后善恶之责任始有所归也（持定命之说者，则必谓人类无自由意志，然后可。盖一切皆有立乎人类之上者以宰制之，人类不过如一机器，受宰制者之指挥而动，不复能自由也。持极端性恶之论，其结果亦必至使人不能负善恶之责任，盖吾性既本恶，则为恶乃生理上心理上当然之事，谓之有罪，毋乃冤乎）。故孟子于人之不以自力求向上者，谓之曰自暴，曰自弃，曰自贼（俱见前）。又曰：“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又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离娄》上）又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公孙丑》上）盖谓本可以自由为善，而甘于为不善，故责任无可遁也，其发明自我本位之义，至深切矣。

曰立志，曰自力，皆导人以向学而已。学之所当有事者究何如，孟子教人以第一义，则曰“存养”，所谓存其心养其性是也（《尽心》上）。盖性本善，能常存其善性使勿失，常养其善性使日长，斯人格具矣。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即人格其物也（《孟子》书中言禽兽凡五：本文，其一也；“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其二也；“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离娄》下）其三也；“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告子》上）其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其五也）。孟子于《牛山》之章更详说之曰：“人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善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告子》上）此其义最精微亦最简易。言其精微，则平旦夜气，通于神明，学者可以此为修养之根焉；言其简易，则学者试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为何为何，就此体认之而保存之，斯已足矣。孟子之教，则凡以唤起人类之自觉心而已（董仲舒言“人当自知贵于万物”，亦即此义）。

人类之生，合神明躯干两部分而成。躯干者，人与禽兽所同有也。饥而思食，劳而思息，寒暑趋避，牝牡交感，凡生理冲动之作用，人无一焉能异于禽兽者也。乃至群处而嬉乐，失侣而惨愁，触逆而伉怒，遇害而殉惧，凡心理感受之作用，人亦无以大异于禽兽者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惟此神明，能审量焉、别择焉，能比推焉、扩充焉，此禽兽所决不能也。然神明寓于躯干之中，常受躯干之牵缚，牵缚深而神明之作用殆息。此作用息，则几与禽兽无择矣，何也，禽兽惟有生理之冲动与心理之受感，全不能以自身意志为选择发动，如曰，吾当如是，吾当不如是；吾欲如是，吾欲不如是；吾必如是，吾必不如是。此皆非禽兽所能也，而人能之，故异于禽兽也。质言之，则人类有

自由意志，而禽兽无之也。今为躯干所束缚而失其意志之自由，为其所不当为，欲其所不当欲（《尽心》上云：“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神明不复自主，而成为躯干之奴隶（孟子“桎亡”二字极精，谓受桎梏而亡也），则试问与禽兽果复何择者？故孟子曰：“人见其禽兽也”；又曰：“于禽兽又何难焉”。盖此人格一丧，则非惟近于禽兽，直是禽兽耳。此孟子一针见血之言也。

然此神明者，虽为躯干所牵缚，而究未尝泯灭也。故孟子字之曰“失”（“此之谓失其本心”；又，“舍则失之”），曰“丧”（“贤者能勿丧耳”），曰“放”（“其所以放其良心者”；又，“有放心而不知求”），曰“亡”（“有桎亡之矣”），皆一时迷失之谓。曰“害”（“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又，“以直养而无害”），曰“桎”（“有桎已之矣”，“桎之反复”），曰“陷溺”（“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皆一时失其自由之谓。此如一家主人，或外出，或以故不能治事，则奴隶猖披焉，然主人资格自在，一旦赫然复守其舍，则躯干遂不得不戢戢听命矣。故孟子惟标举一“存”字：“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君子存之”；“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亦以其存心而已”（《离娄》下）。

《孟子》全书言“存”者如下：“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君子存之”（《离娄》下）；“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桎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告子》上）；“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无知其乡。”其心之谓与”（《告子》上）；“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离娄》下）；“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告子》上）；“不失也，勿丧也，即存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告子》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者也；求在我者也”（《尽心》上）。求也者，取已失已丧已放已亡者而复之也。

“能存则自得之矣，自得之则资之深，居之安”（《离娄》下）。“能存则有诸己矣，有诸己之谓信”（《尽心》下）。千言万语，归于自觉而已。宋儒者使人日在其侧而问者，曰：主人翁常惺惺否？所以自觉也。明儒有问求放心者，答以汝心现在，亦促其自觉也。禅宗一棒一喝，皆使之反诸己而自觉也。此等法门，滥用之则流于玩弄光景，善用之则入道之坦途也。

孟子以“存”“养”并举（《尽心》上）。盖存与养相属，不养则不能久存也。人一日不两食则饥饿，岂惟口腹有饥饿，智识亦有饥饿，道德亦有饥饿。一日废学问，而智识之饥饿立见矣；一日废修养，而道德之饥饿立见矣。孟子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又曰：“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尽心》上）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身指我之全体，非专指躯干也），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告子》上）夫养者，自养也，人亦孰不知自养。然要当视其所养者为何。孟子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中略）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中

略)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告子》上)所提小体大体之义至切明矣,以一指比肩背,则一指小而肩背大;以躯干比神明,则躯干小而神明大。夫躯干与神明,宜并养者也,然两者时有冲突焉。孟子并非责人以勿养小体,而谓必以不养小失大为范围,故曰:“以直养而无害”(《公孙丑》上)。无害云者,即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也,遇神明与躯干利害相冲突时,必毋或徇躯干之欲而堕其神明,君子与庶民之异在此也,人与禽兽之异即亦在此也。

所谓神明与躯干利害之冲突何如?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告子》上)所谓二者不得兼,即神明与躯干利害相冲突之时也,其冲突之甚,乃至神明与躯干不能并存,此等境遇,本非人世间所常有,吾侪或终身不一遇焉,万一遇之,则势必须舍其一乃能取其—,孰取孰舍,即人禽所攸分也。禽兽所欲无更甚于生,所恶无更甚于死。人决不然,然舍彼而取此则为人,舍此而取彼,遂禽兽矣。孰舍孰取,视平日所养何如耳,此养大体养小体之义也。

神明与躯干不能并存,非事所恒有也。神明与躯干之苦乐,因冲突而互为消长,此则吾侪日日遇之,刻刻遇之,常人徇其躯干之乐而不恤其神明之苦者比比然也,《鱼我所欲》章下半(《告子》上),专明此义。行路乞人,宁死不屑受呼蹴之食,此证明性善之旨,以见小体大体之辨本非甚难也。万钟受否,无关生死,取舍权衡,宜若甚易,而反不果者,乃在区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已,此以见躯干易为神明之累,以小害大,以贱害贵,盈天下之人,其日日所蹈者率皆如是,而不自知其已违禽兽不远也。孟子一则曰“于我何加焉”,再则曰“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一喝,足使人三日耳聩矣。

大体小体之孰贵孰贱,本非难知,然人曷为皆贵其所贱而贱其所贵,学者当由何术以矫正之?孟子乃于公都子之问答畅明其义焉。“公都子问曰:‘钩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钩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此章特标物与我之辨,最足发人深省。“物交物云”云,上“物”字指耳目所接之物,佛说自六尘以至山河大地,常人所共指为物者此也;下“物”字即指耳目及躯干之全部,佛说自六根以至六识,常人则不指此为物而指为我,不知此确为物而非我也。就其至浅者言之,如人之发齿爪甲,当其丽于我身,共指为我也(杨朱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谓一毛为我之体也)。及其脱落,则么么一物而已,此躯干之全部,与发齿爪甲何异。今世生理学大明,稍涉其樊者,共知吾全身筋骨血肉,皆历若干时一蜕变,全非其故矣。然而犹执此为我而终不悟也,既认此物为我,则罄吾之智能以养之。凡人终日所营营者,舍养此耳目口体外更有何事,因养此耳目口体于是

乎有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寝假而宫室妻妾，且成为我之一部，如是认贼作子，展转相引以至无穷。孟子喝破之曰“是物交物而已”；曰“是于我何加焉”。明乎此义，然后知我前此所为营营轔轔者，皆为物役。自今以往，我当恢复我之自主权。我将对于一切物而宣告独立，不复为之奴隶。我但一作此念，而一切物已戢戢听命，无复能披猖矣。故曰：“思则得之也”；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孟子之霹雳手段也。

饱乎仁义，令闻广誉施于身，先立乎其大者也。不愿膏粱，不愿文绣，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告子》上《欲贵者》章）。在彼者皆我所不为，在我者皆古之道，先立乎其大者也。说大人则藐之，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尽心》下《说大人》章）。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先立乎其大者也。故不为苟得，故患有所不避，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告子》上《鱼我所欲》章）。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先立乎其大者也。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尽心》上《谓宋句践》章）。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道之大道，先立乎其大者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滕文公》下《景春曰》章）。仁义礼智根于心，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先立乎其大者也。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尽心》上《广土众民》章）。伊尹以斯道觉斯民，自任以天下之重，先立乎其大者也。禄之以天下弗顾，系马千驷弗视，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万章》上《伊尹以制烹要汤》章）。柳下惠进不隐贤必以其道，先立乎其大者也。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万章》下《伯夷目不视恶色》章）。孔子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先立乎其大者也。可以仕而仕，可以止而止，可以久而久，可以速而速，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孟子善养浩然之气，先立乎其大者也。四十不动心，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同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尽心》上）。独立泰华之巅，岂屑与培塿竞高，扬帆渤海之表，宁复与潢污较广，人虽饕餮，未有与小儿争饼者也。家拥金穴，则必不至为一钱而行劫矣。此宁待勉强，小大之量相悬，熟视且无睹也，睹且无焉，夺更何有？

“不能三年之丧，而缙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尽心》上）。此言不立乎其大，则虽兢兢于小，无益也。“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尽心》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尽心》上）此言大不立则小者终不足持也。“原泉混混，不舍书夜，盈科而复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耳。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离娄》下）“本者何，立乎其大也。苟为无本，则小者能夺也。宁死不受呼蹴之食，为宫室妻妾所识穷乏而受万钟”（《告子》上《鱼我所欲》章），无本故也。

大既立则小不能夺，固也。然必无以小害大，夫然后大乃俄立，故孟子又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盖多欲之结果，非至以小害大养小失大焉不止也。故佛教归结于觉悟，而谨始于戒律也。然何以能寡欲，仍在务立其大。盖所欲有大者远者，则流俗人之所欲，

已不复觉其可欲矣。荀子专主以礼乐节制人耳目口体之欲，其法甚秘密。由孟子观之，终不免头痛灸头脚痛灸脚也。

孟子言寡欲不言无欲。无欲者出世间法也，寡欲者世间法也。孟子言世间法不言出世间法也，故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尽心》上）。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此自道德力处也。公孙丑问何谓“浩然之气”？答曰：“难言”，其体难言也。佛说真如体离言说相离文字相也。又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此言其相也。又曰：“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此言其用也。又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曰：“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长也”，此言养之之法也（《公孙丑》上《不动心》章）。此章在全书中号称难读，吾欲以《易·彖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义释之：浩气者，人性中阳刚发扬之法也。人类之所以能向上，恒恃此，缺焉则馁，馁则无复自信力，而堕落随之矣。此气本人性所同具，曷为或强或弱，或有或无，则以有害之者，害之奈何，为其所不为，欲其所不欲，日受良心之责备，则虽欲不馁焉不得也。气之为物，易衰而易竭者也，馁而再振，其难倍蓰焉。养之之法，惟在自强，自强则能制伏小体，不为物引（《老子》曰“自胜之为强”）。而不慊于心之行可免矣。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尽心》上）。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公孙丑》上《不动心》章）。信如是则何不慊之有，何馁之有。集义者，常以道义自律，所以增长其自强力也。而其所以能直养者尤在不息，必有事焉而勿忘，不息之义也。非常常提掣抖擞，则神明必有时而衰惰。衰惰则不强而馁矣（此自觉与自强之关系也）。然则曷为戒助长，其进锐者其退速（《尽心》上）。助长之结果，必至息也。

不动心之一境界，学者所以自卫也，然若事谈何容易。无所养于平日，则临境必失其自由，即强制于一时，然历久仍丧其所守。孟子养气，全是从本原处下工夫，以与前北宫黝、孟施舍、告子等所用之方法比较，彼等皆随事为临时抵抗者也。孟子则无事时不断致力而临事之抵抗反无所用也。譬诸摄生治病，北宫黝、孟施舍以峻剂攻治，告子食不出户以防外邪之袭，孟子则中气充盈，病自不能侵也。所谓大立而小不能夺，其本领全在是。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告子》上）。如何而能熟？惟勿忘能之，惟不息能之。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此教人贞固有恒之法。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此教人精力集中之法（《告子》上）。精力集中，孔子所谓敬事也，必如此然后神明之作用乃生，无论为求学为治事，皆事半功倍，然要非贞之以恒焉不可耳。

深造自得，以至于左右逢源（《离娄》下）。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此学问兴味之说也。人能以学问为一种嗜欲，为一种兴味，则日进而不自知矣。故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又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乃知宋贤之教，犹不免以学问为桎梏，非善教者也。

孟子之言存养，大略如是。存养者求自得而勿失也。然非此而已足也，其大作用则在扩充。孟子以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端也者，始基云尔，非谓即此已具其全体也，故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此言四端力量之伟大也。其下即继之曰：“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此言仅有四端之不可恃也（《公孙丑》上《不忍人之心》章）。此就个人修养方面立论。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同上）又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梁惠王》上《齐桓晋文》章）。此就政治方面立论，两者义同一贯，实孟子立教之眼目也。

孟子言良知良能，而其用在达于天下（《尽心》上《良能》章）。“达”之义云何？孟子释之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虽穷凶极恶之人，忍于族党，忍于朋友，忍于兄弟，而于父母妻子，终必有所不忍。能举其所不忍者而达之于其所忍之兄弟朋友族党焉，则仁矣。常人不忍于家之索而忍于天下之溺，能举其所不忍者而达于其所忍焉，则益仁矣。持世法者不忍于杀人而忍于肉食，若更举其所不忍者而达于其所忍焉，则益仁矣。以所不为达于所为，义亦同此。故曰：“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同上）此扩充之说也。

以扩充为教，此因势而利导之，善之善者也。吾名之曰发挥本能之教，亦曰尽性之教。所谓“充类至义之尽”是也（《万章》下《交际》章）。个人当孩提时，智识材力道德能有几，何以阅数十年遂能变为圣贤豪杰？社会当草昧时，文物制度能有几，何以阅数千年，乃遂光华灿烂与日月齐耀也？无他，扩而充之而已。故自修养者务发挥自己之本能，教人者务发挥人之本能，为国民教育者务发挥国民之本能，如斯而已矣。

孟子之教人也，其于门弟子之问答，引申触类，引而弥长，无待论矣。其对于未闻道者，如许行之徒陈相，因其知百工之事不可耕且为，遂进之使明并耕之非（《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章）。墨者夷之，因彼葬其亲厚，遂进之以生物一本之义（《滕文公》上《墨者夷之》章）。以曹交之纨绔，因其知徐行后长者，则曰是即可以为尧舜矣（《告子》下《曹交》章）。以齐宣王之骄侈，因其不忍一牛之觳觫，则曰是即可以保民而王矣（《梁惠王》上《齐桓晋文》章）。乃至因鸿雁麋鹿而导之以与民皆乐（《梁惠王》上《立于治上》章），因钟鼓羽旄而导之以与百姓同乐（《梁惠王》下《庄暴》章）。好色则曰与百姓同之，好货则曰与百姓同之（《梁惠王》下《明堂》章）。好勇则曰王请大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梁惠王》下《交邻国》章）。无他，扩充而已矣。

山径蹊间，介然成路，扩充也（《尽心》下《谓高子》章）。原泉混混，不舍昼夜，扩充也（《离娄》下《水哉水哉》章）。掘井九仞，而务及泉，扩充也（《尽心》上《有为者》章）。城门之轨，非两马之力，扩充也（《尽心》下《禹之声》章）。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扩充也（《尽心》上《登东山》章）。养气由于集义，扩充也（《公孙丑》上《不动心》

章)。知天由于尽心，扩充也（《尽心》上《尽心》章）。反约由于博学详说，扩充也（《离娄》下《博学》章）。大任由于增益不能，扩充也（《告子》下《舜发畎亩》章）。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扩充也（《万章》下《一乡善士》章）。扩充之时义大矣哉。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可欲者，悦心之义理也；有诸己者，深造而自得之也；充实者，扩而充之也。能扩充而学问之能事毕矣。更进焉，则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也不可知之之谓神，皆重扩充以扩充而已（《尽心》下《浩生不害》章）。

乡愿自以为是而不可以入道，曰惟不扩充故（《尽心》下《孔子在陈》章）。旦昼梏亡则夜气不足以存，曰惟不扩充故（《告子》上《牛山》章）。不扩充则必并其所固有者而失之，所谓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也。仁者以其所受及其所爱，扩充也。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扩充之反也（《尽心》下《梁惠王》章）。扩充之反，则与禽兽无择矣。孟子曰，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尽心》上）。又曰，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尽心》上）。

立志、存养、扩充三者，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也。然因各人气质不齐，故入道之途亦异。而孟子所最奖励者，则狂也，狷也。孟子于全书之卒章，述道统之渊源，而其前一章论狂狷与乡原之异，盖谓能任道者必狂狷其人也。孟子何取乎狂狷？孟子述孔子之言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后释之曰，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其释狂之义，则曰，其志嚬嚬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也。其释狷义，则曰不屑不洁。其与狂狷最相反者曰乡原。孟子述孔子言曰，过我门而不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孟子进而释乡原之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又述乡原诋狂者之言曰，何以是嚬嚬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其诋狷者之言曰，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孟子总评乡原之性质，曰阉然媚于世，而断之曰德之贼（《尽心》下《孔子在陈》章）。读此而狂狷之价值可识矣。必狂然后能向上，进取也，古之人古之人也，皆所以向上也。必狷然后能自卫，不屑不洁也，有所不为也，皆所以自卫也。狂狷各得中行之一体（中道，《论语》作中行），合之即成中行。不狂不狷而欲自托于中行，则为乡愿而已。凡《孟子》书中教人以发扬志气坚信自力者，皆狂者之言也；凡《孟子》书中教人以砥厉廉隅峻守名节者，皆狷者之言也。故学孟子之学，从狂狷入焉可耳。

孟子于孔子之外，最尊伯夷、伊尹。孔子中行也，伯夷近于狷者也，伊尹近于狂者也。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公孙丑》上《伯夷》章、《万章》下

《伯夷》章），是不屑不洁之极则也，是矜然有所不为也，是踽踽凉凉也。然治则进，乱则退，其进取之气则不盛焉，故曰狷之流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思天下之民有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者，若已推而纳诸沟中。进取之极则也。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吾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犹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既而幡然改曰：“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所谓其志嚶嚶然则曰古之人古之人也。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其嚶嚶之气象如见也，然而五就汤五就桀，其于不屑不洁，盖不立严格焉（《万章》上《伊尹割烹》章，下《伯夷》章）。故曰狂之流也，由狂入圣，可以为圣之任；由狷入圣，可以为圣之清。孟子之尊伯夷、伊尹，即孟子之奖狂狷也。

狂者进取，由狂入圣，圣之任。孟子最进取者也，孟子最能任者也，故孟子亦狂者也。前所述立志诸条，其语气皆所谓嚶嚶然古之人古之人也，管仲、晏子，则以为“不足为”（《公孙丑》上《当路于齐》章），游、夏、颜、闵，则曰“姑舍是”，伯夷、伊尹，则曰“不同道”，而必以愿学孔子自程（《公孙丑》上《加齐卿相》章）。正人心息邪说，则曰“以承三圣”（《滕文公》下《好辨》章）；三宿出昼，则曰“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公孙丑》下《尹士》章）；论兴王名世，则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公孙丑》下《充虞》章）。皆一种嚶嚶进取气象也。

狂者之弊，在自信力太过，故往往夷考其行，而不掩焉，所以非中道也。然人若无自信力，则无复进取，而世运之进化，或几乎息矣，虽太过犹愈于已，故孔子思之。

狷者不屑不洁，由狷入圣，圣之清。孟子最不屑不洁者也，孟子最能清者也，故孟子亦狷者也，故不肯枉尺而直寻也（《滕文公》下《陈代》章），不肯以道而殉人也（《尽心》上《天下有道》章），不肯辱己以正天下，而曰“归洁其身”也（《万章》上《伊尹割烹》章）。以顺为正，则斥之曰“妾妇之道”（《滕文公》下《景春》章）；自翳以成，则断之曰“乡党”，自好者不为（《万章》上《百里奚》章）；求富贵利达，则比之“墦间乞食”（《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大人巍巍，则藐之为“我所不为”（《尽心》下《说大人》章）；色厉内荏，以言诌人，则拟诸“穿窬之盗”（《尽心》下《人皆有所不忍》章）；不由其道而仕，则等诸“钻穴隙之道”（《滕文公》下《周霄》章）。凡此皆不屑不洁也。皆有所不为也。故其结果每至于踽踽凉凉也，此狷者气象也。

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尽心》上），又曰：“人有不为也，然后可以有为。”（《离娄》下）人而无所不为，则凶人也，恶人也，与禽兽无择也。然则欲全人格以异于禽兽，其必自有所不为始矣。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则坊坎。”（《礼记·坊记》）宋儒曰：“名节者，道之藩篱。”（偶忘何人语）坊也，藩篱也，皆所以自卫也。故《孟子》一书，言砥厉名节者最多（《公孙丑》上《孟子将朝王》章、《致为臣而归》章、《滕文公》下《陈代》章、《景春》章、《周霄》章、《不见诸侯何义》章、《离娄》上《男女授受》章、《孟子谓乐正子》章、《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万章》

上《伊尹割烹》章、《孔子于卫》章、《百里奚》章、《万章》下《敢问不见诸侯何义》章、《告子》上《鱼我所欲》章、《有天爵者》章、《欲贵者》章、《尽心》上《人不可以无耻》章、《耻之于人大矣》章、《古之贤王》章、《谓宋句践》章、《以道殉身》章、《尽心》下《人皆有所不忍》章、《说大人》章），皆以严格自律，无一毫可以宽假，狷之至也。

人不可以不进取，而进取必须以有所不为为界，孟子是也。孟子苟非进取，则何必仆仆于梁齐滕宋之郊，日与时主俗士为缘。孟子盖热血磅礴人也，诵《去齐》诸章（《公孙丑》下《尹士》章、《充虞》章），所言而可知也。然而终不肯小有所枉以求合焉，所谓无为其所不为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所决不许也。《易·文言传》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孟子有焉。

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可谓其志嚆嚆矣。然而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道也，一介不取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见前）。其不屑不洁为如何也。孟子言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见前），又言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滕文公》下《彭更》章），故孟子一伊尹也。

柳下惠之和，孟子屡道之。然又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尽心》上）。然则柳下惠亦狷者也，不然，则由由然与之偕，援而止之而止（《公孙丑》上《伯夷》章），柳何以异于乡愿乎！

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万章》下《伯夷》章、《尽心》下《圣人百世之师》章）。此语孟子再三反复道之。盖天下风气之坏，则顽儒鄙薄四者尽之矣。惟廉立宽敦可以救之，故曰圣人百世之师也。

乡愿何以谓之贼？以其阉然媚于世而已，以其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而已。或疑孔孟此言为过，则胡广冯道果何人者？故《中庸》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学者若不从狂狷两路立脚，则虽学问日多，阅历日深，其结果必至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然却已陷于贼而不自知也。

其在学派，则狂者偏于理想，狷者偏于实践。其在政派，则狂者偏于改进，狷者偏于保守。二者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焉，缺一不可也。狂然后有元气，狷然后有正气。无元气则不能发扬，无正气则不能强立。

孟子教人修养之途径，大略具是矣。读此则知后儒专提主敬主静等法门者，或专以穷理格物为事者，或专务礼容节文之末者，皆不免偏至。孟子惟先立乎其大者，不骛枝叶。孟子言必有事焉，不贪寂静也。

孟子极言教育为人生之一种责任。其言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使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离娄》下）又两引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万章》上《伊尹割烹》章、《万章》下《伯夷》章）。教育之要旨，曰养曰觉。养属道德方面，觉属知识方面（觉

者觉也，学也，学也者效也）。先辈有养人觉人之义务。社会文明所以能联属不断，缉熙光明者，全恃此也。故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尽心》上）。

“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取诸人以为美，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公孙丑》上《子路》章）与人为善，教育者之事也；取人为善，受教育者之事也。常能取人为善，则受教育岂有止境，而亦何常师之有。故曰：“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得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告子》下《乐正子》章）此自力教育之妙用也。

取人为善，莫如尚友。故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盖人类之能进化，全由其富于相熏习性。故一人所发明之新道德新智识，不转瞬而可以成为公众所共有。然能否均沾此共有物，则在乎人之自取自爱而已。其能受之量弥大，则其所受之量亦弥大。故以友自广，自一乡一国而远及于天下古人也。

《孟子》一书，言智识教育，较为简略。盖书中推论事理，广涉各方面，是即所以增长人智识，不必显以智育为揭橥者也。然孟子教学者，并不以积蓄智识为入道之法门，此则诚其宗旨之一端。孟子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离娄》下）。如何始能行所无事而得智，孟子未尝明言，至其恶穿凿，则固为骛智识者一良药耳。何也，穿凿者必横一成见以附会之，实智识之障也。

孟子又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此孟子教人以求智识之方法。盖所用者为纯粹演绎法，谓当据一原理原则以推诸各事物，故曰：“则故而已矣”（同上）。然若何乃能求得其故？吾所认为故者是否正确，如何而始能得正确？此当求诸归纳法。而孟子未言之，盖归纳研究法之不发达，实我国古今学者通病，匪独孟子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智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尽心》上）此言智慧纯从阅历磨练得来。此又孟子智育之一大法门也。

《舜发畎亩》一章，最能发扬人之志气，此大医王之海潮音也。其言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饥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然后发。徵于色，发于声，然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呜乎！普天下之人，处困境遭患难坎坷不得志颠沛无所告诉者，与夫忧国忧天下悲观绝望者，读此其可以尽人而兴矣。将受大任者，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其身，则既甚矣，犹以为未足，加之以行拂乱其所为。拂乱所为云者，凡行为之结果，无一焉不与所希望相反。人生到此，真乃心摧气尽，盖神明之苦痛，无量无极矣。殊不知非至于此极，则曷由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多一分之坎坷颠沛，

则动忍增益加一分之量。坎坷颠沛至乎其极，则动忍增益至乎其极者也。故孟子复申言之曰，能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然后发。凡以证明前此所云云，并非聊相慰藉之言。盖大人物之成就，其第一要素在意志坚强；其第二要素在思虑周密。然此种境界，非此心经几许操练，决不能至也。困心衡虑，即操练此心之学校也。此种学校，可遇而不可求。人终身不能得入学之机会者，比比然矣，今而遇之，则是天之所以厚我者至矣，谓宜权喜感激，利用此极难得之境遇以自玉于成。信能如此，则虽缘执业之异趋与夫才器之异量，而成就有不同，要其必有所成则一也。而不然者，一遇挫折，则颓然自放，譬诸行路然，崎岖当前，望崖而返，前途虽有万里坦途，末由涉矣。此所谓志行薄弱，而暴殄天赐也。

非惟个人为然也，即国家亦有然。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滕文公》下《好辩》章）。吾响者尝疑此言为过，谓天下竟可有一治而永不乱之国。由今观之，宁有是耶！世运之进化，非为直线而常为螺旋形。当其在进化途中，波折固所不免。当此波折之时，能有一种新空气新力量，蜕变前此之腐气惰力而与之代兴，此国家所以能与天地长久也。岂惟国家，即人类社会之全体亦莫不然。全世界形势最混杂时代，全世界思想最浑沌最烦闷时代，是即新思想将发生新制度将建设之时代也。故曰生于忧患也。人亦于忧患中求生而已。而不然者，富岁子弟多赖，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个人之死于安乐也。“天之方蹙，无然泄泄”（《离娄》上《离娄》章）；“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离娄》上《不仁者》章），国家之死于安乐也。

《降大任》章，教人以处逆境之方法，至深切矣。此种关于人生一段落之遭际，惟自强其意力可以处之。至于一时一事偶然之拂逆，孟子教人处之之法，尤甚简便。其言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离娄》上）又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又曰：“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离娄》下）此实自平其心最妙之法，狠怒怨毒，人类相处之大害也。然此大抵皆触发于一时，刹那顷，当此一刹那顷而能节制之，则遂不发矣。孟子教人以自反，即将此一刹那顷按下也，故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

孟子所标举，有一义焉。若与其根本宗旨相冲突者，则言命是已。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又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俱《尽心》上）。又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尽心》下）。又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梁惠王》下）又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公孙丑》下）。书中言，类此者尚甚多。凡此皆未我身以外，尚有一物焉为最高之主宰，而我之境遇，恒受其支配。即此所谓宿命说也。中国古代宿命说有两派：其一，谓宿命由天帝所定。天帝者，一种之人格神，而其威权无上，非人所能抗，孟子所谓“天未欲平治天下”云云是也。商周间之宗教思想，纯属此

派，而儒家继承之。其二，谓宿命由自然之运所演成，其为物虽非必有意识，然人类之意识，迄不能胜之，孟子所谓“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云云是也。道家之哲学思想，纯属此派，而儒家亦兼采之。此两派思想，盖弥漫于我数千年之思想界，占莫大势力，其昌言与之反抗者，惟墨子一人而已。然墨子“非命”而复言“天志”，则已自相冲突也（参观《墨子·非命篇》、《天志篇》）。在欧洲哲学，则宿命说与自由意志说最不相容。盖既信有宿命，则所谓万物备我、所谓自力万能者，其说将皆不能成立。人若过信宿命，必且委心任运，处顺境将耽安不复进取；处逆境将颓丧而不能自振。如是则世运之进化，不几息耶。故就表面上观之，孟子学说中之此一点，实与其全体学说相矛盾。且不啻取其全体学说而毁弃之，此无容为讳者也。然进而求之，则并行不悖之理，又可得言焉。吾以为命也者，佛教业力之说也。佛教不言宿命而言宿业；业也者，非别有一人格神焉能造之，亦非自然之运能造之，实众生所自造也。然众生既造此业，则必受其报，业与报紧相连属，丝毫不容假借者也。若此者，名之曰因果律。因必有果，丝毫不容假借者也。于是乎人类之境遇，乃至其行为其意志，自有一部分不能不受业报之束缚。若此者，吾中国思想家，谓之曰命。业有自业，有共业。自业演为众生之个体，众生各自食其报。共业演为国土，演为宇宙（佛说通谓之器世间），全国土全宇宙之众生同食其报。吾国思想家，名前者为个人之运命，名后者为国家之运命（国运），世界之运命（世运）。此种运命，就目前观之，确为一种不可抗力，如人寿充其量不过百年，终必有死，欲以吾力逃之，所不能也。如世界恒一治而一乱，有光明之一面，随即有黑暗之一面，欲以吾力抹煞之，所不能也。不深探其本，则或以为有一人格神焉为之主持，或以为自然之运，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孟子曰命，其果曾深探其本与否，吾不敢言，然而其言曰：“夭寿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顺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故知命者，不立乎崖墙之下”（俱《尽心》上）。又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曰正命，曰立命，曰不谓命，则孟子非认命为绝对不可抗明矣。依佛教所说，业也者，自力所造也；自力所造，惟还以自力能转移之。过去之自业未尽，则吾一身含其业报，宜也。今宜如何？则更求所以造善良之自业而已，此世间法也，出世间法则惟有不复造业。过去之共业未尽，则吾所处之国土之世界食其业报，宜也。今宜如何？则更求所以造善良之共业且已。孟子所立命者，是否作如此解说，吾不敢言，然孟子必有见于此，则吾敢言也。故其言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又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公孙丑》上）。

宿命之说，有时固可以懈人进取之志，然亦可以息人营求奔竞之心。孟子曰：“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万章》下）又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者也，求在外者也。”此皆为举世营营逐逐之徒下顶门一针者。孔孟言命，其作用大半在是。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真知命者必不为苟得，真知命者必患有所不避，故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滕文公》下）。

孟子最尊改过。故曰：“人恒过而后能改”（《告子》下）；又曰：“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公孙丑》下）；又曰：“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离娄》下）。此亦与其性善之旨相一贯，虽有陷溺，虽有桔正，一旦觉悟，则善体固在。故有过非所患，改之而已。此亦孟子善诱学者之一端也。



纪念党的“三大”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

广东党史学会受中央有关部门委托于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就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党的“三大”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意义，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

讨论会收到了学术论文四十多篇，这些论文从各个侧面阐述党的“三大”以及确定实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理论、意义和成就，受到与会者的重视。

（鸿生）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在广州举行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于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广州举行。出席本届年会的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和侨务、新闻出版等系统的代表一百一十多人。年会共收到学术论文九十多篇，内容包括东南亚的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年会期间除总结工作和交流研究成果外，还修改了会章和选举新的理事会。朱杰勤教授当选会长。

本届年会由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华侨史学会和广东历史学会筹办。

（鸿生）

关于梁启超论孟子遗稿

李 建

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是尚未公开发表过的梁启超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康梁讨论会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前夕，我将此《遗稿》贡献给各位专家学者，期望在康梁研究上取得新成果。

《遗稿》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四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上学，后来参加革命，又南下到湘北。1956年，母亲到武汉来看我，将这部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交给我，说是父亲叫给我的，是梁启超的著作。由于我多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加以长期以来，学术界许多人对康梁持批判否定态度，我一直未翻阅也没有重视这部遗稿。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出现了重新研究评价康梁的新局面，这启发我认真阅读这部《遗稿》，并设法了解其真伪和发表时间。

由于父亲于1957年去世，母亲也于1979年去世，我不能直接问父母，便采取了以下办法进行鉴定：

（一）设法找梁启超的手稿，查对笔迹，看是否一样。结果，我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找到《梁任公诗稿手迹》一书，一对照，和《遗稿》字体、笔迹完全一样。

（二）我将此《遗稿》给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组编辑邓卫中同志，请他找人鉴定，他回信说，曾找一熟悉情况的人看了，认为是梁启超的手稿无疑。

（三）我写信问在北京的姐姐、哥哥及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所工作又多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姐夫洪源。他回信说：“父亲是梁启超的弟子（学生）和秘书，此遗稿是梁送给父亲的，系梁平时读书笔记性质，又经他自己整理的。估计是欧游回来或在此一段时间的作品。”

（四）《遗稿》前后都有“梁启超印”红色印泥图章，和父亲遗物中的“梁启超印”完全相同。因

父亲是梁的秘书，故梁的图章在他手中掌握。此章边上落款为“任公先生钩命 张荫谨刻”。图章是真，推此《遗稿》也当为真迹。

（五）当父亲五十寿辰时，梁书写一副对联送给父亲。上联是“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那年是甲子年，即1924年，梁五十二岁。五年后，梁去世。《遗稿》中也有“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一句。这一点，是否也可以对《遗稿》是梁的晚年著作提供参考？

（六）梁在欧游回国后，致力文教事业。此《遗稿》的重点是论孟子之教育主义，它是梁从事文教事业的指导思想，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思想。从主题内容与文教事业联系起来看，似应是他欧游回国后的著作。

《遗稿》为毛笔手书，直行，古纸本，共一百三十二页，约二万字。前面为《孟子略传》，十页，约一千五百字。主体部分为《孟子之教育主义》，一百二十二页，约一万八千多字。全书未单独标出章、节、目，在论述“性善”之后，又论述了孟子发挥本能之教的次序；孟子谈入道之途；还论述了孟子思想的其他若干方面。这些论述，都是围绕着孟子的教育思想这个中心展开的。在论述中阐明了作者本人的看法。

《遗稿》的主题，是通过对孟子之教育主义的论述，宣传如何培养出关心天下大事，有进取精神，能坚持原则，担当“天下大任”的人才，和如何使自己成为这种人才的途径。《遗稿》字数虽不多，但能够抓住中心并纵横展开。

这部著作，仍然具有“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特点。他联系中国实际，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进行宣传。

他立足中国，环顾世界，论述孔孟，杂以佛学，探讨教育要旨，殷切关心后辈成长。

我认为，体现在《遗稿》中的梁启超的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关心天下大事。

梁启超说：“《孟子》全书教人修养者千言万语，可以两言蔽之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告子》上）故真能率孟子之教者，大彻大悟，一了百了。”他把孟子和其他儒家学派加以比较，指出：“孔子卒后，儒分为八。邹鲁学者多斤斤于礼容之末节而不见其大。惟子思述家学以作《中庸》，上探本于性与天道，而下及经纶天下之大经，孟子受其传而光大之，儒学一新焉。……其教人在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故与曾子一派专务致谨于容貌辞气颜色之间者有异，与子夏一派专讲进退应对之节传章句之文者亦有异。”又说：“后儒专提主敬主静等法门者，或专以穷理格物为事者，或专务礼容节文之末者，皆不免偏至，孟子惟先立乎其大者，不务枝叶。孟子言必有事焉，不贪寂静也。”

（二）关于“人皆可以为尧舜”。

梁启超强调孟子一生论学大宗旨就是“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宣传“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圣人与我同类者”。他解释说，这是“极力发明人类有共通性。性既非吾一人所独，而为全人类之所共，则人类所具之德，吾固当具之，人类所能之事，吾固当能之，人类中既产圣贤，则人类之本质能产圣贤甚明，吾既为人类之一，则吾亦能为圣贤甚明。”

（三）关于“礼义无定”。

梁启超在谈到孟子提出的“是非之心”时，发表了自己新的看法：“一事物当前，吾人对之自有一番审量判断，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此尽人所同也。然其所是非者为合于礼义抑不合于礼义，则甚难言。此非独因吾人之知识有高下也，盖礼义之本质，先自不定，常随时随地而有异同。例如妇人夫死改醮，在泰西为常事，中国则谓之不义矣。男子置妾，在中国为常事，泰西则谓之不义矣。东方之复仇，西方之决斗，在古代皆谓之义，今若有之，则触刑网矣。此义之无定也。例如褐裘之衣，古为大礼盛服，今若袒胸而赴宴会，必共诤为非礼矣。西人相见，抱腰接吻，行于广众中，我国有此，必大诤为非礼矣。野蛮部落之祭礼，有例须以其长子为牺牲者，自文明人

观之，其残忍殆不可思议，然彼固以为不如此则非礼矣。此礼之无定也。”

（四）关于人贵有“自由意志”。

梁启超说：“持自力之教者，必以凡人皆有自由意志为前提。有自由意志，然后善恶惟我择，然后善恶之责任始有所归也。故孟子于人不以自力求向上者，谓之曰自暴、曰自弃、曰自贼。”梁启超对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作了如下解释：“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即人格其物也。……人类之生，合神明躯干两部分而成。躯干者，人与禽兽所同有也，饥而思食，劳而思息，寒暑趋避，牝牡交感，凡生理冲动之作用，人无一焉能异于禽兽者也，乃至群处而嬉乐，失侣而惨愁，触逆而仇怒，遇害而殉惧，凡心理感受之作用，人亦无以大异于禽兽者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惟此神明能审量焉，别择焉，能比推焉，扩充焉。此禽兽所决不能也，然神明寓于躯干之中，常受躯干之牵缚，牵缚深而神明之作用殆息。此作用息，则几与禽兽无择矣，何也？禽兽惟有生理之冲动与心理之受感，全不能以自身意志为选择发动。如曰，吾当如是吾当不如是，吾欲如是吾欲不如是，吾必如是吾必不如是，此皆非禽兽所能也，而人能之，故异于禽兽也。质言之，则人类有自由意志而禽兽无之也。今为躯干所束缚而失其意志之自由，为其所不当为，欲其所不当欲，神明不便自主，而成为躯干之奴隶，则试问与禽兽果复何择者。……盖此人格一丧，则非惟近于禽兽，直是禽兽耳，此孟子一针见血之言也。”

（五）关于“舍生取义”。

针对孟子所说“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上），梁启超进行了解释。他说：“夫躯干与神明，宜并养者也，然两者时有冲突焉。孟子并非责人以勿养小体，而谓必以不养小失大为范围，……遇神明与躯干利害相冲突时，必毋或徇躯干之欲而堕其神明。君子与庶民之异在此也，人与禽兽之异亦在此也。”他说“所谓神明与躯干利害之冲突何如？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告子》上）所谓二者不可得兼，即神明与躯干利害相冲突之时也。其冲突之

甚，乃至神明与躯干不能并存，此等境遇，本非人世间所常有，吾侪或终身不一遇焉。万一遇之，则势必须舍其一乃能取其一。孰取孰舍？即人禽所攸分也。禽兽所欲无更甚于生，所恶无更甚于死，人决不然。孰舍孰取？视平日所养何如耳”。

（六）关于发扬进取，峻守名节。

梁启超说，孟子“其示人入道之途有二，曰狂，曰狷。狂者进取，故勇于自任，以圣人为必可学，以天下事为必可为。狷者，有所不为，故尚名节，峻崖岸，不屑不洁，终未尝枉道以徇乎人也。”梁启超强调：“凡孟子书中教人以发扬志气坚信自力者，皆狂者之言也。凡孟子书中教人以砥厉廉隅峻守名节者，皆狷者之言也。故学孟子之学，从狂狷入焉可耳。”他说：“狂，然后有元气；狷，然后有正气。无元气则不能发扬，无正气则不能强立。”他指出：“人类之能进，以其有向上心，不以现状自满足，而常求加进，此其所以异于禽兽也。志一立，则饥肤筋骸皆挺举，而神明自发皇。而不然者，则奄奄若陈死人，更复有何事，直一齐放倒耳。故孟子首以此教学者也。”

梁启超认为：“狂者之弊，在自信力太过，故往往夷考其行，而不掩焉……。然人若无自信力，则无复进取，而世运之进化，或几乎息矣。虽太过犹愈于己……。”

（七）关于“宿命论”。

梁启超说：“孟子所标举，有一义焉，若与其根本宗旨相冲突者，则言命是已。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又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俱《尽心》上）……书中言，类此者尚甚多。凡此皆谓我身以外，尚有一物焉为最高之主宰，而我之境遇，恒受其支配，此即所谓宿命说也。中国古代宿命说有两派，其一，谓宿命由天帝所定。天帝者，一种之人格神，而其威权无上，非人所能抗。孟子所谓天未欲平治天下云云是也，商周间之宗教思想，纯属此派，而儒家继承之；其二，谓宿命由自然之运所演成，其为物虽非必有意识，然人类之意识，迄不能胜之，孟子所谓莫为而为，莫之致而至云云是也。道家之哲学思想，纯属此派，而儒家亦兼采之。此两派思想，盖弥漫于我数千年之思想界，占莫大势力。其昌言与之反抗者，惟墨子一人而已。然墨子非命而复言天志，则已自相冲突也。在欧洲哲学，则宿命说与自由意志说最不相容。盖既信有宿命，则

所谓万物备我，所谓自力万能者，其说将皆不能成立。人若过信宿命，必且委心任运，处顺境将耽安不复进取，处逆境将颓丧而不能自振，如是则世运之进化不几息耶？！故就表面上观之，孟子学说中之此一点，实与其全体学说相矛盾，且不啻取其全体学说而毁弃之，此无容为讳者也。”

（八）关于大人物要意志坚强。

他说：《舜发畎亩》一章“最能发扬人之志气，此大医王之海潮音也。”他引出其中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然后发。征于色，发于声，然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他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普天下之人，处困境遭患难坎坷不得志，颠沛无所告诉者，与夫忧国忧天下悲观绝望者，读此其可以尽人而奋兴矣。将受大任者，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其身，则既甚矣。犹以为未足，加之以行拂乱其所为，拂乱所为云者，凡行为之结果，无一焉不与所希望相反。人生到此，真乃心摧气尽，盖神明之苦痛，无量无极矣。殊不知非至于此极，则曷由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多一分之坎坷颠沛，则动忍增益加一分之量，坎坷颠沛至乎其极，即动忍增益至乎其极者也。故孟子复申言之曰，能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然后发。凡以证明前此所云云，并非聊相慰藉之言。盖大人物之成就，其第一要素在意志坚强。其第二要素在思虑周密。然此种境界，非此心经几许操练，决不能至也。”

（九）关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

梁启超说：“孟子极言教育为人生之一种责任。……教育之要旨，曰养、曰觉。养属道德方面，觉属知识方面。先辈有养人觉人之义务，后辈有受养受觉、自养自觉之义务。社会文明所以能联属不断，缉熙光明者，全恃此也。故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尽心》上）”。他针对孟子关于“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而发议论，说：“与人为善，教育者之事也，取人为善，受教育者之事也。常能取人为善，则受教育岂有止境，而亦何常师之有。故曰：‘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告子》下《乐正子》章）此自力教育之妙用也。”他赞成相互

学习，说：“盖人类之能进化，全由其富于相熏习性。故一人所发明之新道德新知识，不转瞬而可以成为公众所共有。然能否均沾此共有物，则在乎人之自取自受而已。其能受之量弥大，则其所受之量亦弥大。故以友自广，自一乡一国而远及于天下古人也。”

（十）关于社会的进化。

梁启超说：“世运之进化，非为直线而常为螺旋形。当其在进化途中，波折固所不免。当此波折之时，能有一种新空气新力量，蜕变前此之腐气惰力而与之代兴，此国家所以能与天地长久也。”“岂惟国家，即人类社会之全体亦莫不然。”

综上所述，梁启超论《孟子》遗稿，内容非常丰富，对研究梁启超的思想特别是他晚年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从《遗稿》看，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仍然主张关心天下大事，重视教育事

业，为担当天下大任培养德智各方面合格的人才。他在欧游回国后，眼界更开阔了，并不是灰心丧气，一蹶不振。在他的这篇《遗稿》中，虽然也有许多唯心主义以及他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个《遗稿》提供了对梁启超晚年思想研究的可贵资料。

作者附言：

我原名何士通。父亲叫何澄一（也叫何澄意、何擎一）。母亲叫罗婉如，广东省中山县（当时叫香山县）人。父亲是光绪年间由家乡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成为梁启超入门弟子的（梁当时是主考官）。他曾协助康梁办广智书局，到日本办学校，在北京办北海松坡图书馆，并从事梁的秘书工作。



“不曾辛苦学妃豨”

叶正猛

草堂乐府擅惊奇，杜老哀时托兴微。元白张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学妃豨。

文研所《唐诗选》下册，王建部分的小序引了此诗，编者在注释中说：“‘妃豨’这里代指乐府”，同时引证了古乐府《有所思》：“妃呼豨，秋风飒飒晨风颭。东方须臾高知之”。和徐祜卿《谈艺录》：“乐府中有‘妃呼豨’、‘伊何那’诸语，本自无义，但补乐中之音”。在原诗下面，编者有一段诠释曰：“张、王、元、白的乐府能象杜甫那样，真正继承了古乐府的传统，而不是刻板地仿袭古乐府的内容和形式。‘新乐府能得‘古’意，……因为它把古乐府的传统看作一种可以发展和丰富的活东西，而不是一些只许照样复制的僵硬模型”。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代论诗绝句选》选录此诗，亦作了类似的说明。

其实王士禛作此诗是别有一段原委的。与王同时的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二六条载：“阮亭先生（即王士禛）曰：‘余尝见一江南士人拟古乐府，有“妃来呼豨豨知之”之句。盖乐府“妃呼豨”皆声而无字，今误以“妃”为“女”，“呼”为“唤”，“豨”为“豕”，凑泊成句，是何文理’因于《论诗绝句》著其说曰：‘……’（即此诗略）”“渔洋夫子（王士禛）口授”、其“学生何世璠述”的《然鐙记闻》第十九条所载与之略同。由这二条材料可知：第一，这首诗重点不是说明元、白、张、王的乐府诗作，而是有感于上述这则笑话而作的，重点也在于此，前三句并列，从正面立论；第二，“妃豨”不是代指乐府，而是以“省略法”用了一个当代的“典故”；第三，作者所反对的不仅仅是“刻板地仿袭古乐府”，而是尖锐地针砭当时人对古乐府“附会穿凿至于摹拟剽窃”（《然鐙记闻》）。

中国历史上对石油天然气的认识 利用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下）

戴 裔 煊

三、西方石油资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我国历史上，长时期来存在着石油进口的问题。但从石油进口的性质来说，明清之际，是划时代的界标。以前把石油运到中国来的是阿拉伯国家的人民，以后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商人；以前是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交换的礼物，以后则是西方资产阶级把它变成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手段，与军事、政治、文化方面的侵略，同时并进，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提炼石油的方法越来越精，分出来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不同品种，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用途。其中也有所谓“石脑油”，一般称为“汽油”，外文仍然叫做naphtha，但和古代的“石脑油”或纳夫塔不同，它是从原油第一次蒸馏出来的蒸馏液。比重轻，易挥发，经常用来开动马达，用来做洋漆和油布的各种树脂的溶剂，用来代替或掺杂松节油等等。其次分馏物是照明用油，英语叫做kerosene，中国有煤油、洋油、火油、水火油、灯油等称谓。煤油主要用于照明和使器物洁净。提炼纯净、去掉臭味的产品用于医药，作为许多生发药剂的主药，等等。又其次分馏物是润滑油。润滑油提取过后剩下来的残余，经过化学处理进一步蒸馏，产生一种有油蜡溶解在里面的重润滑油。最后留在蒸馏器里的残余还有一种黑松香，蒸馏彻底则为焦炭，用来做燃料和弧光灯的炭棒。残渣与沥青混合，也用来筑路、与煤屑混合做煤砖。凡士林（Vaseline）也是在石油蒸馏期间所得的中间产品之一。由于它具有使创伤愈合和不变腐的特性，大多用来配制药膏，或用作作为润滑剂，作为许多毛发复生药剂的主药。^①

近代石油开始输入我国的确实年代虽无可考，但我们有根据说，这是在鸦片战争、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就煤油来说，一八六七年还不是大宗输入的商品，其时输入量只有29,842加仑，而这些煤油又是专供外国社团用的。我国人民照明用的是自己生产的植物油。首先把大量煤油输入中国的是美国资本家，一八七八年，他们输入中国的煤油达4,161,100加仑。以后在一八八九年，沙皇俄国的煤油；一八九四年，苏门答腊的煤油；一九〇一年，婆罗州的煤油也相继输入来了。到一九〇五年，总输入量达到156,948,040加仑。在这个总量中，美国占52%，俄国占8%，苏门答腊的

占32%，婆罗州的占7%，②美国的石油垄断资本控制了中国的石油市场。据说从一九〇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光是美、英两国的石油公司，就从中国榨取了可以买二百八十万台拖拉机的利润。③

垄断中国石油市场的美英石油资本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英商亚细亚石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一个是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

早在一八九〇年，荷兰皇家公司就在东印度群岛苏门答腊获得该地区开采石油的租让权。这是西方殖民者对当地石油资源的掠夺。一九〇三年荷兰皇家公司为了扩大石油的勘探、开采，提高加工能力，在欧洲争夺市场，就与英国的壳牌运输和贸易公司合设了子公司——亚细亚石油公司。此后，亚细亚汽油和煤油就深入到中国边远地区，同时在中国培养了一批新的买办阶级。到一九〇六年，荷兰皇家公司与壳牌运输和贸易公司正式合并成英荷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Shell Group），它是一个持股公司，实际业务由下面的执行公司来经营：属于荷兰的是巴达维亚石油公司；属于英国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公司。初时公司的股票，荷兰资本家占百分之六十，英国资本家只占百分之四十。后来由于在业务经营上要依靠英国政府的支持，英国资产阶级逐渐占据优势，亚细亚石油公司和盎格鲁·撒克逊公司便过渡到由英国资本家掌管。

亚细亚石油公司为了在亚洲扩大业务，进行经济掠夺，又组织了八个子公司。在中国就有两个，一个是亚细亚火油华北有限公司，一个是亚细亚火油华南有限公司，都是在一九一三年八月组建成立的。华北公司，前身即是壳牌的子公司盎格鲁·撒克逊公司，资金二百万磅，营业范围是中国和朝鲜。华南公司资金一百万磅，也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公司的财产，从事以香港为中心的石油贩卖及储藏业务，办事处设在香港。这两个公司在中国各地设有油库、分店、办事处。除石油及其制品外，又还从事石蜡和洋烛的贩卖事业，有一个子公司叫做白礼氏洋烛公司，专门从事洋烛的制造。

与壳牌亚细亚石油公司一样，美国最大财阀之一的洛克菲勒所经营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也把在荷印掠夺的石油运来中国推销。一九一二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开始在荷印作小规模勘探，结果在苏门答腊发现很多重要油田。它在远东生产提炼石油有专门设备，它的子公司美孚洋行负责在远东方面。它在中国各地也设有分店、办事处、油库，除拥有土地外，还拥有船舶，用来从事长江航运，载着本公司的石油溯江而上；返航则装载一般货物，一举两得。

美国资本家的经营无孔不入。在美孚石油公司的石油进入中国初期，为了广泛推销它的煤油，它制造洋油灯，随油奉送，不取分文。初时运来中国的石油，本来是散装的，美国资本家为着适应中国广大农村的需要，便于运输和销售，改用白铁罐装，每罐五加仑，两罐用一个木箱装载。这样一箱共十加仑，净重六十五磅。据说这个方法是一个油商德沃（Devoe）发明的，后来他经营的事业卖给美孚石油公司，在木箱上仍保留有“德沃”字样。④美孚也经营洋烛生产销售。在青岛设有职工八十人的制罐厂，在天津、汉口也设有制罐厂或洋烛厂，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榨取更多的超额利润。

英美的石油输入,是同改变英中、美中之间贸易的不利地位,进而攫取中国更多的财富紧密相联的。茶叶是中国传统的输出品。一六六〇年中国茶叶开始输入英国,盘据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是传播的媒介。由于英王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的皇后葡萄牙公主凯瑟琳(Catherine)酷嗜茶,初流行于宫廷,后上行下效,渐及于民间,成为流行的时髦饮料。⑤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各饭店和咖啡店大量经营茶饮,导致中国茶叶大量输入英国。丝茶两项在十八世纪构成中国对英国输出的大宗。

美国对中国茶叶的消费量本来有限,但美国商人是欧洲各国货物的运送者。在十九世纪开头的十年间,每年从中国输入欧洲的茶叶,有四分之一到一半是由美国转手运输的。这是一笔有厚利可图的生意,美国商人乐于从事。⑥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需要西方的商品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英美资本家商人为了得到中国商品,不得不用硬通货支付,结果硬通货长期外流,来源枯竭,情况非常严重。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英美资产阶级采取了非常阴险毒辣的手段。先是把大量的鸦片运来中国。始作俑者又是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直到一八二五或一八三二年以后,鸦片大量倾销,白银才倒转过来从中国流出。后来他们又发现石油也是一门“重炮”,既有销路,又不象贩运鸦片那样受人唾骂,于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把中国的石油市场控制起来。

帝国主义者不特不让中国人发展自己的石油工业,即使向他们购买原料自己加工,从中争点小利,也受到百般阻挠和破坏,非把此类加工业迫至最后停止不可。解放前的煤油市场,长时期来为美英等石油垄断资本家所控制。据广州的调查统计,一九三〇年输入的煤油,就占九百万海关两有奇,漏卮之巨,实属惊人。一九三〇年春,中国一些民族资本家拟在高州开采原料,自行制炼煤油,结果没有成功。之后,决定采用广州市内洋商亚细亚、美孚、德士古等公司输入的、燃点在华氏84至86度的低度柴油作为原料,再行提炼。虽不理想,但试行有效,于是争着办厂,以至一年之间,广州开办的土制煤油厂多至一百六十余家。这样一来,洋商着急了,于是把柴油价格从原来每吨港币四、五十元提高到一百元有奇。这还不算,又把吧嘛油掺杂进去,使之难于提炼。成本既高,提炼又困难,终于迫使土制炼油厂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之间,相继歇业。

柴油是燃点比煤油高的石油制品,多产于东印度及美俄两国。广州土制煤油厂所采用的多是美国产品。当一九三一年前后土制煤油受到沉重打击的时候,南中煤油公司成立了。它直接从国外输入未经提炼的燃点在华氏100至104度之间的高度柴油,作为提炼土煤油的原料。亚细亚、美孚、德士古等公司见到我国土制煤油业不但没有被扼杀,且有复苏之势,便在我国内地设厂制炼“桃花牌”、“经济牌”、“月光牌”等煤油,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减少运费,降低成本,以便削价倾销。所制煤油价格总要比中国土煤油每罐低几角。在洋商煤油压价倾销的情况下,我国的柴油商及土煤油厂在一九三三年四、五、六三个月间每月都要亏损二三十万元。初时舶来煤油,每罐售价六元多,我国土制煤油,每罐售价五元四角。后洋商煤油减价倾销,有个时期竟每罐降至二元八角。土煤

油厂资本微薄，而原料又依赖进口，他们无法跟洋商竞争，自然非倒台不可。^⑦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旧中国的石油生产的确少得可怜。据说从一九〇七至一九四八年，四十二年总共不过生产了二七八万吨石油。最高年产量的一九四三年也只不过生产了三十二万吨。石油的品种，也只有九种普通产品。^⑧帝国主义者见到旧中国石油产量少，差不多完全依赖进口，于是大唱其所谓“中国贫油论”，胡说什么“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岩石类型与生成时代都不储存有开采价值的石油的可能”。^⑨他们这样做，就是企图在中国人民中间造成悲观失望情绪，放弃找寻自己的石油资源和发展自己石油工业的努力，使中国永远成为美英石油垄断资本家倾销石油的市场，永远靠进口“洋油”过日子。

四、中国过去石油业不发达原因的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天然气的国家之一，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利用，表现出中国人民的高度聪明才智；中国又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石油和天然气的发现比比有之。可是过去二千多年来石油业并不发达，从第十世纪开始就已经有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输入，虽然数量不多，用途不广，影响不大，仍然是取给于人；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把各种石油产品大量输入中国，使中国成为他们榨取厚利的市场，情况十分严重。为什么中国的石油业发达不起来呢？根本理由有两条：一是封建统治者的压迫；一是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在封建制度下，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榨取，使石油业在萌芽状态中即遭扼杀。在封建制度下，凡是有利可图的事业，没有不被地主阶级攫取占有的，石油业也不例外。远古的情况怎样，我们缺乏资料，不得而知。在宋代以后，就有许多事实足以说明问题。例如陕西延长县境（即汉上郡高奴县）的石油，当宋范仲淹镇守西陲时，就被取来作军队中的燃料。^⑩元代不直接攫取，就苛抽重税，延长南迎河有凿井取油的，计一井每岁要交油一百一十斤；延川县西北八十里永丰村有一井，每岁要交四百斤，交给本路的元丰库。^⑪到了清朝，把石油矿定为官产，“惟县官得取所谓‘黑块’者供官署之用。”在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剥削榨取下，石油生产者对生产不感兴趣，根本谈不上改善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方法，长时期来只是沿袭祖先的老一套，陈陈相因，代代相传。

一九一二年，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当了“临时大总统”。一九一四年二月，他的“内阁总理”熊希龄就迫不及待，勾结美帝国主义，与美孚石油公司订立了中美合办临时协定，决定对陕西地区中部宜君、延长等县的石油蕴藏进行勘探，甚至延及热河承德（今河北省承德市）及其附近地区。按照协定，勘探工作由美孚石油公司派出技师进行办理，其费用由中国政府和美孚石油公司共同分担。根据勘探情况，如果认为这些地区有开发价值，便组织一个美华合办的公司，由美孚石油公司投资55%，再由美孚石油公司募股37.5%“赠与”中国，其余7.5%，到这个公司成立后，在二年之内，由中国政府方面出资。美孚石油公司在临时协定上还附加了两个条件：

一、如果这些油田采掘结果不良，美孚石油公司还得开采其他油田。

二、在这个临时协定缔结后的一年内，中国不得将其他任何地方的石油权益交给其他外国人。

钻探工作于一九一四年九月开始。美孚石油公司运来三台当时最新式的钻探机，并派美国技师二十人带领许多工人前来中国。在延长和其他几个地方钻探了深达三千英尺的矿井，确定在四百英尺到六百英尺深处有油层。可是在承德方面钻探的结果，认为不合理想。根据上述情况，加以当时交通不便和其他困难，认为上述油田没有希望。于是美孚石油公司根据附加条件，乘机向中国北洋政府提出取得中国全境油田开发权的要求。这件事，充分暴露了美国石油资本家在“美华合办”名义下，勾结中国官僚买办阶级，企图垄断中国石油勘探、测量、开采、提炼、运输和贩卖特权的狂妄野心。由于北洋政府害怕中国人民反对，不敢明目张胆拱手出卖，使美帝国主义者的野心未能得逞。^①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困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②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已经极其残酷地剥削榨取中国人民，又还勾结殖民主义，引狼入室。鸦片战争后，外国石油大量倾销，中国原有的落后的石油业，产品质量不佳，成本亦不便宜，自不可能和外国石油竞争，自不可能有发展余地。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寻找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我国由“贫油”国变成了石油输出国。我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发展及其原因，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兹不赘述。

① 参考 E. Watson, *The Principal Articles of Chinese Commerce*, PP.123—128.

② 参考 H. B. Morse *《中朝制度考》*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P. 289.

③ 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羊城晚报》《从无到有的石油家当》。

④ E. Watson, 前揭书, P.125.

⑤ 参考 Montato de Jesue, *Historic Macao*, P.135.

⑥ 见 K. S.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 29.

⑦ 参考一九三四年六月广州出版的《广东工商业·土制煤油》，第一、二、四，及第四二页。

⑧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羊城晚报》《从无到有的石油家当》。

⑨ 这是一九一四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派地质学家来中国考察石油的断语。见 F. G. Clapp *《石油科学》*第一卷，一九三八年版，第一三九页。本文从《红旗》一九六五年第十三号第二三页闵豫的文章转引。

⑩ 见《中国地名大词典·延长石油矿》条。

⑪ 见《永乐大典》卷四八四一《油》字条。

⑫ 参考萍叶登著，陈公绰、陈真译《侵略中国的英美财阀》，第八六页。

⑬ 《毛泽东选集》，第五八七一五八八页。

“温柔敦厚”辨

邱世友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述语或命题，怎样进行历史的、唯物的分析，还其历史的地位和辩证法，怎样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一分为二地区分出有价值的理论因素，批判其封建糟粕。这仍然是文学理论批评者和美学史家今后的任务。如“温柔敦厚”便应该如此。

经过历史的考察，不难看到，“温柔敦厚”这一诗歌理论命题，具有两种不同的内涵，即诗歌的道德内容和审美内容；具有两种不同的原则，即诗歌的伦理原则和艺术原则。因为任何的一种艺术，诗歌包括在内，不可能与道德伦理截然分开，更不可能没有艺术方法，而二者是又分开又联系的。反映在理论批评上也往往如此。正如中国哲学史上的“道”，既属本体论范畴，也属方法论范畴。本文本此原理来谈谈“温柔敦厚”这一命题。

“温柔敦厚”一语，始见于《礼记·经解》。《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很明显，“温柔敦厚”作为诗教，是儒者以诗施行教化，使人入识“礼”明“义”。他们强调这是国家治本的一个方面。无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封建统治阶级企图把诗作为实行礼教，进行统治的思想手段。他们要求诗歌塑造出温柔恭顺、没有反抗性的抒情形象和抒情典型性格，用以感化人的“善心”，乃遂其治。所以，唐孔颖达作《礼记正义》时，对这几句经文作了这样的解释：“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又曰：“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

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同上）以诗教民，以诗化民，在孔颖达看来，是上层统治者的事，上层统治者须深达于诗教之义理。所谓“诗教之义理”，不外是诗的伦理原则和艺术原则，而首先是前者。依照这个原则，可以按他们的封建礼义规范去教化人民，使其朴厚敦实之性，忠厚之情和谐于封建道德而不至相乖离。所谓不愚，就是通过诗教使这种朴实敦厚之性合乎封建道德规范，使其行为既符合封建道德标准，又能按这种标准辨识行为的“是非”、“善恶”，取舍从违。因此，温柔敦厚的诗教，自汉唐历两宋，作为诗歌伦理原则的诗教，是保守落后的，乃至反动的。这个理论自始至终在维护封建统治，自汉唐历两宋而明清，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影响极其深远。尤其宋以后，随着理学的思想统治，诗教的统治使诗歌不能充分揭露和批判封建的黑暗统治，不能充分发扬民主思想。这是给全部文学史所证实了的。对于“温柔敦厚”作为诗歌的伦理原则，今后还必须继续批判。

但是，“温柔敦厚”作为诗歌的艺术原则和作为诗歌的伦理原则，则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这两个原则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现象中，二者又往往有密切的联系。“温柔敦厚”作为诗歌的艺术原则，或者说作为艺术的表现原则，就现有的历史文献看，是南朝齐梁时期刘勰首次提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说：

诗主言志，训诂同书。摘风裁兴，藻辞滴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

《文心雕龙》宏篇巨制，体大思精，其宗经、征圣本乎儒学以论文。但纵观全书，却没有把“温柔敦厚”作为宣扬封建道德的伦理原则来理解，即是说，没有把它当成诗教。而刘勰所强调的“摘风

裁兴，藻辞涵喻”，是本《毛诗大序》“主文而谏”的隐约讽谏；他强调的是“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的含蓄蕴藉，而二者从艺术原则来说，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不同者是，“涵喻”和“温柔”是各有其特点和特征的艺术表现。前者强调通过比兴，委曲尽情地进行讽谏；后者则强调含蓄蕴藉，委婉入情。即“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响外别传之妙”（《说诗晬语》见《清诗话》第524页），以表达深厚的思想感情，即所谓“深衷”、所谓“敦厚”、“忠厚”、“深厚”；而含蓄蕴藉也不离乎比兴，讽谏也不能不重乎深厚的思想感情。对刘勰这两句话作这样分析，是符合原意的。清楚看到，刘勰是主张温柔敦厚的艺术原则的。所以，在他看来，所谓温柔敦厚者是以含蓄蕴藉，婉曲达情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去表达深沉敦厚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当然也包括了刘勰所认为是“正确”的封建思想感情，这是不奇怪的。而刘勰的贡献在于，他的论述给我们明确地认识到“温柔敦厚”不作为诗教而作为诗歌艺术原则的历史理论形式。刘勰本此而倡隐秀而重在隐，主张“文外重旨”，“言外曲致”和“复意为工”。因此，他说：

夫隐之为体，义表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隐秀》）

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同上）

他用很形象而又适切的比喻说明这个道理和艺术现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翫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见《隐秀篇》按其中多有他文闕入，而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即使对具体作家的评论，如阮籍，也说“阮旨遥深”（《明诗》），有“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之意，即以含蓄蕴藉、委婉曲致的艺术形式和手法，表现了深厚的意旨，表现了敦厚的思想感情。稍后的钟嵘对阮籍也作了类似的评价：“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明代徐祯卿又直接指明，“阮生优缓有余”的艺术特点（《谈艺录》，转引自黄节《阮步兵诗注·咏怀诗之一》）正因为阮嗣宗诗具优柔和缓，含蓄蕴藉的艺术形式，所以能写出“遥深”、“渊放”的“意旨”和“归趣”。简而言之，即以“温柔”的艺术手法抒写“敦厚”的思想感情。让我们举例说吧，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咏怀》一）

阮籍处于司马氏专政之时，司马氏大肆杀戮知识

分子，故优柔委婉以写之。诗中孤鸿以比贤人之在草野，翔鸟以喻权臣之在高位（用《文选》吕延济释意），乱世之征，危邦之兆，莫此为甚。故独怀忧思，展转不寐，弹琴寄意，徒增心伤。明月清风，何可涤烦？其意旨之深而微，其所表现之婉而曲，从美学意义上说，不可不谓之温柔敦厚含蓄蕴藉了。这样的例子，是足以说明刘勰所解释的温柔敦厚艺术原则的，而温柔敦厚的诗教则无与焉。

即使最为代表儒家正统诗教的孔颖达，他的《礼记正义》，如前所引，在大发一套温柔敦厚诗教迂腐之论的同时，也指出“主文谏”，“不指切事情”，继承《诗大序》所强调的诗歌要通过比兴起讽刺社会政治的作用，而讽刺又是要以优柔含蓄，蕴藉委婉的艺术形式表现的。这样才感人至深。清代著名文论家王夫之和沈德潜，他们对温柔敦厚诗歌艺术原则的说法同样是如此。

王夫之以“温柔敦厚”诗教作为诗歌的伦理原则，抨击了敢于暴露现实而写得浅近直露的诗歌，但又从“温柔敦厚”的诗歌艺术原则出发，与刘勰“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相暗合，揭示出含蓄蕴藉、婉曲尽情的诗歌思想艺术的深度和高度，往往谈言微中，提出极为精辟的见解。他在《夕堂永日绪论》序中说：

涵泳淫佚，引性情以入微，而超事功之烦黷，其用神矣。

韵以之谐，度以之雅，微以之发，远以之致。有宣诏而无矍矍，有淡宕而无犷戾。

可见，他强调诗歌音乐性和谐微婉的重要。正如刘勰所说的“温柔在诵”一样，微婉淡宕，蕴藉雅致，既无矍矍，又无犷戾。这是诗歌的高格。因为矍矍则晦涩不明，犷戾则粗悍乖违，殊无余蕴，自然也就无意趣了。这些说法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温柔敦厚诗歌艺术原则的意义。依此，王夫之也认为在诗歌风格上要引喻设譬，傍取侧收，使主题在微婉曲折中自然流露，而不犯本位。所以他又说：

《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用见理随物显，唯人所感，皆可类通；初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姑为隐语也。（《羌斋诗话》卷二）

以鸛鸣于九皋，鱼潜于渊等喻贤人身虽深隐，而声名远扬，当国者应于深浅求之，以为自己规海。这确是“全用比体”，所塑造的抒情形象体现了这类人事的普遍的道理，即所谓普遍性；并非斥指一人一事的隐语，而是典型化了的委婉曲折、蕴藉含蓄的抒情形象。因此，以委婉曲折、蕴藉含蓄为其形象形式的“温柔”特征，而“理随物显，所感皆可类通”则为其形象内容的“敦厚”特性。形象愈柔厚，其所揭示的事物就更具有一般性，更带本质的意义。这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其中体现了典型化。在曹氏父子的评价中，我们不同意王船山抑子建而扬魏文，正如不同意刘勰为魏文申辩。但魏文的诗作，确乎被他发掘出“温柔敦厚”的艺术特点，而无关乎“温柔敦厚”的诗教。我们看船山在《古诗评选》中评魏文的《猛虎行》、《燕歌行》就清楚了。他顺次评论说：

端际密旨，微情正尔动人。于艺苑诂不称圣！

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从“明月皎皎”入第七解，一径酣适。

前首黄节引朱止谿语云：“曲词似别有寄托，‘梧桐’二句，与古辞《猛虎》、《野雀》兴比略同。倒结升降焉可知意，绝奇。”（见《汉魏乐府风笺》该诗笺）。“别有寄托”，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宦海升沉之慨，而且那样的蕴藉含蓄，所以“微情正尔动人！”后一首是历来赞美的名篇。诗中写思妇怀人，其幽情单绪，因秋风而增伤；空房孤寂，援琴弦而吟短；牛女相望，感别离之难遇。这样的一个思妇抒情形象，无疑有较高的典型性。不但她的声容体态栩栩动人，而且有着贞静而温厚的性格和令人怜爱的矜持态度，既无封建的伦理规范也没有诗教的色彩。这样地写思妇，其人其情写得如许含蓄委婉，反复回还；而容色倩丽，语言清美，音调谐畅，莫怪乎船山赞为“古今无两”。他的这种艺术倾向性，从“温柔敦厚”的艺术原则说，是不难理解的。

沈德潜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温柔敦厚诗教的维护者，是一个借着诗教宣扬封建道德伦理的卫道士。即使这样的一个人物，对于温柔敦厚的艺术原则也有所阐发，和王夫之一样，提出了不少的精辟的见解。他首先对温柔敦厚诗的“主文谲谏”有比较中肯的阐明。如评《诗·卫风·硕人》：

庄姜贤而不答，由公之惑于嬖妾也。乃《硕人》一诗，备形族类之贵，容貌之美，礼仪之盛，国俗之富，而无一言及庄公，使人言外思之，故曰主文谲谏。（《说诗醉语》见《清诗话》第526页）

这里点出《硕人》一诗，空灵蕴藉，不犯本位，而庄公从对庄姜所描写的对比中见其昏惑，“（重叹庄公之昏惑”《诗集传》该诗注），得其言外之意，这比一般的分析是深入一步的，因为只为了庄姜之美之盛而写其美盛，就失去了言志之义。如《诗经今注》便是。又如评《诗·桧风·隰有苝楚》、《诗·秦风·蒹葭》，依次云：

政繁赋重，民不堪其苦。而《苝楚》一诗，唯羡草木之乐。诗意不在文辞中也。（《说诗醉语》见《清诗话》第526页）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苍凉渺渺，欲即转离，名人画本，不能到也。明陈子龙谓秦人思西周之诗，卓然特见。（同上，第527页）

对《苝楚》的评论，沈德潜认为“诗意不在文辞中”，而在文辞之外，在形象之外，所谓“文外曲致”，委婉尽情，故写政繁赋重，民不堪其苦之意愈见深厚。这一点是众所肯定的。如诗的首段说：“隰有苝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乐子之无知。”以苝楚婀娜其枝的摇曳之态，赋与悠然闲乐之情，从而反衬出自己的悲苦之思。含蓄蕴藉，寄意题外。至于评《蒹葭》诗，沈德潜引陈子龙语，似以诗教说诗，又回到《小序》“秦人刺襄公不用周礼”之说。子龙语未得考，而沈德潜所说“苍凉渺渺，欲即转离”，就其艺术意境来说是真切的，温厚含蓄，意绪无穷，画面虽写男女间的追恋，所谓：“说（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附录》）。尽写其企慕之至，其凄切动人之境之态之情都具在此。但不妨从艺术的普遍性引而伸之，则男女企慕之情常有通乎社会人生之大者。

《小序》言刺襄公不用周礼，这固然迂执难通。而秦人企慕西周的文治政教，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于理未尝不通。钱钟书先生说得很透，他说：“后世会心者以为善道可望难即，欲求不遂之致”，“盖非徒男女之私也”。并引但丁《神曲》为之证云：“亦寓微旨于美人隔河而笑”（Ella ridea dall' altra riva aritta）。（均见《管锥编》第一册123页至124页）。洵然，王静

安所谓“雅人深致”者也。陈子龙谓秦人思西周之诗，其理在此，不然何雅人深致之有？可见沈德潜说子龙解诗，“卓然特见”，语非河汉，诗无达诂，而以不达达之，其达或有深焉者。这并非刻意求其甚解，而是艺术形象大于所描写的生活现象的缘故，是温柔敦厚艺术原则所强调的含蓄蕴藉的缘故。此外，沈德潜反复强调“优柔婉约”、“婉道无穷”的诗歌特点。如说：

讽刺之词，直诘易尽，婉道无穷。卫宣姜无复人理，而《君子偕老》一诗，止道其容饰衣服之盛，而首章末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语逗露之。……苏子所谓不可以言语求而得，而必深观其意者也。（《说诗啐语》见《清诗话》第526页）

王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昨夜风开露井桃”一章，只说他人之承宠，而已之失宠，悠然可思，此求响于弦指外也。“玉颜不及寒鸦色”两言，亦复优柔婉约。（同上，第542页）

这些论述都是在阐明含蓄蕴藉、深婉微远之意，都是符合温柔敦厚的艺术原则的。这里就不再说了。

诚然，温柔敦厚的艺术原则和道德原则是不可分的。在诗歌的正确的道德原则下，提倡温柔敦厚的艺术方法，使诗歌含蓄蕴藉、委婉涵浑，或比兴，或寄托，从而表达其深厚敦实的思想感情，这是必要的。所以沈德潜又说：

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直质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同上，第523页）

这无疑和王夫之反对直率、粗犷而主张蕴藉含蓄，委婉曲折是一致的。这是温柔敦厚作为诗歌艺术表现的理论的阐述。这无论从主观方法，还是从客观历史发展来说，都是必然导致的艺术方法论和艺术风格论。

但是，艺术风格是多样的，应该承认如五七言歌行纵横排宕，雄放杰出，甚至“蓄愤斥言”，所在多有。这类诗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都不可忽视，律以一种风格，这当然是不对的。王夫之、沈德潜等艺术上虽主温柔敦厚，都非这样看。王夫之肯定了《诗·小雅》的《十月之交》、《节南山》等诗，说：

若他诗所指斥，则皇父、尹氏、暴公不憚直斥其名，历数其罪；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

《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

（《羌斋诗话》卷下，见《清诗话》第18页）

然则，这和他的基本论点有否矛盾？应该说是有的，从“诗教虽云温厚”这句话逗出来了。王夫之未曾把这个矛盾提到理论上加以解决。因此而厌恶杜诗的纵横排宕。而沈德潜却用正变这个早从《诗大序》提出来的传统理论，并承横山师说，试图加以解决。在我们看来，《十月之交》、《节南山》是变雅，《离骚》是变风变雅之遗。而其所以变，则有其离乱的时代背景，但这些诗是变之正声。叶燮《原诗》中阐发得极为深刻。这里就不再说了。沈德潜在其老师的理论基础，把豪放排宕这些所谓变的诗歌特点，统一在含蓄蕴藉当中。这又正如苏东坡说“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一样，找出其中的同一性。这难道不是美学原则的体现？沈德潜首先肯定诗之变，情之正：

苏、李、《十九首》后，五言最胜，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禹，生平抱负，悉流露楮墨行间，诗之交，情之正也。（《说诗啐语》，见《清诗话》第534页）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论正变的基础上关于这种矛盾同一的论点。这不但使其理论求得一致性而且作为美学原则，作为诗歌评价的原则，更加显得重要了。关于这方面，他的见解是颇为精辟的：

杜子美独辟畦径，寓纵横排宕于整密中，故应包涵一切。（同上，第538页）

老杜以宏才卓识，盛气大力胜之。读《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不废议论，不弃藻绩，笼罩宇宙，铿戛韶钧；而纵横出没中，复含蕴藉微远之致；

目为大成，非虚语也。（同上，第541页）

“纵横出没中，复含蕴藉微远之致”这不是矛盾统一的审美原则？在纵横排宕中见其含蓄深厚，在雄奇恣肆中见其蕴藉微远，在其他两种对立风格现象的统一中见其思想艺术意义，这不是审美的

原则?杜甫《秋兴》诸诗达到了这个艺术境界,无怪乎自元稹序杜诗后,历代论赞都说杜诗为集大成者。但是,这毕竟是变之正声,是“感时念乱”所使然,不复为纯乎优柔蕴藉之作。早在沈德潜之前,明末陈子龙在为宋子野《佩月堂诗稿》写的序就说过:“和平者,志也。其不能无正变者,时也。夫子野之乐,即古先王之乐也。奏之而雷霆骤作,风雨大至,岂非时为之乎?诗则犹是也。”(《陈忠裕全集》卷二五)与沈德潜同出于叶燮之门的薛雪,继承叶燮正变之论,更强调诗的正变:“温柔敦厚,缠绵悱恻,诗之正也。慷慨激昂,裁云镂月,诗之变也。”(《一瓢诗话》文学出版社本第103页)可惜薛雪没有象陈子龙那样从时代的昇平动乱来分析诗的正变。直到晚清,谭献论诗的变体,对于诗的所以变、且不得不变的时代社会原因就讲得更为明确具体,也更为动人了:“至若屈(大钧)顾(炎武)处士,鼎湖之攀既哀,鲁阳之戈复激。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凭臆而言,前无古昔。乃有怨而近怒,哀而至伤者,时为之也。”(《复堂类集》文一《明诗录叙》)这是正确的。但他也没有提出如上述的矛盾统一的美学原则,只是当他建立了柔厚说的论词后,才体现这个统一的辩证性方法。王夫之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不乏辩证的因素,但偏偏看不到含蓄蕴藉和豪放雄奇相统一的可能性,看不到这矛盾着的两种艺术特质的辩证统一。他诋议杜诗,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由此我们看到,沈德潜对杜诗“横纵出没中,复含蕴藉微远之致”,在理论上是很精妙的,在评核杜诗当然又是精确的。这是沈德潜在倡导温柔敦厚艺术原则时兼顾了正变关系所得出来的有益的结论。但是,沈德潜只看到“横纵出没中,复含蕴藉微远之致”,却未看到蕴藉微远的作品,也须具刚健之气,二者相反相成。关于这,薛雪在《一瓢诗话》中作了很有益的补充:“诗重蕴藉,然要有气魄,无气魄决非真蕴藉”。(文学出版社本第116页)无气魄的诗,岂不是象元遗山所评“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的“女郎”诗?

二

前面我们讨论了诗的温柔敦厚艺术原则。这一原则要求诗歌创作必须含蓄蕴藉、婉曲微远。诗歌创作如此,作为抒情诗的特殊形式的词,更

须如此。词,由于有其比诗更为显著的特点,即“意内言外”,“音内言外”^①,体制甚小而音乐抒情性甚强。这些词的特点更要讲究含蓄蕴藉,婉曲深微。即使豪放的词,也要讲究蕴藉。直率浅露,粗犷狂末,一泻无余,不是豪放。在清代,浙派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讲清空;常州派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讲寄托,也不离乎蕴藉含蓄。而空灵蕴藉又是词的高境。这一点,刘熙载在他的《艺概·词概》中是作为基本理论来论述的。这显然甄综了浙常两派之长而加以阐发的(详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拙作《刘熙载论词的含蓄和寄托》)。他说:

东坡《满庭芳》:“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语诚慷慨,然不若《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尤觉空灵蕴藉(《艺概·词概》古籍出版社本第121页)。

而且融斋把空灵蕴藉和前人一样,是提到词的温柔敦厚艺术原则来理解的。因此,他又说:

苏(轼)、辛(弃疾)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犖,悉出于温柔敦厚。世或以粗犷托苏、辛,固宜有视苏、辛为别调者哉!(同上第110页)

在这里,融斋把温柔敦厚与粗犷对举,可见他主要是论词的艺术原则,而非词的伦理原则。这清楚说明苏、辛豪放的词,在温柔敦厚艺术原则下,见其至情至性,见其含蓄蕴藉之美,而委曲尽情,那就更不必说了。苏辛词并非粗犷,并非剑拔弩张,了无余蕴的作品。

必须指出的是,有清一代词家辈出,词学也很繁盛,流派崛起,而在阳羡、浙西和常州三大派中,影响最深的还是常州派。常派主比兴寄托,自然强调变风和《离骚》了;在艺术表现上,则于温柔敦厚为近。张惠言《词选·序》说:

(词)其言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名)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导)。贤人君子幽约怨排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茗柯文》二编卷上)

这里所谓“言情造端兴于微言”者,即“隐微不显之言”,“精微要眇之言”^②。即是说,词是以蕴藉微婉、“低徊要眇”的艺术形象“喻其致”的,是寄托“贤人君子幽约怨排不能自言之情”的。只有

“低徊要眇”，才能感动读者的心灵，而达其“幽约怨悱不能自言”的情思。所以张惠言论词，毕竟以比兴寄托归诸蕴藉含蓄、委婉委曲。这无疑是温柔敦厚艺术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赋予这个艺术原则以新的时代的内涵，③甚至发展成为谭献的柔厚说。尔后周济倡空实寄托之论（详见《文学遗产》81年3期拙作《周济论词的空实和寄托》），又进一步把张惠言的理论系统化和完善化，扬弃了他的艰涩难通，片面未融的地方，而具备了艺术的辩证因素。所以周济对词的蕴藉深厚，有其宏通之论，而不偏执一格：

自温庭筠、韦庄、欧阳修、秦观、周邦彦，周密、吴文英、王沂孙、张炎之流，莫不蕴藉深厚，而才艳思力各骋一途，以极其致。（《词辨·自序》）

即使如南唐后主以下乃至辛弃疾辈那些豪宕感激之词，莫不揄扬其美：“南唐后主以下，虽骏快驰骛，豪宕感激，稍稍离矣。然犹皆委曲以致其情，未有亢厉剽悍之习，抑亦正声之次也。”（同上）“正声之次”只是因为时代关系而演为变声，而非艺术有所轩輊。豪宕感激的词如苏、辛一路，周济看到了豪宕中有委曲之致，是很辩证的。其实苏、辛词，除刘融斋一人以为是正声之外，大都认为是变之正，因为以时代论，非变不足以纠靡丽之弊。正因为是变之正，苏辛词开拓了词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而壮怀浩气寄于语言之表，但又不离乎蕴藉含蓄的温柔敦厚艺术原则，如融斋前所评论。所以周济评东坡说：

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介存斋论词杂著》）

东坡粗豪处毕竟非其主流。我们于《水龙吟》咏杨花、《贺新郎》咏石榴可以见其韶秀，而且含蓄蕴藉，读之令人低徊。如咏石榴云：“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周济又说：

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悲凉以温婉出之，此之谓变。这是符合继承和创新的规律的，如果简单地以悲凉代替温婉，则不可谓之变，因为这是简单地否定。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稼轩词的风格有如火焰的蓝光，刚之极也柔之极。如《贺新郎》结拍：“倩谁人唤取，红巾翠袖，温英雄泪。”

如果说，张惠言、周济倡比兴寄托说只是从

理论实质上看出其与温柔敦厚艺术原则的联系，还未标举温柔敦厚这样明确的术语和论题。但常州派发展到了咸、同、光绪年间，谭献继张、周诸人崛起于余杭，通过“有要眇之致”（冒广生评复堂词语）的词的创作实践，倡导词的柔厚说。这又发展了张惠言等人的词论。柔厚说，顾名思义即关于温柔敦厚艺术原则的理论在词学上的简约说法，并无别的涵义，当然理论内容却是丰富了，而且多有精辟之论。他叙录《篋中词》说：

余叙《篋中词》，终于中白，非徒齐名之标榜，同声之唱于，亦以比兴柔厚之旨相赠处者二十年。向序其词曰：“闺中之思，灵均之遗则，动之哀愉而不能已。中白（庄棫字）当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也。”（《篋中词》五评庄棫词语）

又说：

大抵周（济）氏所谓变，亦予之所谓正也。而折衷柔厚则同。（《词辨·跋》）

这里所谓柔厚之旨，即提出比兴寄托，使词要眇沉郁，含蓄蕴藉，总之要使常州派所倡导的“深美闳约”之旨不坠（《篋中词》续四），从而矫正当时词坛上流行的“绮靡、奋厉”、轻剽、狂遽的两种流弊。其理论的价值，蒋兆蓝曾作了这样的评价：“谭复堂揭柔厚之旨，陈亦峰持沉郁之论。凡此诸说，犹书家观剑器，见争道，睹蛇斗，皆神悟妙境也。”（《词说》）这种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柔厚说所论的不是温柔敦厚的诗教，而是温柔敦厚的艺术原则，是关于如书法家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所体会出来的艺术法则的理论。（详见《文学评论丛刊》第18辑拙作《谭献论词的比兴柔厚》）我们看晏几道《临江仙》结拍：“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明月犹在，而曾照幽约归去的彩云已杳，抚昔伤今，感慨无端，所谓篇终接混茫也。全词含蓄深婉之至，写出了词人对歌妓红粉飘零命运的同情，同时也寄其落魄不遇之慨。谭献曰：“所谓柔厚在此”（《词辨》该词评语）。这当然无关乎温柔敦厚的诗教了。诚然，谭献在评论词作时使用了许多和柔厚同旨的其他词汇，如忠厚、笃厚、温厚、深厚、婉笃，等等，甚至说：“柔厚衷于诗教。”如果我们通过他所评的词的分析，这种评语却又并不是温柔敦厚诗教的伦理原则，而是温柔敦厚的艺术原则。即词的含蓄蕴藉，深婉缠绵这一类的特点。如宋征舆《蝶恋花》：“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含蓄蕴藉，读之增旧

情之重。所以谭献评云：“忠厚 悱 惻”（《篋中词》卷一该词评）。正揭示出这首词的意旨和风格。又如乔守敬的《点绛唇》，复堂评为“温厚有余味”，（《篋中词》卷四该词评）也揭示这首词的艺术造诣。我们看过片：“还怕春深，花亦如人散。留春一半，判与闲莺燕。”不说人如花之散落，反说花亦如人散落，离人之苦以反迭写之，其拗怒如此，故顿挫中见深厚之思，蕴藉中见沉郁之情，后结的讽刺又何等深婉。这和陈同甫《水龙吟》：“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篋中词》中，所选陈 澧《忆江南馆词》比例既多，评价亦高。作为一个经学家的兰甫先生，他的词没有半点治经者容易犯的腐儒气，因而也就没有沾染温柔敦厚的道德说教，但却又贯彻了温柔敦厚的艺术原则。读其词，在风流蕴藉中见有一片真情一股清气流露于其间，而低徊要眇，朗婉动人。所以谭献说：“兰甫先生，孙卿、仲舒之流，文而又儒，粹然大师，不废藻咏。填词朗诣，洋洋乎会于风雅，乃使绮靡奢厉两宗废然知反。”（《篋中词》续二评兰甫词语）又云：“文儒蔚起，导扬正声”（同上，评沈世良词语）。在他看来，兰甫词正可说明他的柔厚说的真谛。尔后的朱祖谋《疆邨业语》卷三对《忆江南馆词》也作了较高的评价：“甄 诗 格，凌沈（指沈伯眉等）几家参。若举经儒长短句，岂然高馆忆江南，绰有雅音涵。”二家所评是符合实际的。我们看谭献在《篋中词》续四中评兰甫《甘州》就知道了。《甘州》词是写兰甫因惠州西湖畔东坡妾朝云墓，清明时节倾城士女酹酒罗拜所生的感慨。作者运用东坡被贬惠州时所写的诗，极浑化地写墓前“塔影微澜”，墓侧“零钟碎梵”，松林一片荒寒凄寂之景。而这个坟茔却赢得了上千上万的士女的凭吊。这就逗出了作者的想象和慰藉：死者竹根底下长卧④，香冢一抔，倒比“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⑤那种虚渺无著还好；又死者生长在杭州，因惠州西湖慰其故乡之念：“似家山水仙祠庙⑥，有西湖为镜照华鬘。”最后以东坡惠州咏梅七古第二首，“玉妃谪在烟雨村，先生作诗与招魂”作结，词客凭吊之情，见于言外，故其含蓄温厚，凄切动人。所以谭献评曰：“柔厚衷于诗教。”（《篋中词》续四该词评语）这里的诗教显然指的是温柔敦厚的诗歌艺术原则，并非诗歌伦理原则，即表现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调，因为温柔敦厚作为诗的封建伦理原

则和全首词的意境是大相径庭的。

还须谈到的是，与谭献同时的陈廷焯。他著《白雨斋词话》虽未臻纯熟之境，而提倡沉郁说，蒋兆兰也认为是“神理妙悟之作”。亦峰的沉郁说远追少陵。少陵认为“沉郁顿挫”是他自己的诗的特点。前面说了，王夫之力诋杜诗，而沈德潜则从杜诗体会出沉郁顿挫中见温柔敦厚之旨，在横纵出没中复含蕴藉微远之致。亦峰就是从这方面宗少陵，而提出沉郁说的。当然，亦峰的沉郁说到底还是词论。他也和谭献一样，承常州派张周等人的余绪，而发扬之：“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白雨斋词话》卷一）这当然是要贯彻温柔敦厚的艺术原则了，所以他又说：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十三国变风；二十五篇楚辞。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同上）他固然对温、韦、冯正中、欧阳修、晏小山、周邦彦、秦少游等婉约派词家衡以沉郁忠厚，以说明温柔敦厚的艺术原则。他对阳羨派的陈维崧颇有微词，也是由于迦陵词作不能“于豪放中见委婉，直抒感情中见含蓄”。在《迦陵词》中，求如《水龙吟》咏白莲、《摸鱼儿》听白生琵琶、《初夏临》本意、《东风第一枝》踏青、《满江红》赠顾梁汾那样于豪放中见含蓄蕴藉是不数数见的。所以亦峰评迦陵词说：“不患不能沉，患在不能郁。不郁则不深，不深则不厚，发扬蹈厉，而无余蕴。”（《白雨斋词话》卷三）陈其年词虽发扬蹈厉，少有余蕴，但毕竟是有清一代名家，说他粗才未免自负貶人。但亦峰通过沉郁说的阐述，温柔敦厚的艺术原理是有所创获的。

“温柔敦厚”这一诗歌理论命题，自来只就诗教方面，即只从诗歌的封建伦理原则方面加以否定。这是应该的，但不全面，也不是历史的辩证的研究态度。它有更重要的艺术原则意义，值得重新研究。笔者冒天下之大不讳，把问题提出来，愿受质于专家读者。

（本文1982年脱稿，1983年1月交花城出版社，4月交古文论学会年会。本刊略有删节。）

①“意内言外”，见张惠言《词选序》引《说文解字》卷九释“词”语。

“音内言外”，见刘熙载《艺概·词概》引徐锴《说文通论》释“词”语。

②均见李奇、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仲尼没而微言绝”语。

③详见拙文《张惠言论词的比兴寄托》——《文学评论》1980年3期

④东坡《悼朝云诗》：“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丛刊本《集注分类东坡诗》卷四）

⑤东坡《书林逋诗后》：“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丛刊本《集注分类东坡诗》卷二五）今列陈澧《甘州》于后：

“惠州朝云墓，每岁清明，倾城士女，酹酒罗拜。坡公诗云：‘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余谓朝云倘随坡公仙去，转不如死葬丰湖也。”

“渐斜阳、澹澹下平堤，塔影浸微澜。问秋坟何处？荒亭叶瘦，废碣苔斑。一片零钟碎梵，飘出旧禅关。杳杳松林外，添作荒寒。须信竹根长卧，胜丹成远去，海上三山。只一抔香冢，占断小林峦，似家山水仙祠庙，有西湖为镜照华鬋。休肠断，玉妃烟雨，滴坠人间。”（录自《篋中词》续四）

⑥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八引杜甫语：“臣之述作，沉郁顿挫。扬雄、枚皋何及也。”



广东劳动学会举行第二届年会

广东劳动学会第二届年会于八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肇庆市举行。省内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各级劳动部门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共一百多人参加了会议。肇庆行署、肇庆市的领导同志到会并讲了话。年会共收到论文四十多篇。年会主要围绕实行劳动合同制问题及有关工资、保险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理论上、政策上和实际工作上，对实行劳动合同制提出了许多可供研究、参考的建议性的意见。

年会听取并通过了学会副会长李华杰作的《学会年度工作报告》，传达了中国劳动学会有关会议精神，改选了学会领导成员，省劳动局长安清明同志担任会长。

（小 明）

从《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续)

牟世金

(三)

古代文论理论体系的特点相当复杂,这里只能提出一些很不成熟的蠡测。

理论的结构和体系,在某些方面有联系,但二者并不等同。古代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其结构虽大都较为松散,但在理论体系上,却并不都是混乱的。除《诗话总龟》等少数芜杂的论著外,往往有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象《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显然有其严密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必须以某种基本思想或观点来统领其全部理论;其次是要围绕某一中心而展开一系列有内部联系的、互相制约的论述。如果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就可说,中国古代文论的多数论著是自成体系的,虽然严密、完整的程度各有不同;由此以窥探中国古代文论,也就可能从总体上看到理论体系的特点了。

中国古代文论诗话,大多数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写成的。与此相应的则有征圣、宗经、文以载道、美刺教化、温柔敦厚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诗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历史最长,流行最广,作者最多的一种主要形式。又由于《诗经》是儒家六经之一,使诗歌在古代文学中具有最尊崇的正统地位。因此,在古代文学理论中,不仅论诗评诗的专著特多,绝大多数文论也以论诗为中心,并由此而有诗言志、赋比兴、兴观群怨、抒情状物、情景交融、声律对偶,以及象外之象、别材别趣、神韵格调、肌理说、性灵说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还不单是论诗,大都以诗的原理推及其它,甚至文学以外的艺术理论。如赋比兴,刘勰在《比兴》篇,就由诗而论到辞赋,并以《高唐赋》、《洞箫赋》等大量的赋来论证:“比之为义,取类不常”。刘熙载论赋也强调:“赋兼比兴”,“赋之为道,重象尤宜重兴”^⑩。又如蒋敦复论词:“词源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⑪。陈骥论文也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⑫陈廷焯更认为:“伊古词章,不外比兴”^⑬。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文艺理论上,赋比兴作为一种艺术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但它的意义是从诗歌艺术中总结出来,再逐渐扩大及其它的。古代文论中不少重要的理论问题,大都类此。

古代诗论影响于整个文论最大最普遍的是“诗言志”。“诗言志”是古代诗论的中心,不仅赋比兴从属于这个中心,古代文论诗论中有关抒情状物的全部理论,无不和“诗言志”的观点有一定的联系。如何抒情状物,几乎涉及文学创作的全部问题;而我国古代论写物之功、状物之理,大都从“体物写志”或“因物达情”的要求出发。由此可见,古代

文论的许多论旨，往往都受制约于“诗言志”的传统观点。这样，或可作一简单的概括：我国古代文论在理论体系上的特点，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诗言志为中心构成的。这种特点只能是就大体而言，对每一具体论著不可能都符合。但至少从《文心雕龙》这部有代表性的巨著中，是可得到充分印证的。

刘勰和后来古文家的观点不同，和道学家更是大异其趣。他虽然把孔子捧到人类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序志》）；把儒家经典尊为最伟大的永恒真理：“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宗经》），但是，《文心雕龙》中并没有提出“文以载道”的主张。其“征圣”、“宗经”的旗帜是鲜明的，却主要是宗奉儒家的文学观点；是以儒家经典为写作的典范，要求向儒家圣人学习写作，即所谓“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征圣》）《原道》中的“自然之道”并非儒道，而是指万物有自然文采的规律；《征圣》、《宗经》则主要是讲周孔之文的各种好处，“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便是其宗经思想的集中反映。特别是《序志》篇讲得更为明确：“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因而刘勰要根据“尼父陈训”来写《文心雕龙》。这些都说明，他的征圣、宗经思想，是从文学创作出发，不是从宣扬儒道思想着眼。

刘勰所取的儒家文学观点是什么呢？他根据儒家的种种说法：“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情欲信，辞欲巧”；“旨远辞文”等，归结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以充实的内容和巧丽的文辞相结合为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并以此为准则来“论文叙笔”和“割情析采”，可见这是其全书立论的指导思想。

必须说明的是，《文心雕龙》是论文，而不是传教，更不是写哲学讲义，因而以“衔华而佩实”为全书立论或评文的指导思想是得体的。当然，刘勰并不是为论文而论文，既本于儒家的文学思想来论文，就不能不和儒家的一系列主张有相应的联系。如论骚体则肯定其“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辨骚》）；论诗则赞扬“顺美匡恶”的优良传统（《明诗》）；论乐府便强调“岂惟观乐，于焉识礼”（《乐府》）；论赋则批判“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的作品（《诠赋》）；论创作便强调“化感之本源”（《风骨》）；重视《诗经》的作者“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情采》）；不满于汉代辞赋家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比兴》）；特别是论作家品德，更主张“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程器》）显然，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直接运用。这些意见是否游离于“衔华佩实”的基本观点之外呢？只举一例可明：

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诠赋》）

刘勰强调写赋的基本原则是“丽辞雅义”的高度结合，要有文有质，有色有本。这正是在“衔华佩实”的基本观点指导下提出来的。但“逐末之俦”把赋写得“繁华损枝，膏腴害骨”，也就是有文无质，有色无本，因而就“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了。这足以说明，要

求文质并重，正是为了使作品很好地发挥其教化或美刺的作用。所以，刘勰的重美刺教化，和“衔华佩实”的基本观点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以上是构成《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一个方面。与此密不可分的另一个方面，是以“诗言志”为中心而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从篇幅上看，《文心雕龙》中论诗的最多，这和整个古代文论以论诗为主的情况一样。除“论文叙笔”部分的《辨骚》^④、《明诗》、《乐府》等篇外，“割情析采”的二十四篇，篇篇都论及诗或与诗有关，且很多重要理论问题，都是围绕着诗的原理而提出或展开的。《比兴》篇自不必说；《声律》篇所论声、调、和、韵，主要从论诗出发，也很明显。《通变》是总结“九代咏歌”的发展情况来论通变的必要性。《情采》据“诗人篇什”来主张“为文而造情”，并发展了“诗言志”的观点而提出“述志为本”的主张。《夸饰》篇据“《诗》《书》雅言”来论夸张手法的必要。《时序》篇则从“歌谣文理，与世推移”的情况，讲到东晋的“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从而总结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著名论点。《物色》篇更是总结《诗经》、《楚辞》的创作经验，提出了“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和“诗骚所标，并据要害”等重要理论。这样的例子很多，说明刘勰的创作论，是以论诗歌创作为中心建立起来的。

刘勰的文学理论不只是多论诗，而且根据“诗言志”的特点来阐发种种文学理论。言志和言情，在《文心雕龙》中是统一的，不过他要求的情，是“义归无邪”的情，所以用“持”来解释诗，要求诗能“持人情性”（《明诗》）。这和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来立论的原则是一致的。

《宗经》篇曾明确说过：“诗主言志”，则抒情言志为诗的主要特点，刘勰是很清楚的。但是，在很多并非论诗的地方，他也强调志，突出情。如《熔裁》：“万趣会文，不离情辞”；《情采》：“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况乎文章，述志为本”；《附会》：“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等。这说明：刘勰不仅用“情”或“志”来概括一切文学作品的内容，而且以抒情言志为文学艺术的职能。这是刘勰以诗为中心来论文在历史上取得的重要成果。明确了这点，既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文学艺术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来论文，更有利于在理论上作深入的探究。如《明诗》篇所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里提出文学理论上一个重要问题：情与物的关系。“诗言志”既是有感于物而言志，则物和情就有着密切的关系。《物色》篇对这种关系做了具体研究：“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就说明：情来自物，物决定情；客观事物有所变化，作者的感情也随之而变。因此，怎样抒情言志，就不仅在理论上要研究情与物的关系，还必须研究物和言的关系，也就是怎样写物的问题。

《诠赋》篇说：“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这也是根据“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的基本观点所作的论述，只是这里是从情物关系的角度来论述，而把“志足”、“情信”发挥为“义必明雅”，把“言文”、“辞巧”综合为“词必巧丽”。这里值

得注意的是刘勰对情、物、辞三者关系的论述：情是由物引起的，所以内容必然明显而雅丽；因有了物所引起的具体的情，言之有物，故能明雅。物是通过作者的情而表现出来的，因而文词必然巧丽。这除了说明物与情必须结合外，更说明“巧丽”的词离不开物。诗人写物，并不是为写物而写物，写物是为了“体物写志”，因此，其所写之物，必须是能言志的。“物以情观”正说明这个道理。所写之物，既是融化于情又能达情的物，描写这种物的文辞就能“巧丽”了。这是文学理论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文学语言的形象性这一特点，必须用能言志的形象的语言，才是“巧丽”的文学语言。

刘勰虽然没有直接而明确地说明这种物与情、物与言的关系，但在其“体貌”式的表述中，是确切地反映了这种关系的。《物色》篇有一条很好的旁证：

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晚会通也。

刘勰认为善于继承和革新相结合的作者，就能创造出“物色尽而情有余”的作品。这个“物色”，就是描绘物色的语言，也就是形象的语言。必须用形象的语言，才能产生言虽尽而意有余的艺术效果。钟嵘论赋比兴，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文已尽而意有余”，其义略同。唐宋以后，这话发展成古代文论的一句名言，正如苏轼所说：“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⑧袁中道则谓：“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尽而意无穷。”^⑨试较“言有尽”、“文有尽”和“物色尽”三说，其义虽同，惟刘说最善。在文学作品中，意之所以“无穷”，情之所以“有余”，一般的“言”与“文”是很难做到的，只有写物的言辞，可以产生形象大于思维的作用，能透过一定的物象，生发出无尽的意味；亦即刘勰所谓“以少总多”是也。

“以少总多”是《物色》篇提出的写物方法，此篇对怎样写物还有一系列论述。首先是要对所写之物有深入的观察了解：“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其次是要准确逼真地描绘物象：“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但由于“物貌难尽”，而必须“善于适要”，用“以少总多”的方法来做到“情貌无遗”等。总的来看，《物色》篇是以“物”为中心，而论述了物与情、物与言两种关系，也就是研究了物怎样决定情和怎样以言写物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中所说：“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不仅概括了本篇所论两种关系的要旨，也体现了全书所论的要义。言志求深远，体物求妙合，正是对“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的阐发。《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就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来论述的。

《神思》是就“物以貌求，心以理应”的心物交融之理来论艺术构思，通过“神与物游”的想象活动，而“情变所孕”，产生了作品的种种内容。《体性》和《定势》两篇都是讲情与言的关系：“志以定言”。即按“情动而言形”之理论艺术风格，据“因情立体”之理论文章体势。《风骨》则从“招怅述情”和“沉吟铺辞”两个方面强调风骨并重。《通变》和《情采》两篇的关系上文已经讲到，所论角度虽有不同，但都是为了反对“采滥辞诡”、“从质及讹”的创作倾向而要求文质并茂。《熔裁》论“譬括情理，矫揉文采”，是对质文两个方面的规划与加工。“阅声字”诸篇，也不外讲如何抒情状物，以及用种种艺

术方法来体物写志。其全部论述，都是为了写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的作品。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其创作论所研究的，主要就是如何使“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而志——言——文的关系，主要是志——言——物的关系。在刘勰的理论体系中，“文”和“物（象）”都从属于“言”，所以，其理论体系的主干就是“志”和“言”的关系，亦即所谓文质关系。

由上述可见，刘勰的理论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诗言志为中心，以文质关系为骨干建立起来的。这个体系，基本上反映了古代文论理论体系的概貌。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诗言志为中心，以文质关系为主干，也概括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三大特点。唐宋以后的文论，当然各有其不同的具体特点，但大多数文论的概貌，是具有这种基本特点的。

（四）

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还表现在它有一套自己的概念、术语和传统的论题，如道、气、势、赋比兴、风骨、形神、神思、刚柔、声律、格调、骈俪、文道论、文质论等。这些概念和论题，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们都植根于古代文学艺术创作的民族特色。正因如此，它们一经出现就经久不衰，在长期的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既有影响于创作的发展，也对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它们既是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表现因素，也是构成因素。它们既有自己的独立性，也和古代文论“体貌”式的特点、理论结构和理论体系的特点互为表里。

这些概念和论题，《文心雕龙》中大都有所涉及，有的还做了专题论述。其中虽未直接论及形神和格调问题，也有某些相关的论述。如明清时期才明确提出的格调说，《文心雕龙》自然不会讲到。但杨慎论风骨有云：“诗有格有调，格犹骨也，调犹风也。”^①亦非毫无道理。至于形神问题，刘勰以前的乐论、画论，已有较为广泛的运用了。《文心雕龙》中虽未直接讲到形神问题，但不满足于表面的形似之论是有的。如《物色》篇总结《诗经》的写物之功，有的能“一言穷理”，有的只“两字穷形”，从而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所谓“情貌无遗”，指的是用一两个字就完全概括了物象的神情状貌。写出这样的“情貌”，也就是传形之神了。本篇所讲“物色尽而情有余”的形象描写，也只有这种“情貌无遗”的传神之笔才有可能。此外，《比兴》篇提出的“拟容取心”。更是要求在表面形似（“容”）的基础上进一步表达出它的“心”。王元化同志说：“拟容取心”的命题，“就是在艺术形象问题上分辨神形之间的关系。心和容亦即神和形的异名。”^②这是很有道理的。

此外，古代文论中一些较常见的概念，《文心雕龙》都有集中的论述，特别是神思、风骨、比兴等，都是经刘勰做了专篇论述后，在古代文论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只对神思、风骨、比兴三个问题略加叙述。

先看“神思”。

我们现在所讲艺术构思的“构思”二字，刘勰之前的臧荣绪已经用过：“左思……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⑩刘勰不用“构思”而用“神思”来论艺术构思，这并不单是个用词问题。“构思”一词，可以用于文学创作，也可用于文史哲一切论著的写作，用“神思”二字，则更适合于艺术构思的特点。

“神思”二字，最初只是泛指用心、用思。如曹植《上疏陈审举之义》：“又闻豹尾已建，戎轩骛驾，陛下将复劳玉躬，扰挂神思。”^⑪陆凯曾说：“愿陛下重留神思，访以时务。”^⑫东晋孙绰在《游天台山赋序》中说：“天台山者，盖山嶽之神秀者也。……余所以驰神运思，昼咏宵兴，俛仰之间，若已再升者也。”^⑬这里的“驰神运思”，讲的是作者的想象活动，其含义就有了新的变化。其后，晋宋之际的宗炳论画，有“万趣融其神思”^⑭之说，就直接用于艺术构思了。刘勰正是取孙绰“驰神运思”之意，在宗炳之后第一次用以指文学创作的艺术构思。《神思》篇不仅以此为题做了专论，且对“神思”的特点做了充分论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种飞驰于千载之上、万里之遥的想象，刘勰谓之“其神远矣”，就是说，艺术构思是一种无所不及的精神活动；在艺术家驰神运思之中，“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精神和物象相沟通，从而孕育出作品的种种内容。从刘勰的这些论述可见，对艺术创作这种精神生产的特点来说，“神思”二字是很能表达其特点的。正因如此，“神思”二字成了古代文论中一个特定的概念，并为后世论者所沿用。如刘勰之后不久的萧子显用以论文：“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⑮唐代王昌龄用以论诗：“诗思有三，……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曰生思。”^⑯宋代韩拙用于画论：“盖有不测之神思，难名之妙意，寓于其间矣。”^⑰清代刘熙载用于书论：“右军《乐毅论》、《画像赞》……孙过庭《书谱》论之，推极情意神思之微。”^⑱直到鲁迅，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中，也多次运用了“神思”这个概念^⑲。

再看“风骨”。

“风骨”一词源于汉魏以来的人物品评，过去的研究者说之已详，刘勰也是利用旧说而第一次用于文学理论。《文心雕龙》对此作了专篇论述后，“风骨”成了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刘勰的“风骨”论，原是针对六朝文风而对文学创作提出的美学理想，因而常被后世用作评论文学的标准。从初唐陈子昂开始，就高举“汉魏风骨”的大旗，反对齐梁以来“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创作倾向^⑳。中经李白对“蓬莱文章建安骨”的提倡^㉑，殷璠以“风骨”、“气骨”来论诗和评诗^㉒，“风骨”就成了一个很受重视的审美标准。到了宋代，严羽把钟嵘《诗品序》中的“建安风力”发展为现在还文学史家常用的“建安风骨”^㉓。明清时期，“风骨”、“气骨”、“建安风骨”之类概念，在胡应麟《诗薮》、沈德潜《说诗啐语》、刘熙载《艺概》等论著中就运用得更为普遍了。叶燮对“古今人之诗评”多所不满，对钟嵘、刘勰之论，也认为“其言不过吞吐抑扬，不能持论”。即使他持这种过于偏颇的态度，但对“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几句，仍以为“斯言为能探得本原”^㉔。正因为刘勰的“风骨”论从根本上提出了文学创作的最高要求，因而既有

较普遍的意义，也有较大的号召力量。

“风骨”这个概念，也不只用于文学评论，在刘勰之前，便已常用于书画评论了。如王僧虔论书法：“郗超草书，亚于二王，紧媚过其父，骨力不及也。”^④谢赫评绘画：“不兴之迹，殆莫复传，惟秘阁之内一龙而已。观其风骨，名岂虚成！”^⑤刘勰之后，以“风骨”论书画者，仍相继不绝。如唐僧彦惊评画：“北面孙公，风骨不逮”^⑥。宋人刘道醇评画：“气骨意思，深有父风”^⑦。孙过庭论书：“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⑧张怀瓘论书：“以风骨为体，以变化为用。”^⑨这样的例子甚多。杨慎评《风骨》篇曾说：“此论发自刘子，前无古人。徐季海移以评书，张彦远移以评画，同此理也。”^⑩这个概念之所以既可用以论诗评文，又可移以评画论书，就因为诗文书画都“同此理也”。由此可见，“风骨”这个概念确是概括了多种艺术共同的审美特征。

最后看“赋比兴”。

“赋比兴”这一诗歌艺术的传统表现方法，前面已经讲到，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由诗论扩大到古代文论的许多方面。这里要加以补充的是，“赋比兴”不仅广泛运用于诗、词、歌、赋和散文，也为古代书画理论所吸取。各举二例如下：

故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⑪

作诗须有寄托，作画亦然。……松树不见根，喻君子之在野也。杂树峥嵘，喻小人之昵比也。江岸积雨而征帆不归，刺时人之驰逐名利也。春雪甫霁而林花乍开，美贤人之乘时奋兴也。^⑫

然草与真异：真则字终意亦终，草则行尽势未尽。……或寄以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⑬

写字者，写志也。……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钟繇笔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右军《兰亭序》言：“因寄所托”，“取诸怀抱”，似亦隐寓书旨。^⑭

这些论述说明二个共同的道理，无论绘画或书法艺术，都是为了抒情言志。因此，也和诗歌运用比兴方法一样，要因物寓意，要有所寄托或美刺，而“与诗人相表里”。从这里，更能看出我国古代文学艺术以“诗言志”为中心的理论特点。正因为比兴方法要在借物言志，在古代文论的发展过程中，“比兴”又逐渐形成一种要求有充实的思想内容的特殊概念。这一转变，在唐代最为明显。陈子昂开始不满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诗作。他说的没有“兴寄”，和“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风雅不作”等一致；显然，要求有“兴寄”，主要是要求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到白居易论诗，尤重“比兴”。他称许张籍的诗：“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⑮并直接用有无“比兴”来衡量作家作品：

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规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⑯

这就以“比兴”为评论作家作品的主要标准了。且白居易所说的“比兴”，不是一般的艺术

手法，认为李杜之作还“十无一焉”，可见他对“比兴”的要求极高，只有《新安吏》、《石壕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诗作，才算有“比兴”。这样，“比兴”这概念就在托物喻志的基础上发展得更为丰富，也更为重要了。刘勰的《比兴》篇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他释“比兴”为：

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

黄侃认为：“后郑以善恶分比兴，不如先郑注谊之确”。钟嵘的解释，“又与诂训乖殊”，唯“彦和辨比兴之分，最为明晰。一曰起情与附理，二曰斥言与环譬，介画燎然，妙得先郑之意矣。”^④据黄侃此说，可见刘勰的解释，首先是明晰准确，其次是本于先郑，也就是说，是在前人解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先郑之说只是：“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⑤这并不涉及所比所托的思想内容。刘勰的发展，则在赋以“蓄愤斥言”、“环譬托讽”之义，“比兴”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段了，而是从方法到思想都有了具体的要求。“比兴”从表现方法发展而为评论作家作品的标准，这是一个重要的过渡。

从以上所述可见，古代文论中一些传统的概念或论题，它们能够长期而广泛地运用于文学艺术理论之中，显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些概念和论题，和古代文论的种种特点都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如由“文”与“质”两个概念构成的文质论，既是古代文论的结构特点的表现形态，又和以“诗言志”为中心的理论体系相辅相成。“赋比兴”的方法对以“诗言志”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就既有促进其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其本身又是这个理论体系的重要表现形式。“文气”、“神思”、“风骨”等概念的普遍运用，则和古代文论的“体貌”特点有关。“气”、“风骨”、“形神”等，都是在以物为喻的基础上形成的。

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是：古代文论既有形象化的表现特点，而其概念、术语，如“气”、“势”、“神”、“风”、“骨”、“韵”、“格”等，却给人以高度抽象的感觉。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其实是统一的。理论多是形象性的描绘，概念也多形象化的表述，这本来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套术语概念，正由此而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直接性。上文所作“神思”和“构思”的对比已能说明这种特点。又如“神与物游”，虽然不是一个固定的理论概念，但古来类似说法甚多，如王昌龄的“神会于物”^⑥，苏轼的“神与万物交”^⑦，李日华的“神游意会”^⑧，黄宗羲的“情与物相游”^⑨，李渔的“梦往神游”^⑩等说，大都是讲艺术构思中思想和物象相结合进行的想象活动。若以这类说法和“形象思维”这个近代的概念相较，就可清楚地看到，其内容是相近的，而我国古代的“神与物游”诸说，则有较显著的直接性。古代文论中的许多术语、概念，大都具有这种特点。“风”，就是自然界的风，风吹则草动，这种作用喻之于文，就是文的教育力量：风化。“骨”，就是动物的骨骼，骨既是硬的，又是动物体的支柱，用以喻文，就有骨力、骨架的要求。“势”，正如刘勰所说：“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定势》）圆体转动，方体安稳，这就是它们的“势”，用以喻文，就是要遵循文体的自然之势。

正因为古代文论的用语大都具有直接性的特点,即使有的已形成相对固定的概念,但大都是不须给它某种定义,也其义自明。如果要给某一术语或概念确立总的界说,是很不容易的,因其直接性或以物为喻的特点,有较大的灵活性、伸缩性;特别是古代文论多是针对实际问题而发,虽是同一用语,往往随其针对的事物、情况的不同,其含义也随之而异。如刘勰所讲的“自然之道”,不同于扬雄所讲“正道”、“它道”的“道”;韩愈讲的仁义之“道”,又迥异于刘勰的“自然之道”;宋代道学家的“道”,也不同于唐宋古文家的“道”;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写了三篇《原道》,却是讲的“六经所不能言”的“道”,与上述诸家之道又不相同。这种情形在古文论中是常有的。但这种情形的存在,并不是无法确解古文论中的术语概念了,相反,我们常在一些概念上争论不休,就有可能是对古代文论所用术语概念的特点注意不够;认识了这些特点,注意它的直接性,掌握其针对实际问题而发的具体情况,反而是不难理解的。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特点,是用体貌的方式,从实际出发进行综合论述的结构;在儒家思想支配下,以“诗言志”为中心,以文质论为主干构成的理论体系;用一套传统的术语、概念和论题而进行一系列评论。

一九八三年五月

- ⑩ 《艺概·赋概》。
- ⑪ 《芬陀利室词话》卷三。
- ⑫ 《文则》。
- ⑬ 《白雨斋词话·自序》。
- ⑭ 《辨骚》篇是否为“论文叙笔”之一,尚存异议。范文澜以此篇为“文类之首”,拙见以其说为是。但无论其属上属下,《楚辞》为诗体之一,则无疑义。
- ⑮ 见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历代诗话》。
- ⑯ 《淡成集序》,《珂雪斋文集》卷二。
- ⑰ 《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风骨》篇评语。
- ⑱ 《文心雕龙创作论》54页。
- ⑲ 《文选·三都赋序》注引臧荣绪《晋书》。
- ⑳ 《全三国文》卷十六。
- ㉑ 《三国志·陆凯传》。
- ㉒ 《文选》卷十一。
- ㉓ 《画山水序》,《历代名画记》卷六。
- ㉔ 《南齐书·文学传论》。
- ㉕ 见《唐音癸签》卷二。
- ㉖ 《山水纯全集·论观画别识》。
- ㉗ 《艺概·书概》。
- ㉘ 见孙昌熙、刘绂《鲁迅与〈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
- ㉙ 《修竹篇序》,《陈子昂集》卷一。
- ㉚ 《宜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李太白全集》卷十八。
- ㉛ 《河岳英灵集》。
- ㉜ 《沧浪诗话·诗评》。
- ㉝ 《原诗》卷三。
- ㉞ 《法书要录》卷一。
- ㉟ 《古画品录·曹不兴》。
- ㊱ 《后画录》,《画品丛书》。
- ㊲ 《圣朝名画品》,《画品丛书》。
- ㊳ 《孙过庭书谱笺证》110页。
- ㊴ 《书断》,《法书要录》卷四。
- ㊵ 《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风骨》篇评语。
- ㊶ 《宣和画谱·花鸟叙论》。
- ㊷ 盛大士《溪山卧游录》卷二。
- ㊸ 张怀瓘《书断》。
- ㊹ 《艺概·书概》。
- ㊺ 《读张籍古乐府》,《白居易集》卷一。
- ㊻ 《与元九书》,《白居易集》卷四十五。
- ㊼ 《文心雕龙札记》174页。
- ㊽ 《周礼·春官·大师》注引。
- ㊾ 《唐音癸签》卷二引。
- ㊿ 《书李伯时山庄图后》,《苏东坡集》前集卷二十三。
- ① 《六砚斋笔记》,《中国画论类编》134页。
- ② 《黄孚先诗序》,《南雷文案》卷二。
- ③ 《闲情偶记》卷三,《语求肖似》。



一九八三年第五期

总第六十期

编 辑 者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部

广州越秀北路 222 号

邮政编码: 510020

出 版 者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广 州 市 邮 局

订 阅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 国 国 际 书 店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 2820 信箱

代号: 46—64

国内定价 每册 0.35 元

广东省期刊登记证第六号

本刊每逢单月二十日出版